陳獨秀評論

陳東曉編

編者自序

陳獨秀的被捕，這乃是目前中國政治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我們只要看在陳獨秀初被捕以至移送法院的那幾天，全國各地報紙無一不以陳獨秀的標題而作社論，甚至一次再次，表示全國輿論對於陳獨秀案的重視。尤其在全國青年界以至黨人中，無論其最近的思想變化如何，他們在過去的時候大半都受過陳獨秀的影響，因此，對於今日的陳獨秀案也就加以特別的注意。現在我們將全國報紙雜誌中關於陳獨秀案的評論一律搜集起來，集爲一册，在這個中間我們不僅可以看出陳獨秀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而且可以看出在陳獨秀案中所表現的中國社會各派系的衝突。

在我們觀察了中國全國對於陳獨秀案的輿論以後，我們可以說在這個中間可以看出四派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最普遍而最有力的意見，就是胡適，傅斯年，以及全國各大報紙的輿論，他們雖未直接提出對於陳獨秀應如何處置，可是，在他們的字裏行間，一方面着重於陳獨秀個人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功績，另一方面着重於要求政府以法治精神處理此案。這些

人一致承認陳獨秀絕非共產黨，絕非現行犯，絕不能與一般共黨案件同日而語的。這可以說是全國輿論學術界之最大多數的意見。

第二種意見，爲一部分中國國民黨的意見，這一種意見所見不多，僅有廣州民國日報的社論說：『陳氏曾組織托洛斯基學會，自爲常委，所搜得之反動文件六十大捆，其立意危害民國已無可疑，自應處以極刑，勿能寬縱』。這種話的意見，自然是要將陳獨秀與一般共產黨一視同仁，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而處以死刑的。

但是，雖然還有人將他依舊看爲共產黨，可是眞正的中國共產黨對他的態度如何呢？假使我們看一看共黨首領蔡和森所作的『論陳獨秀主義』，以及共黨幹部派機關報大衆評論上所登載的『托陳取消派首領陳獨秀被捕之意義』，其中將陳獨秀駡得狗血淋頭，指他爲『中國革命的叛徒，對於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投降者』。這樣，不僅足以証明陳獨秀不是共產黨，並且還可以證明陳獨秀正是目前中國共產黨之一個最大的敵人。

最後，也還有無條件擁護陳獨秀的，這就是陳獨秀所直接領導的取消派。譬如先鋒報的標題就是『起來！起來！！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但是，這種完全崇拜陳獨秀而無條件

擁護的人，大概與要求對陳獨秀處以極刑的人，是一樣的不多。

對於陳獨秀的輿論，大概可以分爲這樣四派。

然而一般人所最注意的問題，當然還是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之關係的問題，對於這一點，北方公論上的一篇文章說得最爲恰當：『兩三年來陳獨秀的努力，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上確實發生了非常嚴重的影響，因爲陳獨秀在共產黨一般幹部中是有着很大的潛勢力的。自從陳獨秀離開中央以後，中國共產黨始終未能產生足以統率全黨的領袖，黨的組織也因此非常薄弱，迨至經了陳獨秀之幾次的打擊以後，於是號稱「鐵的紀律」之中國共產黨，幾年以來，便走入於非常破碎的瓦解的狀態。現在所有一切共產黨的動搖分子，雖然不完全在陳獨秀的領導之下，然而這些分子所以發生動搖的原因，却是因爲共產黨之鐵的威信已經爲陳獨秀所打碎了。近幾年來，共產黨中已經脫離中央派的分子，如「我們的話」派，「戰鬥」派，這都與托洛斯基主義相近，與陳獨秀一派有很密切的關係。一九三一年由幹部派中新分化出來的羅章龍派，大部分也就轉入於陳獨秀派之中。現在尚在中央派統制之下的右派(張國燾領導)，在過去與陳獨秀一派的關係非常密切，目下雖然不敢公然與陳獨秀妥協，但這不過是時間

問題。陳獨秀的政治活動如不就此終止的話，將來中國共產黨之更嚴重的分化自在意料之中。』

我們認爲這一段對於描寫陳獨秀在共產黨中的作用是非常確切的，陳獨秀正是使中國共產黨支離破裂的唯一酵母。

這樣，我們將這一切評論都集中起來，使讀者自己再去加以正確的估計，這本書的任務就在這裏。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陳東曉

陳獨秀評論目次

陳獨秀案　傅斯年

論陳獨秀主義　蔡和森

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胡適

由陳獨秀被捕說到中國共產黨分化之趨勢　金玉振

清算陳獨秀， 仿魯

托洛斯基主義，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博古

共黨幹部派對陳獨秀的詆毀與批判　恩美

陳獨秀被捕

北平晨報社評

起來！起來！！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

先鋒報

取消派消滅蘇維埃運動的妙策　筱妞兒

陳獨秀底生平及其政治主張　赤光

附錄

陳獨秀案起訴書

陳獨秀評論

陳獨秀案

傅斯年

——載獨立評論第二十四號——

最近陳獨秀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捕去，移交中國官廳，又解到南京，押在軍政部軍法司候審。這事件引起南北輿論重大的注意，平津的幾個重要日報都有社論，論這件事，而其結論皆不外乎政府處置此案應分別陳氏之功罪，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的判決，不可徒然用一個「反動」的公式率然處分。輿論的這個態度我覺得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們絕不能要求執政者法外徇情，同時也絕不能同意當官者之主觀用事。我們對一切司法案件皆應如此主張，對陳案何獨不然？

陳獨秀案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假如陳氏是在江西或湖北共黨巢穴中捕去，他是一個現行犯，這事情簡單得多了，然而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中捕去，而其本身與其同派的人又早已爲蘇俄背後之第三國際開除了黨籍，且對於他們這些人的態度是拔刀相見的。假如陳氏在江

西共黨區域被共黨捉了去，他登時便要明正了蘇俄的典刑了，現在是國民黨之政府捉到手，於是處置此事完全有考慮陳氏一生行跡，及近二十年中國革命歷史之必要。

我們爲要去論這件事，應該把陳氏行跡分作三段去看。

第一段是攷慮國民黨淸共以前十年中陳氏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這裡所論革命者，不只政治革命，應該槪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本來近代的革命不單是一種政治改變，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會的，文藝的，相互改革，否則革命只等於中國史上之換朝代，試問有何近代意義呢？且就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看，其中含有無限的社會改造，何曾是「你去我來」的公式呢？所以我這一段中把革命用做廣義的，必爲讀者所同意罷！

淸末陳氏在日本時，加入革命團體，而與當時長江革命人士一派較親密，與兩浙各部分較疎，又以他在學問上及著文的興趣，與國粹學報民報諸人同聲之來往最多，然而因爲他在思想上是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人，他永遠是他自己。東南革命時，他先在南京，後到安徽都督府中做柏文蔚先生之秘書長。民國二年，反袁擧義，失敗逃亡，在日本度他那窮得

只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蝨子的生活。袁世凱死了，他回來，在上海開始辦「新青年」。要知道陳獨秀對于革命的貢献，新青年便是最重要的証據。

「新青年」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看，一是自民國四年九月創刊時至民國六年夏，這時候是他獨力編著的。二是自民國六年夏至九年年初，這是他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幾個同志特別是在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共辦的，不過他在這個刊物中的貢獻比其他人都多，且他除甚短時期以外，永是這個刊物的編輯。三是自民國十年年初算起。這個刊物變成了共產主義的正式宣傳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適之先生等便和這個刊物脫離了關係。現在從「新青年」中看陳君之貢獻與變遷是很明瞭的。

獨秀是在反袁的的立場上最努力的人，文字的和實際政治的皆然。袁氏代表什麼呢？若把袁氏看做代表帝制，眞正太把事情看淺了。蔡子民先生的見解最徹底：他說，

袁氏之爲人，蓋棺論定，似可無事苛求。雖然，袁氏之罪惡非特個人之罪惡也。彼實代表吾國三種之舊社會：曰官僚，曰學究，曰方士。畏強抑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奢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壇祀帝，小學讀經，復冕旒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

表學究之頑舊也。武廟宣誓，教會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旅歐雜誌第三號)

袁氏之死，雖不曾將這三個社會帶了去，而反應之下卻給反對這三種社會的分子一個陽春。新青年便應運而生于民國四年之秋。那時候的志士雖也知道中國的問題並不簡單，然而總看見希望在前面，希望的寄託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給之體力智力為基礎，西洋近代文明之貢獻為工具，以刷洗這幾千年的瑕穢之青年身上。獨秀把這個意思透闢的扼要的，寫在他的「新青年」發刊詞中，他說。

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于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蔴，決不作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發軔于這個立點上，則後來之倫理革命論，文學革命論，民治論，以及社會主義，都本自然的趨勢，必然的產物。

而陳氏之發揮這個立點，尤有一個基本精神，即是他的猛烈的透闢的自由主義。我們可於他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中(新青年一卷一號)看出他自己造成之來原，他的精神到底是法蘭西革命的產品，並不是一個「普羅」的產品，這或者是他終久受不了第三國際的部勒，而做牠的「異端」之緣故罷？

他在這個立點上發軔，自然要着眼到教育問題，他于教育問題上標出四個綱領，(一)現實主義，(二)惟民主義，(三)職業主義，(四)獸性主義，(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這樣的一個教育綱領現在還不是過時的，而獸性主義尤其需要。他於「獸性主義」一節下說。

人間道德之活動，乃無道德的衝動之繼續。良以人類爲他種動物之進化，其本能與他種動物初無異致，所不同者，吾人獨有自動的發展力耳。強大之族，人性獸性同時發展，其他或僅保獸性，或獨尊人性，而獸性全失，是皆墮落衰弱之民也。獸性之特長謂何？曰，意志頑狠，善鬥不屈也；曰，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賴

本能，不依他為生活也」；曰，順性率眞，不飾僞自文也。

其「抵抗力」一篇（同書一卷三號）痛論我國人「今日卑劣無恥退葸苟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正和他的獸性主義相發明，在今天舉國不振作之情況下看來，尤覺親切。他的思想中這個「尼采層」是使他最不能對中國固有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協的，也正是他的文學革命倫理改造兩運動中之原動力。

文學改良之論創於胡適之先生，他在這個運動中第一篇文字是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二卷五號）。他在這篇文章中標舉入手法八件：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照這個方案做下去，只有做白話之一路。他在這篇文字的末段中也露出這個意思，而未曾作絕對的主張。獨秀接着在次一號中（二卷六號）發表了一篇響應的文章，叫做「文學革命論」，他說，

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其原因之……大部分，則為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汚深積，並此虎頭蛇尾之

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於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個講台不僅注意在新文學之寄託物，白話，且高標新文學應有之風氣，而說出新文學應有之風氣是和中國政治與社會之改革不可分離的。這眞是一個最積極的新文學主義，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及革命史上一個不磨的文件！以後文學改革的趨勢多集中在白話問題，誠然，這是初步中最基本的問題，然而白話終不過是個寄託物。用白話來做寫實主義的文學固然方便，用他來做古典主義也未嘗不可，用他來寫人道主義固然方便，用他來寫薩朧生活也一般方便。當時有個「學衡雜誌」，專攻擊白話文，我有一次對朋友說他們眞把這事看得淺了，他們接受了白話文主義，還可以固守他的古典主義呢？當時對于外國文學又每每沒有別擇，

我有一次對一個談外爾德的朋友說，你要打倒李義山，這是很有道理的了，然而要引進外爾德這是多麼矛盾呢？我這裏說上這些不相干，無非要形容當時在文學改革的運動若干混亂的現象。獨秀開頭便看得透闢，以爲文學革命之憑借第一是用白話以代古文，第二是借歐洲新文藝之眞實，以代中國傳統文學之虛僞，所以當年文學改革運動不僅是個形式主義，且是一個實料問題。

獨秀當年最受人攻擊者是他的倫理改革論，在南在北都受了無數的攻擊，誹謗，及誣衊。我覺得獨秀對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正在這裏，因爲新的政治決不能建設在舊的倫理之上，支持封建時代社會組織之道德決不適用于民權時代，愛宗親過于愛國者決不是現代的國民，而復辟與拜孔，家族主義與專制政治之相爲因果，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獨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頭蛇尾的，所以才有這樣探本的主張。

獨秀在新青年八卷以前對社會主義的傾向全沒有具體化，但新青年自第六卷起漸注重社會問題，到第七卷的下半便顯然看出馬克斯主義的傾向了。自國民黨清共以來的立場論，共產黨是罪犯了。然清共以前，十三年改組以後，國民黨自身對于民衆運動之注意，特別任勞

工運動上，不在共產黨之下，則獨秀當年之創次路徑，只可看做前驅，不得視爲反動。

凡以上三事——文學革命倫理改造社會主義——是民國五年至十一二年中最大的動盪力，沒有這個動盪力，青年的趨向是不會改變的，青年的趨向不改變，則國民黨之改組與民革命軍運動之成事皆不得其前提。這個歷史的事實，不能因爲陳獨秀現在縲絏之中而抹殺之！

至於國民黨清共以後，陳在法律上是罪犯了，那時節他若被捉到，這問題到也簡單了。然而他于清共以後，不久便爲正統派的共產黨者開除，弄得中國既不能容，蘇俄又不能容，姑且利用上海之多國政治潛藏于一時。在這幾年中，我們一面偶然看到中國正統派共產黨即主持江西湖北殺人放火事業之共產黨，對他之猛烈攻擊，其重要口號之一便是「打倒陳獨秀主義」，一面又偶然在朋友處看見他求賣一部中國語音學的稿子，輾轉聽到他的窮困顛連。他現在是不是現行犯自有法律決定，但他背後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白色的和赤色的，是無疑的！

在記載他被捕事件之新聞中，頗有怪話。例如第一次北平各報登載他在工部局的口供，說：因反動被捕三次，第一次在北京，爲警察廳捕去。這正是五四運動後一個月他在北平大

世界散傳單被捕，還算是「反動」，眞正是工部局的話了。自工部局之基本立場看去，國民黨全是反動，現在不得已而與之妥協罷了。然而我們中國人看去，陳獨秀第一次被捕只是因爲反對北洋安福之賣國行動，而捕他者恰是國民黨所要打倒之軍閥！今天又有一個報上說，「緣陳獨秀前與李大釗同爲中國共產黨起初之重要人員，嗣李在北平被獲就刑，而陳遂銷聲匿跡。」嗟乎，李在北京之死，是就刑呢，是被害呢？李雖是共產黨員，然他是誠心與國民黨合作之人，他死在帝國主義與張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國民黨清共之前，然則他雖是爲共產黨而死，也爲國民黨的事業而死，是被害，不是就刑！否則今之國家豈不承襲了張作霖的正朔呢？

考慮陳獨秀與中國改造運動的關係，與國民革命之關係，與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關係，我希望政府處置此事，能夠(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付法院，公開審判，我並不要求政府非法寬縱。我希社會上非守舊的人士對此君加以充分之考量，在法庭中判決有罪時，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政府以其担負執法及維持社會秩序之責任，決無隨便放人之理

，同時國民黨決無在今月一切反動勢力大膨脹中殺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燄萬丈的大慧星之理！

論陳獨秀主義

蔡和森

這篇東西是共黨幹部派最高首領蔡和森氏，在陳獨秀未被捕以前所作，在這篇文字中，我們可以千眞萬確的相信，陳獨秀在好久以前。已竟離開了殺人放火斯達林派的共黨行列。他在數年前就結合了其往日的一部分同志，組創了反幹部派反所謂『國際路線』的共產主義的另一個政黨。他們反對紅軍蘇維埃，他們主義由眞正的國民會議建立民衆政權。共黨幹部派詛咒聲討陳獨秀的文字，我們也不知道讀過多少了，按着共黨幹部派的說法，陳氏久已是國民黨的好友，甚至陳氏此次被捕，幹部派的刊物中，說這是陳氏的『苦肉計』，這是陳氏變相的自首，今後陳氏將如膠似漆的貼在國民黨的懷中，獻替屠殺工農大衆，假設幹部派所說的全不錯，國民黨政權對陳氏之激顏厲色，吾人誠有些不解。陳氏之功過問題，總須蓋棺，始有定論，此篇乃係共黨內部反陳獨秀主義最有力最系統的一篇名著，特將其介紹於此，使國人在眞正之共黨口中，來瞭解陳氏的爲人。本篇作者之蔡和森氏，在共黨幹部派中乃是數一數二的首領。

二十一，十二，五日

一　陳獨秀怎樣參加了革命的行列

陳獨秀主義是什麼？是中國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中之機會主義和孟塞維克路線之典型的代表。所有從中國近時革命運動中發生出來的各種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自戴季陶主義，彭述之主義，譚平山主義，以至鮑羅庭主義，都可以且應該歸納在這一中國孟塞維克的總路線之中——即陳獨秀主義之中。

陳獨秀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而且帶着民族資產階級的理想跑到中國共產黨裏面來影響中國工人運動，原來是很明顯的。他是歐戰後中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的主唱者，美國式的『科學』和『民主主義』（新青年雜誌的兩個主要口號）的宣傳者；哲學上，他是從美國杜威博士的實驗主義進到法國啓蒙時代的機械唯物論。這恰好是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歐洲大戰時期中發展起來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表演。這一時毫的表演，在『五四』時期確是起了不少的革命用作。

憑藉在民族資產階級和學生羣衆的『五四』反日運動，漸漸的軟弱下來，而由此運動所引

現的北方工人運動（主要是京漢路工和唐山礦工）和上海以及廣東的罷工鬥爭，繼續不斷的表起出新的社會階級帶着偉大的革命力量跑出舞台。於是陳獨秀首先起來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學生羣衆說：『工人的力量比我們大些』。此時正當他們對於『五四』運動的前途發生悲觀，對於『五四』以後的發展方向發生徬徨，他們的先進分子正想『從下等社會』中找出自己的力量的來源和憑靠，這就不得不使他們看中了時髦的工人運動。因此陳獨秀同着他所影響時急進的智識分子就開始與胡適之派（新青年雜誌中的左翼）分化，改變自己的方向：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方向改變到社會主義的俄國方向；由凡爾賽會議和華盛頓會議改向遠東民族會議（一九二三年在第三國際旗幟之下召集的）。由此，陳獨秀成爲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

二　陳獨秀主義之『改良』與『進化』

陳獨秀主義不是忽然一下形成的，他的發展經過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大約可分爲四個時期，一九二三年黨的三次大會之前後建立了他的孟塞維克的路線之一般的理論基礎，一九

二六年三月事變前後以至武漢時期建立了他的機會主義的實際策略；武漢失敗至六次大會時，是他的動搖和消沉時期，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變後。進到公開的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總路綫，由取消主義進到『資產階級工黨』之叛逆的社會民主黨地位。

三　三次大會時代的陳獨秀主義

首先看他在黨的三次大會時期所形成的孟塞維克路線之理論的基礎。這一時期有他最典型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這兩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論的立場和傾向。

假若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陳獨秀看重過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那末，到一九二三年京漢路罷工失敗後，他就跑到孟塞維克的根本立場——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勢力。他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概括來說，是因爲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展，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

此時中國工人階級的理想界分爲三類：（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有許多目前雖是近代產業工人，而他過去未來的生活幷未能與獨立生產者（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的環境絕緣，不感政治的需要，並不脫神權，帝王之迷信………工人階級的思想尤是宗法社會的而非國家的………。第二，只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只在最進步的海員及鐵路工人罷工中才表現出來………。第三，眞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的階級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鬥爭之需要，都不曾感覺的工人，也並不是少數。』（『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固然中國工人階級不是沒有缺點的，可是陳獨秀經常的樂於從缺點方面來看中國工人階級。他在三次大會的演說中，簡直把中國工人階級咒罵得不成東西。什麼『宗法思想』呵！『不脫神權帝王迷信』呵！沒有『國家覺悟』呵！他舉了許許多多的瑣細事實來形容中國工人階級之『窮極醜陋』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上面所引的文章，是在大會閉幕後寫的，語句口氣已經比在大會爭論時客氣萬倍了。他在大會中從中國工人階級的落後，神權帝王迷信

及沒有國家覺悟的立場發出來的分析中國革命的動力，拚命的肯定中國工人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之後，他就很驕傲的說大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他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同上文)。又說：『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基礎(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此文是大會前二星期寫的)。他在大會的答辯中，熱烈地辯護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主人。

他對於農民怎樣呢？大會中的左翼曾提出工人階級與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的理論與他對抗，這在他看來簡直不值一笑，因爲中國農民更是宗法觀念，反動思想，神權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像』。大會閉會後，在他的論文中很客氣的這樣說：『農民佔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衆革命。但是，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慾望簡單，易於

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民難苟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

在他的革命勢力的計算中始終沒有農民。因爲他看定了三個原因，農民難於加入革命。試看他所計劃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綫：『中國的經濟狀況，軍閥階級已與資產階級顯然分開，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離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資產階級應當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妥協，打倒共同的敵對的軍閥階級……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當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一切時候，陳獨秀是把農民放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之外，他自始至終了解這聯合戰線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聯合，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階級合作和階級妥協，在這革命聯合戰線中資產階級是居領導地位，而無產階級是附屬的。

陳獨秀怎樣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呢？他說、『半殖民地的經濟權大部分操諸外人之手，政治權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諸本國貴族軍閥之手，全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在外國帝國主義者及本國貴族軍閥壓迫之下，有產無產兩階級共同起來，對外謀經濟的獨立，對內謀政

治的自由，這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

固然在黨的六次大會以前，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和任務全黨都沒有明確的觀念，然而如像陳獨秀始終不認識土地革命爲中國革命之主要內容，始終不認識而且不願認識工農民主獨裁制，這對於他完全不是偶然的，他說：『在普通形式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國民革命成功後，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如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但是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算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幹國民革命』（同文）。

那末，工人階級爲什麼目的要加入這革命呢？他說：『殖民地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意義就是對外要求民族之經濟的政治的獨立，對內則要求一般國民在政治上之自由。這種一般國民之政治自由，如集會結社罷工等之自由，正是中國工人階級目前至急的需要』（同文）。工人階級參加革命的目的就僅僅在這裏——不是爲得爭取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領導權，不是爲得工農民權獨裁制的勝利，更不在爭得革命之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這種轉變的觀念在他是完全沒有的。他同俄國的少數派一樣，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截然劃分爲兩

個不相連續的階段，即現在既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工人階級只有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和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再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對於農民運動也就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他說：

『所以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後國內產業勃興，然後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後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後農村間才有眞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

從以上所述，就可明顯的看出陳獨秀主義在第三次大會時期所形成之理論的基礎，——即中國革命的工人運動中之少數派的路線，他對於革命動力的估量——重視資產階級，輕視無產階級，而忽視農民；對於民主革命聯合戰線的了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妥協，無產階級隸屬於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對於革命性質和前途的觀念——看不見土地革命的內量，看不見工農民主獨裁而更沒有看見革命有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亂的幹國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自然資產階級的握得政權』，待資本主義發展之後，將來再來社會革命。所有這些就確確實實形成了中國少數派的總路線。從他的『

造國論』以至『汪陳宣言』以至中東路事變後的三封信，不過把這總路綫『一言以貫之』吧了！

爲什麼使他這樣呢？這不是偶然的，因爲他自始至終是站在左翼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影響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既然自始至終是站在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不能了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而只能了解資產階級的領導；不能了解土地革命，只能了解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不能了解工農民主獨裁，而只能了解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和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造國論之精神）；不能了解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必然要轉到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了解革命是停留在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階段之上，或完全跳過此階段。

陳獨秀在三次大會的立場既然如此，他當時發出些什麼具體的口號呢？『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沒有階級鬥爭，只有民族鬥爭！』『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此時是鬼話！』『等待和國民黨分家後，再組織共產黨不遲！』…………

三次大會閉會後，陳獨秀和馬林共同提議響應上海資產階級的民治委員會召集國民會議的張，辦法是請求國民黨發宣言，而不用共產黨名義發宣言。當時，我向他們抗議，才把

這一個企圖打消。難道現在陳獨秀的取消主義和叛逆是沒有歷史的深遠的來源？

四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陳獨秀主義之實際的應用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高潮，推動中國黨開始由智識分子的小團體變爲工人羣衆的黨。黨在這一高潮中起了相當的組織的和領導的作用。這一高潮首先就是證明中國無產階級之領導的能力與作用，打破陳獨秀馬林以至鮑羅庭等對於中國工人階級勢力之不相信和輕視。陳獨秀在相當的短時期中，似乎多少變動了對於革命動力的機會主義觀點。可是一到五卅末星——某某出兵鎮壓上海工人，郭松齡事變及吳佩孚攻取河南之後，又使陳獨秀對於工人階級勢力發生悲觀，對於時局發生不正確的估量。他同魏金斯基立刻修改以前堅决反對國民黨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漢時期就實行陳獨秀主義之機會主義的實際政策。

第一、改變只要左派國民黨的方針（堅决打擊右派，削弱中派和強大在中共領導之下的左派）號召國民黨右派合作，並送右派首領回廣東，這是三月事變的主觀原因之一。

第二、對三月事變完全採取無原則的退讓政策，並實行鄉村聯合戰線的機會主義策略，

阻滯廣東的土地革命。

第三、北伐開始後，即將獨立的工人運動隸屬於某人所要挾的民族利益之下，實行阻止和削弱罷工運動的方針；同時擴大鄉村聯合戰線的口號，去阻滯湖南高漲的土地革命。

第四、在上海工人三次暴動中實行『幫助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工人階級只要政治自由』的孟塞維克策略。

第五、對於已經開始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代表某某採取卑鄙的屈伏退讓政策。

第六、北伐出發，鮑羅庭同陳獨秀完全把廣東交於李濟琛，盛行『以甲制乙以乙制甲』的小政客式的上層政策。

上面這些機會主義的實際策略，就規定了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上海和廣東之大失敗。

現在再看武漢時期陳獨秀主義之實際政策。這一時期，陳獨秀主義與鮑羅庭主義混合起來，有名的西北學說的理論與實際成為陳獨秀主義之變形發展。他的主要內容是：(一)迴避帝國主義離開東南工業中心，接出馮玉祥同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二)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後再說，(三)取消所謂工農運動的過火，(四)向小資產階級讓步；(五)承認國民

黨的領導權，共產黨在政治上完全處於隸屬地位，(六)完全向汪精衛，唐生智投降，自動的承認退出國民黨和其政府，以換得共同打到南京去（詳見我的『黨的機會主義史』）。

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之斷送於陳獨秀主義及其變形的西北學說之手，難道還不顯明？

五 『以退爲進』

武漢失敗後，陳獨秀進到消沉與動搖時期。這一時期的特徵，他不僅頑固的拒絕承認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開始演進到取消主義和合法主義的階段。一九二七年七月底，他向臨時中央局提議：(一)把一切工會農會及政權機關轉移於國民黨左派；(二)我們在左派政權下進行下層羣衆日常工作，(三)暫時專做反帝運動，工農運動不要有所動作，以迴避大的犧牲和破壞，這就是他的『保全』自己勢力的方法——取消主義合法主義。

以爲資產階級完全勝利了，革命完全沒有了。現在要緊的只是怎樣迴避犧牲保全勢力——這就是陳獨秀主義發展到取消主義的根本精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時，他提出下列主張：(一)蘇維埃口號現在不宜採用，

(二)農民運動應在四不主義(不納稅，不還債等)的限度下進行；(三)中國共產黨不能一黨包辦革命，如譚平山等仍應與之黨外合作。

這一取消主義的『溫和』綱領，難道不是中國孟塞維克路綫之繼續向前發展？

六　陳獨秀主義之完成——從少數主義到取消主義

陳獨秀拒絕出席黨的六次大會，違抗兩年以來共產國際的電召；他只是口口聲聲說，共產國際『犧牲了我和平山』。然則他向那方而走呢？早就看得明白：他非走到反革命的營壘不可。某政府向蘇聯進攻的冒險事業，就成了他的最後的轉變。他向中央進攻的三封信，不外是『資產階級工黨』的大綱。

他對中東路事變的態度根本是站在資產階級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觀點上，絕對的與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觀點相反。這不是偶然的。因為他自來就是帶着資產階級國家主義的影響跑到中國共產黨內來，現在仍然不得不帶着這副本來面目跑出中國黨的隊伍之外去。所以他不關心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祖國之被攻，而且只關心於某派統治的中國之變為塞爾維

亞第二。他們的主要藉口是：『此時中國大多數民衆尙在眼前的具體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不能懂得擁護蘇聯的口號』。他所謂大多數民衆自然是把工人與資產階級混在一起。經過長期激烈的階級血戰之後的中國工人階級，在陳獨秀看來還是這樣落後，這樣不能了解擁護蘇聯口號。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他在一九二三年認定中國工人『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沒有國家的覺悟』，現在經過七年以上的鬥爭，中國工人已有了『國家的覺悟』即在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拿這個一九二三年他所說的中國工人對照起來已經是大進步了！陳獨秀先生！你不是沒有進步的呵，拿你的進步，與你所想像的中國工人的落後或進步去比較：你是進步得更遠了！中國工人只領導中國革命進到蘇維埃階段，而你却領導孟塞維克主義進到資產階級工黨：——進到公開反革命！陳獨秀先生，你不必拚命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口號』罷，你自己的『因對誤國政策』就是你們自己的階級口號；改組派同你們一樣的採用此口號！

陳獨秀對於革命失敗後的政權性質取了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這完全沒有什麼奇怪。因爲他自始至終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一切階級關係都用資產階級做中心來決定。看他怎樣說一九二七年的事變：

『這一種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和幫助，加增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對立地位之過程中變成殘餘之殘餘！為自存計，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這『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他所看到的主要的只是『資產階級取得勝利，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和幫助』，『封建殘餘受了最後打擊，……變成殘餘勢力之殘餘』。他絕對不會夢想到由這一轉變中國革命進到蘇維埃階段，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無產階級取得了中國之唯一的領導地位。這些小事情，在他是不會夢見的。為什麼呢？因為他的中國革命的圖表素來就是這樣預定的：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下，發展資本主義，再來做社會主義革命。

所以現在陳獨秀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完全過渡到托洛斯基主義，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是由某某所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完成了，封建勢力不存在了，帝

國主義讓步了，現在所有的事情只是等待提高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以後再來幹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不要了，以後直截了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陳獨秀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之共同立場。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口號，自來在陳獨秀腦中就沒有想過，直到現在依然不能設想。因爲他所能設想的，只是旣然叫做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那末一定是資產階級勝利，建立資產階級政權，那裏會有什麽工農專政這回事。中國資產階級從一九二七年以來已經勝利了，已經『形成了自己爲中心領導的統治者，並且已實現了這樣的統治，就是某派的政府』，再則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在陳獨秀看來簡直不可了解，他至死也不會了解，因爲這與他素來所設想的相去太遠了。他素來設想的革命主要動力是資產階級，若失了資產階級這革命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然則現在革命動力旣然把資產階級除外，而革命任務又要反對資產階級，——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什麽？

所以陳獨秀和托洛斯基接着就提出『國民會議』做目前政治任務的中心口號與中國共產黨工農民主獨裁和蘇維埃口號相對抗。陳獨秀自來就不贊成採用蘇維埃口號。托洛斯基咒駡在武漢失敗後，採取此口號是犯了罪惡。不是別的，只是因爲他們認爲某某已經完成了資產

階級的民權革命，現在所應有的任務只是召集國民會議來做議會行動，合法運動，及『取得一些自由』罷了，這不是新的，仍是發展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的取消主義的大綱。

在這樣的取消主義之下他們自然要拚命否認中國革命高潮，用反對『盲動主義』來做阻止與破壞高潮的藉口。陳獨秀由解列寧兩個波濤間的話來掩飾自己的取消主義，其實他武漢失敗時就宣言革命在很近的將來很難再起。從他看來中國的事變似乎已經証實了他與彭述之的革命階級論：現在這某政府穩定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長的歷史時期現在所有軍閥戰爭不過是資產階級發展的過程。托洛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就預言某人制度的穩定。國民會議的口號就是建立在他所估量的中國革命低潮上面。

陳獨秀把自己裝做是革命勢力『保全者』極力咒罵七八以來共產國際與中共新的政策如何犧牲了幹部如何喪失了革命勢力，那麼我們首先看他在武漢政變時用什麼政策『保全』革命勢力；他同鮑羅庭規定投降的政策來『保全』革命勢力——自動退出某黨某政府，把一切革命領導權政權工農組織交給國民黨左派，用『適合工商業利益的政綱』同汪唐共同打倒南京去。上帝呵！假若此時沒有共產國際堅決的出來打碎你們這一『保全』革命勢力的投降政策，

還有今日布爾塞維克化的中國黨嗎？還能取得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之唯一的領導地位麼？你們自命爲革命勢力的『保全』者和反對盲動主義的英雄，實際你們只是可恥的投降者，頑固的叛徒。再看你們七月會議的大綱十一月的大綱（一九二七）以至中東事變後的大綱，難道你們革命勢力的『保全』者之假面具還不顯明麼？

七 陳獨秀怎樣在『理論』上進攻革命

陳獨秀現在全身投到托洛斯基的懷裏，用托洛斯基的旗幟來迴護他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來破壞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來進攻共產國際。他無恥的宣言他的錯誤是在所謂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領導之下做出來的，他宣言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路線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及工農民主獨裁，而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盲動主義的策略。他咒罵現在工農革命的高潮爲『土匪式的擾亂』，侵犯了資產階級的『勝利』與『穩定』，使他們國民會議和資本主義發展的計畫遭遇困難。他不要臉的誣衊『國際的指導却在當進攻的時候教中國黨投降，當退守的時候教中國黨胡亂的拚命』。他認爲一切罷工鬥爭，街頭示威游擊戰爭都是盲動主義，都是土匪式的擾亂。他不僅咒罵中國黨的領導機關爲官僚主義，他更咒罵『國際的領導站在官僚主義

的路線上』。

還在武漢失敗時陳獨秀同鮑羅廷就說『如果說中國黨是犯了機會主義，那末，根本這機會主義就是季諾維也夫領導的國際教我們的，國際教我們加入國民黨，教我們幫助蔣介石』。照陳獨秀的見解，加入國民黨就是『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是鬼話』。這樣叛徒的思想難道是一九二三年國際教你們的？斷送上海暴動的勝利，對某人卑鄙讓步與幻想，隸屬工人階級於民族資產階級之下，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工農運動的『過火』，以至向汪唐投降……難道這些是國際教你們的？現在你們的假面具要算完全揭穿出來：你們根本否認工農民主獨裁的路線，認爲機會主義的路線，因爲這一路線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路線，是要建立蘇維埃的中國，保證他迅速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完全違犯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陳獨秀主義之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陳獨秀同某人等一模一樣的咒罵『共產國際破壞中國革命』。

八　陳獨秀主義的康莊大道——社會法西斯蒂

中國革命運動中之有少數派路線和半少數派路綫——托洛斯基主義——現在也如俄國一樣的：假如托洛斯基主義在俄國革命中表面上能維持一種與布爾塞維克對立的第三種路線和第三種派別。那麽在中國他（托洛斯基主義）一開始便與取消主義的陳獨秀主義完全混同，以與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路線相對抗。這完全是自然的，因爲一九二八年以後的托洛斯基主義已經從半孟塞維克的性質完全進到反革命。所以現在托洛斯基派與陳獨秀派在中國所進行的不止是「八月聯盟」而且立即進到「資產階級工黨」的地位，這不是偶然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現在中國比八月聯盟時的俄國，階級鬥爭的劇烈與革命復興的狀況要不同些，現在中國（一九二七年以來）的階級鬥爭這樣的劇烈，與托洛茨基主義混合的陳獨秀主義以及托洛次基主義的本身必然迅速進到社會法西斯蒂主義。陳獨秀派馬玉夫等在上海工人鬭爭中的工賊行爲就表徵了這一社會法西斯蒂的前途——不是遠的將來的前途，而是目前的非常之近的前途。

這一社會法西斯主義必然成爲民族法西斯主義的補充和助手。

所以對於陳獨秀主義和托洛次基主義的鬥爭就成爲中國共產黨最重要任務之一。對於這

陳獨秀主義

種鬥爭的絲毫猶疑或調和態度就是幫助了反革命。

九　陳獨秀主義與孟塞維克社會民主黨有『區別』麼

對陳獨秀主義的性質階級基礎以及其前途之不正確的了解就要弄弱對於他們的鬥爭。比如鮑羅廷在討論陳獨秀主義時（在莫斯科中國科學研究院）開口便說：『陳獨秀主義與西歐的孟塞維克主義有區別麼？我以爲在業已走到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歐洲孟塞維克主義，與中國的孟塞維克主義之間是有區別的。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說他同歐洲的孟塞維克是一樣的——這是不正確的。這個意義就是我們承認在中國已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而資產階級已站在政權上，孟塞維克已在中國起社會法西斯蒂主義的作用。不能斷定中國孟塞維克主義走到歐洲社會法西斯主義，因爲中國革命的道路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是必不可免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所以說不上中國有資產階級的發展道路……所以陳獨秀與他派別即中國少數派完全不要妄想他們與其歐洲兄弟——即帝國主義國家孟塞維克起同樣的作用，換過說，中國孟塞維克沒有任何前途』。

又有一個同志用書面這樣的寫着：『假如我們現在再提出一個問題：陳獨秀主義代表什

麼東西，他的社會基礎怎樣？那麼我們明白看出一種回答，以爲陳獨秀代表將來的中國社會民主黨——這是不正確的。社會民主黨有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傾向，有工人貴族做基礎，而且只有在財政資本和剩餘贏利發達的地方才有地位。以爲陳獨秀和他的派別會成爲中國社會民主黨那就會錯誤。因爲要做出這樣的結論就須要設想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即開始第二個資本主義時代。照我的意見他的社會基礎就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他們一方面是自己的社會地位與中國資產階級．一部分買辦資產階級有關係的自由職業者學生等，另方面沒有脫離半封建地主的關係』。

上面的見解可以說是補充勉羅廷的。他們做出陳獨秀主義與歐洲孟塞維克主義的區別，在陳獨秀主義不會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主要理由是中國不是財政資本的國家，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沒有工人貴族等等。這種不正確的區別和否認，不僅是建立在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之機械的對照上面，而且建立在對於中國階級關係之不正確的了解上面。所以對陳獨秀主義的性質作用及其階級基礎就發生不正確的估量。

陳獨秀主義在他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證一般的證明是在中國工人運動內來執行中國資產

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無論陳獨秀及其派別的個人大部是由上而所引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出身；但當我們要正確的判斷陳獨秀的主義性質、作用及其代表的階級基礎時我們就不得不：一方面指出他是在中國工人運動內來執行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另方面指出他是代表中國式的貴族工人（工頭及少數的高等熟練工人等）及一部分被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影響包圍的落後工人。不指出這兩點就不能正確的了解陳獨秀主義的性質及作用，也就不能正確的了解陳獨秀派與改組派及其他資產階級派別的區別，和他（陳獨秀主義）的危險之更大。

陳獨秀主義代表中國式的貴族工人和被資產階級影響的工人，故自來就看不起中國的工人階級的努力，而欲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利益之下。陳獨秀主義和歐洲孟塞維克主義在一切根本問題上——如階級關係，革命動力之不正確的了解（崇拜資產階級，輕視無產階級與農民），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及政權性質等等沒有任何區別，在工人階級內來執行資產階級的影響更沒有任何區別；在代表貴族工人和被資產階級影響包圍的落後工人的一點上也找不出嚴格的區別。毫無疑義的現在陳獨秀主義是隸屬於民族改良主義下的社會改

良主義（如四不主義，限制工人運動的部分的鬥爭，而反對工人的政治進攻，宣傳國民會議等等）。所以中國的孟塞維克主義也如西歐一樣，必然要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至且正在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否認陳獨秀主義之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前途，就等於否認陳獨秀主義之孟塞維克的性質。如果要在他們之間找區別祇能說中國孟塞維克主義轉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速度比歐洲的特別快些。因爲在中國發展社會改良主義至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條件遠不如西歐之具備。如果這一轉變在歐洲經過一個長時期的過程，而在中國這一過程却是非常之迅速的。這不僅由於中國是殖民地的國家不能與帝國主義國家之資本主義的發展相比較，而且也是由於世界革命時期，尤其是中國階級鬥爭特別劇烈，不能容許中國資產階級工黨如歐洲社會民主黨一樣經過一很長的發展時期才轉變到社會法西斯主義階段，祇有在這樣的觀點上，不能籠統的說陳獨秀派完全同歐洲社會民主黨一樣。因爲他的命運特別短促和不固定，他的發育特別困難。

以爲指出陳獨秀主義必然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就是設想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這樣機械的可笑論調，完全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鮑維廷主義近年以來顯然趨向於完全否認資

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他把民族資產階級通看爲買辦資產階級。鮑羅庭主義對於中國的階級關係又復活了彭述之主義的「新」解釋。

鮑羅庭主義否認陳獨秀主義之必然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這對於中國黨與陳獨秀主義的鬥爭是很有害的。鮑羅庭主義是陳獨秀主義的兄弟。這一否認的意義就見辯獲陳獨秀主義，

十　陳獨秀主義的諸友軍

對於陳獨秀主義之狹義的不正確的了解也是很有害的。以爲陳獨秀主義就是陳獨秀個人和其團體而與其他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以至現在還隱藏在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沒有思想上路線上的聯繫。所以爲要充分的制勝黨內右傾的危險，現在主要的危險，必須充分的了解陳獨秀主義爲中國革命中之孟塞維克路線與各種已發生，以及正在發生的機會主義與傾向有密切的思想上的關係。我們單從陳獨秀的本身還不能充分了解陳獨秀主義，縱然陳獨秀自己在機會主義的理論方面和實際方面已做出整個的系統(如以上所述的)。我們必須更從中國革命中之已發生的各種機會主義派別，來觀察這一孟塞維克的路線與系統。

首先來看戴季陶主義。他以民族利益爲『最高原則』。換句話說，以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爲最高原則，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之下；拚命的反對階級鬥爭，也無異是發揮一九二三年陳獨秀『只有民族鬥爭，沒有階級鬥爭』的原則。假若陳獨秀主義在五卅高潮時曾反對過戴季陶主義。那末從五卅末期和三月事變開始陳獨秀主義在客觀上就成爲在中國工人運動中之戴季陶主義的執行者——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利益之下。一直到中東路事變陳獨秀提出的『反對誤國政策』的口號還是隸屬於戴季陶的最高原則之下。

再看彭述之主義，彭述之主義的特質就在用左的浮詞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來幫助陳獨秀主義進行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口頭上很漂亮的叫『天然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實際上把革命領導權奉送於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彭述之主義的幫助，陳獨秀主義在黨內之宗法的統治與黨外實際機會主義的政策的發展不能那樣順利。

再看譚平山主義，他在戴季陶的最高原則之下宣佈『中國革命要得眞正的成功，一定要以廣大的勞苦平民爲中心，聯合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構成民族階級與帝國主義作整個鬥爭才能實現。故中國革命充滿了階級性，就是說中國革命的鬥爭，就是一種階級鬥爭，就是無產

者國家與有產者國家的鬥爭』。譚平山的民族階級和無產階級者國家，可謂把戴季陶的最高原則發揮盡致了，譚平山比戴季陶聰明些，他不反對階級鬥爭，只把階級鬥爭翻譯成爲『被侵略的無產者民族與侵略的有產者一種劇烈的階級鬭爭』。陳獨秀比譚平山又聰明些，他現在率性用托洛斯基主義來防護中國不變爲塞爾維亞第二。

十一 鮑羅庭主義

最後不能不說到陳獨秀主義一個重要的伴侶——鮑羅庭主義。武漢時期鮑羅庭主義與陳獨秀主義混合爲一個東西，此處不用贅說。現在所說的，只是一九二七年後，鮑羅庭關於中國問題最近的見解和態度。

在討論陳獨秀主義時(在中國科學研究院)，鮑羅庭宣言他在中國革命中的錯誤，在於他與陳獨秀之間發生了重大不同的政見，而他沒有把這不同的政見引到公開鬭爭；他宣言當時有廣東路綫與上海的路線對抗；他的結論是：假若他的路綫與陳獨秀的路線引起公開鬥爭，那就不會有武漢時期那樣的失敗。

不是一九二七年以後生長的人，大約不會相信鮑羅庭的話是眞實的罷！然而不然，竟有

同志公開出席替他辯護。可見鮑羅庭主義在我們黨的隊伍中直到現在不是沒有保留重大的影響和殘餘。這一殘餘保留在黨內終於有復活陳獨秀主義的危險。所以在反陳獨秀主義的鬪爭中央不能把鮑羅庭主義除外。

鮑羅庭在中國革命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假若說陳獨秀是中國的蒲蘭德爾，那末，鮑羅庭就是中國的拉狄克。所以他對於我們黨內同志的影響不是值不得注意的問題。

首先看他對於中國階級關係的新見解：

『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相互關係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當時壟斷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經紀地位的，是以皇帝為首的高等官僚貴族………第二個時期………即你們所知道的買辦階級；………最後第三個，就是現在我們所處的時期，這一個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已在排擠第二時期的中間人，排擠買辦階級而開始與帝國主義發生各種相互關係』。

『………資產階級企圖廢除不平等條約，不外是企圖在中國創造一種條件，在這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更能密切與帝國主義聯繫。不僅在大商埠條約上給他與帝國主義聯繫的可能，而且在全中國。換一句話即為帝國主義肅淸在中國道路上一切的障礙，實現買辦性質於新

形式中，在新環境中，於極廣大的範圍中」。這在鮑羅庭主義的信徒看來，要算是極革命的極響亮的高調了。看他的下文說些什麼：

『講到這一點還必須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完全是另外一個程序的資產階級，就是這樣的資產階級：他要把中國工業化的大道上的障碍物掃除，準備同國內的封建勢力以及與封建勢力勾結的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然而我們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資產階級』。

『當我們說到民族資產階級還極弱時，我們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不是企圖壟斷中國與帝國主義間之經紀地位的資產階級，但是有點工業資產階級傾向的民族資產階級，那末我們就應當說這種資產階級現在還不能引導中國到工業發展的道路上去，因爲這種資產階級現在還極弱』。

原來鮑羅庭主義把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同化之後，還保留一『不企圖壟斷中國與帝國主國間之經紀地位，準備同國內封建勢力及與封建勢力勾結的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極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現在還極弱還不曉得把中國引到工業發展的道路上去。而其將來怎樣呢？這點他雖沒有明說，但讀者不難從他的觀點做出結論，就是從鮑羅庭主

義的中國階級關係的觀點非走到復活『民族資產階級還有革命作用』的機會主義不止。

鮑羅庭接着上文就來估量無產階級：

『這種資產階級在中國現在是極弱的。由此就可明瞭中國無產階級也充分的弱，數量太少，他的年齡，總共不過幾歲。他的基本羣衆不在中國內地，而在租界，完全與中國隔離的香港一類的地方。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漢口你們有工業無產階級基本羣衆，而在中國其他各地，工業無產階級在眞正的字義上是很少的』。

鮑羅庭新的『租界無產階級論』的論證仍然回復到自己老的西北主義的結論，就是遠居上海、香港等租界之中國無產階級很難領導中國的農民，中國革命很難憑籍大城市的領導。所以在反動統治下，職工運動的工作沒有什麼前途，唯一重要的是農民遊擊戰爭。中國全體共產黨都要加入遊擊戰爭，如歐洲共產黨全體參加工會工作一樣。鮑羅庭主義的根本精神，自始至終，如陳獨秀主義一樣，懷疑與不相信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鮑羅庭主義不僅不相信中國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領導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中國革命之可能。他說：

『中國無產階級的缺點，在數量上，年齡幼稚上及其他方面，這些缺點之百倍的補償，就在不能把中國革命，中國無產階級從其他世界分開。假若拿中國無產階級從印度無產階級，和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特別蘇聯的無產階級分離起來，那末，自然不待說對於指導基本聯盟的農民他要遭受莫大的困難。假若中國無產階級是分離的，那末就很可懷疑到他是否能成就擺在他前面的偉大任務，即關於指導農民與封建殘餘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等等。但假若拿他與印度無產階級，各國無產階級，特別蘇聯無產階級共同來看，那末中國無產階級之必不可免的歷史的缺點就百倍的補償起來了。從這樣的觀點看來，中國無產階級較強於中國資產階級』。

這是多麼漂亮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呵！托洛斯基不相信俄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鮑羅庭却比較更進一步不相信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中國革命之可能。

中國革命之社會主義轉變利社會主義的建設之必須依靠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幫助，尤其蘇聯的幫助，這是毫無問題的，中國革命之須要國際無產階級幫助也是毫無問題的。可是照鮑

羅庭的觀點，就完全是不對的。從列寧主義的觀點；中國革命不僅有自己的充分的力量，而且他能促進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以及東方各殖民地革命；中國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強有力的理由，不僅在於與國際無產階級聯合的觀點上，而尤其在中國內部階級勢力之對比上。鮑羅庭主義完全與列寧主義相反，從他自己的階級關係的分析，他斷定中國無產階級比中國資產階級更弱些，只有在與世界無產階級聯合的觀點上中國無產階級較強於資產階級。所以他把中國革命的命運完全建立在國際無產階級的依賴之上。

鮑羅庭主義的信徒以為鮑羅庭同陳獨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他極看重農民勢力，着重游擊戰爭；縱然他在武漢時期與陳獨秀共同阻止了土地革命，而現在他却與陳獨秀『根本』相反，他『異常』看重土地革命。現在來看他對於農民問題政見！

『現在說到農民方面。與農民的關係的問題，必須指出下列的根本要點：一、是不是眞的在中國鄉村中已發生這樣的階級變遷，其結果已使富農分化，而這富農已同着資產階級組成南京的政權，所以需要與富農鬥爭。我不否認中國鄉村有富裕的農民之存在。但是應當說明富農是什麼，其意義就不能與我們（指蘇聯——森註）所了解的一樣，不能搬運革命以後

的我們所有的富農觀念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國所有富農的觀念上去。這個不是一樣的富農。說到中國農村，那就必然須要一個全體農民的共同民主的戰線去反對封建制度，反對軍閥制度反對一切封建基礎的上層建築，反對帝國主義等等（以下大大地引證列寧——森註）。土地革命在中國只有憑靠在中國農村的統一戰線上才有可能』。

此外關於國際狀況，他做了以下的肯定：『無論怎樣還沒有牢不可破的論證，證明在最近的將來，在太平洋上美與英日就發生武裝衝突。美在中國將採取最謹愼的政策』。

上面一切的話都是從鮑羅庭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名的大報告中引出來的。這是新的變態中的機會主義的大系統，是西北主義之繼續發展：在中國革命的一切的根本問題上——階級關係無產階級領導權對農民的策略及革命前途等——是與共產國際和列寧主義的路線不能并存的。假若拿了現在的鮑羅庭主義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以及一九二三年的一切機會主義去對照，便可看出中國革命中孟塞維克路線之一貫的線索。這一路線的中心點，是在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和對於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統一戰線之孟塞維克的了解從隸屬無產階級於資產階級（武漢時期以前），做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的尾巴（武漢時期）以

至聯合富農。假若陳獨秀在一九二九年用托洛斯基觀點來攻擊中共中央之業已改正的聯合富農的錯誤，那末鮑羅庭在同年就企圖恢復以前鄉村聯合戰線的機會主義策略與譚平山的『民族階級』和統一戰線的理論內外相應。由此不難推想：假若中國共產黨眞正執行反富農路綫到底時，陳獨秀主義便會同鮑羅庭主義一樣暴露其代表富農的眞面目。

十二　澈底肅淸陳獨秀主義的影響

陳獨秀主義一直到今有他的三個不可分離的機會主義同盟：即彭述之主義，鮑羅庭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彭述之主義早已喪失其獨立的影響，因爲一方面他早已熔化於陳獨秀主義，另方面鮑羅庭主義已攝取了他的精神。所以現在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庭主義實成爲陳獨秀主義左右之手。假若陳獨秀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的共同點在忽視土地革命，忽視農民爲革命的動力及不了解工農民主專政；那末陳獨秀主義與鮑羅庭主義的共同點就在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勢力與領導，輕視中國革命之內部的階級力量，及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解爲隸屬於資產階級——自民族階級以至鄉村資產階級的通常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與陳獨秀主義的堅決鬥爭，同時就要來打擊他的左右手，——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庭主義。

公開的陳獨秀派和托洛斯基派在表面上現在雖然已驅逐於黨外了，但他暗藏在黨內的影響的特別是他的反軍鮑羅庭主義的影響還很嚴重 不少的同志在思想上還不能完全從他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如對於富農，對於階級關係，職工運動和游擊戰爭之不正確的了解等）。這樣的現象在反陳獨秀主義的鬪爭中決不應當忽視。爲要徹底肅清陳獨秀主義在黨內的殘餘，就要求這些同志在以後能自覺的與陳獨秀主義的同盟者鮑羅庭主義在思想上完全脫離關係。不然，黨就應該作不容情的鬪爭。

十三　結論：列寧主義的正確路線

與陳獨秀主義鬪爭的任務的尤其要執行於一切實際工作，羣衆工作，黨的生活及一切目前所發現的各種各樣的不正確傾向的鬪爭之中，一切尾巴主義，黃色傾向，失敗情緒，合法主義，和平發展傾向，黨內調和傾向，盲動情緒，保守觀念，極端民主化等等，如若任其發展都可變成陳獨秀主義的支流；隨時隨地制勝這些傾向，其意義就是制勝陳獨秀主義。中國革命中和我們黨中的危險現在主要的是右傾的危險。譬如富農路綫的錯誤，在上級指導機關，雖然改正，但在實際工作上和在下級黨部中，嚴格的說，還是沒有改正過來，有些地方還

正在發展。反對農民分土地，固然是富農路綫。同時就是在分土地之中發現了富農路綫——如閩西分土地定出以生產工具及資本爲標準，顯然的是富農路綫；同時在閩西蘇維埃區域中『不要增加工人工資』之不正確的提議也開始發現。

爲要制勝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首先要求對於革命的性質，目前階級關係的變遷，及革命發展的形勢有正確的了解和估計；對於這些主要問題的絲毫錯誤都是幫助了陳獨秀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幫助陳獨秀主義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誇大資產階級，看不見封建殘餘勢力，因此完全忽視土地革命；而事實上是企圖幫助資產階級來建立他們所夢想的『穩定』去實行國民會議制度；鮑羅庭主義幫助陳獨秀主義停留於他所了解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階段；誇大封建勢力，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企圖貫澈把中國革命隸屬於資產階級利益之下的路綫，即把以前隸屬於城市資產階級的路綫變成隸屬於鄉村資產階級的路綫。這一孟塞維克路綫的危險在目前是非常之有害而帶現實性的主要危險。在托洛斯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利鮑羅庭主義，兩者都絕對沒有目前階級關係規革命任務的正確觀念，尤其兩者都絕對沒有革命轉變的觀念——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我們有些同志在反對陳獨秀主義的過程中，常常發現托洛斯基主義的錯誤觀念，或鮑羅庭主義的錯誤觀點，尤其是後者佔多數。常常有人把反對富農的路線與反對地主的路線對立起來，常常不了解在中國土地革命中之反富農是同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之反資產階級的總路線是一致的：常常有人過於誇大封建勢力而完全否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因此，又隱隱的發現復活以前的兩個革命階段論的傾向而完全忽視革命轉變的觀點。這些都證明右傾是中國共產黨目前之主要的危險之表徵。他們不能正確的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及過程：常他們『嚴格的』區別革命的性質及任務時，就連說到革命的過程——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時，也把他完全劃成鴻溝，以爲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有一道『萬里長城』（陳獨秀主義和鮑羅庭主義就是這樣看法）；或則完全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而不自覺的墮落到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這種『左的』錯誤實際是帮助了陳獨秀主義。

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是長的過程，但有快的速度之可能，因爲他具有很優越的轉變的條件——國際的和國內的。國內的條件，如一九二七年以來，無

產階級取得了中國之唯一的革命領導權；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蘇維埃區域之建立，無地的貧農僱農，苦力以及地少的中農佔鄉村人口之絕對多數；城市大工業具有相當的經濟前提，（此前提在工農民主專政的過程中更會大大的加強）：最後尤其是中國革命之反帝國主義的特性，和反資產階級的特性，——自城市資產階級以至鄉村資產階級。中國農民基本羣衆已在而且正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反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國際的條件，如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之大工業化與農村的集產化之異常迅速的發展，歐美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及印度等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高漲，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資本主義的『穩定』不謹劇烈動搖而且開始崩潰。這些條件對於中國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都有決定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應堅決的明確的站在共產國際列寧主義的路線上，來執行中國革命目前階段上的任委，同時準備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前提。他絲毫不爲企圖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左的』機會主義托洛斯基主義所動搖。同時，更絲毫不爲企圖停留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右的機會主義鮑羅庭主義所動搖。他一定要澈底的克服陳獨秀主義及其左右手的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庭主義；他一定要領導現在的革命高潮迅速進到直接革命形勢

，推翻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由工農民主獨裁轉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獨裁制。

打倒陳獨秀主義及其左右手——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庭主義！

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胡適

在北大講演

北大國文系文學講演一科於十月三十日，特請胡適講演（陳獨秀與文學革命）茲將胡演詞紀述如下：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這本來是國文系同學研究的材料，想不到報紙上登出去，變成公開的了。陳先生與文學革命的關係，是很有討論的必要的一個問題，在民國六年，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爲我們雖抱定不談政治的主張，政治却逼得我們不得不去談牠。民國六年第二學期陳先生來到北大，七年陳先生和李大釗先生因爲要談政治，另外辦了一個（每週評論）我也不曾批評牠，他們向我要稿子，我記得我只送了兩篇短篇小說的譯稿去。民國八年，五四以後，有一天陳先生在新世界（香廠）散傳單，因爲前幾天在報紙上看見陳先生的口供，說他自己因爲反動，前後被捕

三次，在此地被捕一次，就是因爲在香廠散傳單。那時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內，大家印好傳單，內容一共有六條，大概因爲學生被拘問題。有一條是要求政府免去衞戍司令王懷慶的職，懲辦曹章陸三人……到了十一點鐘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車上一邊談，看見有沒關門的舖子，我們又要給他一張。我還記得那時是六月天氣正熱，我們夜深還在談話，忽然報館來電話，說東京大罷工，我們高興極了；但一會又有電話，說自你們走後，陳先生在香廠被捕了，他是爲了這種事被捕，然而報上却載着他是反動！這是反動，那麼現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動？『反動』抹殺了許多事實，他怎麼能算是反動？

今天這個題目，說起來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爲我們既是同事，而且主張也頗相同。在民國十二年，上海出版了一部（科學與人生觀論集）那時陳先生已經同我們分別到上海去了。這部二十萬字的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陳先生也寫了一篇，他極力反駁我，質問我，陳先生那時已轉到馬克斯主義那方面去了。他問我所說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可以解釋大多數的話，能否再進一步，承認牠能解釋一切。他說白話文也是因爲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才產生出來的，他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般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

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話文，祇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烟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他是注重經濟的條件的，我也沒有反駁他，因爲他不否認人的努力，兩個人的主張不算衝突，不過客觀的條件雖然重要，但不僅限於經濟一個條件，至於文化的條件，政治的條件，也是不能否認的。

陳先生與新文學運動有三點是很重要的背景。

(1)他有充分的文學訓練，對於舊文學很有根底，蘇曼殊章行嚴的小說文章，他都要做個序子，這是散文方面的成績。說到詩他是學宋詩的，在甲寅雜誌他發表過許多作品，署名(獨秀山民)(陳仲)(陳仲子)他的詩有很大膽的變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說是完全白話的，是一種新的創造。他更崇拜小說，他說曹雪芹施耐庵的紅樓夢水滸傳比較歸有光姚姬傳的古文要高明的多，在那時說這種大膽的話，大家都驚異得很，這可見他早就了解白話文的重要，他最佩服馬東籬的元曲，說他是中國的。Shakespeare

(2)他受法國文化的影響很大，他的英文法文都可以看書，我記得青年雜誌(即後來的新

青年）上，他做過一篇「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表示他極端崇拜法國的文化，他說法國人發明了三個大東西，第一是人權說 Rights of men 在一七八九年法人 Lafayette 做「人權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l'hommes) 美國的獨立宣言也是他做的。第二是生物進化論，法人 Lamarck 在一八〇九年做「動物哲學」其後五十年才有達爾文出來，第三是有三個法國人 Babeuf, Saint — Simon, Fourier 是馬克斯的先聲，首開社會主義的風氣。但另外還有一點，陳先生沒有說到，就是新文學運動，其實陳先生受自然主義的影響最大，看他一篇「歐洲文藝談」把法國文學藝術的變化分成幾個時期，一，從古典主義到理想主義（即浪漫主義），二，從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三，從寫實主義到自然主義，把法國文學上各種主義詳細地介紹到中國，陳先生算是最早的一個，以後引起大家對各種主義的許多討論。

（3）陳先生是一位革命家，那是我們許多青年人在美國留學，暇時就討論文學的問題，時常打筆墨官司。但我們只談文學，不談革命，但陳先生已經參加政治革命，實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謂大世家，但因戀愛問題及其他問題同家庭脫離了關係，甚至他父親要告他，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踏，賞個面子，但

他却說「舖子不是我的，」可見他的精神。在袁世凱要實現帝制時，陳先生知到政治革命失敗是因爲沒有文化思想這些革命，他就參加倫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許多基本革命的信條：一，自主的不是奴隸的，二，進步的不是保守的，三，進取的不是退隱的，四，世界的不是鎖國的，五，實利的不是虛文的，六，科學的不是想像的，這是根本改革的策略。民國五年袁世凱死了，他說新時代到了，自有史以來，各種罪惡恥羞都不能洗盡，然而新時代到了，他這種革命的精神，與我們留學生的消極的態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時所主張的不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藝術一切文化的革命！

民國四年甲寅雜誌最後一期有兩篇東西，一篇是學校國文教材之商榷，反對用唐宋八家的文章做材料，要選更古的文章，漢魏六朝的東西做教材，這是一趨勢，又一篇是通訊，名記者黃遠庸寫的，（他後來在美國舊金山被暗殺了）他說：「愚見以爲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起說，洪範九疇，亦祇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遠意當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愛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週，……」章士釗答他說文學革命須從政治下手，此又一潮流。但陳

先生却恭維自然主義，尤其是左拉 Zola。有一個張永言寫一封信給他，引起他對文學興味，引起我與陳先生通訊的興味，他說現在是古典到浪漫主義的時期，但應當走到寫實主義那方面去，不過我同時新青年第三號，上有一篇謝无量的律詩「寄會稽山人八十四韻」，後面有陳先生一個跋：「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國民此種精神委頓久矣，謝君此作，深文餘味，希世之音也。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只有此工力，無此佳麗，謝君自謂天下文章盡在蜀中，非夸矣，吾國人偉大精神，猶未喪失也歟？於此徵之。」，他這樣恭維他，但他平日的主張又是那樣，豈不是大相矛盾？我寫了封信質問他，他也承認他矛盾，我當時提出了八不主義，就是「改良文學芻議」，登在新青年上，陳先生寫了一個跋。

他想到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他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我的詩集叫「嘗試」，刊物叫「努力」，他的刊物叫「響導」，這篇文章又是「文學革命論」！他的精神於此可見。他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兩點：一，改我的主張進而為文學革命，二，成為由北京大學學長領導，成了全國的東西，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說莊嚴燦爛的歐洲是從革命來的，他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為中國文學闢一個新局面，他有三大主

義：（1）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2）推倒陳腐的舖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3）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通俗的社會文學，他願意拖了四十二生的大砲爲之前驅，打倒十八妖魔：明之前後七子和歸，方，姚，劉！這就是變成整個思想革命！

最後，歸納起來說，他對於文學革命有三個大貢献：

（1）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

（2）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

（3）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

其他關於陳先生的事，可以看獨立評論第二十四期傅斯年的『陳獨秀論』。

由陳獨秀被捕說到中國共產黨分化之趨勢

金玉振

——載北方公論——

陳獨秀是一個久已成名的人，不只在中國現實的政治上播佈了他的影響，即在歷史上也有了他的地位，關於他的功罪問題，吾人不欲有何論斷，願留待史學家批判。他現在已竟是階下囚了，自此鉅案發生之後，社會輿論一致表示援助，有人說他是佔了牛蘭的便宜，他的老同志說他對現政府已表示投降，這一切之一切的揣度，都是撲朔迷離，即全國最有權威的報紙，關於陳案亦不脫俗的人云亦云，究竟今日的陳獨秀與往年的陳獨秀有何不同，他此次被捕政治上的意義如何？影響如何？至今日止，尚未見有人能很客觀地，描寫出來。本篇乃一本刊之讀者投稿，此中關於陳氏可歌可泣之政治行程，刻畫盡致，至其被捕之意義及其前途，所論莫不入木三分，本刊爰爲之發表，以餉讀者。

編者附誌

提起陳獨秀的名字，全中國當然很少不知道的。這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中國共產黨之最初的組織者。前些年間，陳獨秀完全站在中國青年思

想界的領導地位，有左右全國青年及全國文化趨勢的威力。僅因爲國共的分裂，使陳獨秀不敢公開活動；僅因爲共產黨內部的分裂，使陳獨秀失却全黨之唯一的領導的地位。於是，最近數年中，陳獨秀活動的範圍總日益狹小。然而，陳獨秀在全國政治思想界的活動範圍固然縮小了，可是，他在中國目前之秘密的共產主義運動中，仍然發生非常鉅大的作用。不過這種作用，已經不是共產主義的組織者，而是反對共產主義之勢力的組織者，這是他與從前不同的地方。

從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革命以後，中國社會思想界首先受到俄國影響的就是陳獨秀。第一次代表蘇俄政府與中國南北當局接洽中俄外交關係的越飛，在中國風聞陳獨秀的大名而委以籌備中國共產黨的任務，自一九二〇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廣州三月二十日事變，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之唯一的領袖，儼然有現在史達林在俄國共產黨中所佔的地位。中國共產黨能有初步的發展，要以陳獨秀之力量居多。那時候中國共產黨內部已有一些較小的派別鬬爭，可是，陳獨秀的領導，能以維繫中國共產黨的統一而不生破裂。廣州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後，北伐開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裂痕已經暴露，共產黨內部的爭論問題也隨着加

多。這時候廣東鮑羅廷與陳獨秀時常發生爭辯。廣東一部分共黨多服從鮑羅廷的指揮。因爲鮑羅廷是俄國人的緣故，所以鮑羅廷當然不能奪去陳獨秀的領導位置，不過陳獨秀的權威由此稍微發生動搖，這是從那時候便已經開始的事。北伐軍佔領武漢以後，共產黨的勢力大大地增加，陳獨秀在全國青年界中的地位也就磐石膠固，這種情形直到上海清黨事件發生的時候纔漸有轉變。上海清黨事件發生以後，陳獨秀便將共產黨中央搬至武漢，這時候一方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日趨惡劣，另一方而陳獨秀與鮑羅廷的暗鬥也日趨緊張。爲着保持所謂領導的威信，陳獨秀與鮑羅廷雖然未至公開破裂，然而當時共產黨之兩個『二等領袖』——彭述之與瞿秋白，却公開對壘了。彭述之隱然代表着陳獨秀的路線，瞿秋白就接受鮑羅廷所授意的主張。兩方而著書立說，互爭短長，還沒有得到最後結果的時候，更緊張的政治形勢又到了。與陳獨秀連名發表宣言號召『兩黨合作』的汪精衛，現在要反過來向共產黨進攻了。武漢清共開始，共產黨統治中國革命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於是陳獨秀獨佔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時期也從此告一段落。

中國共產黨在武漢的失敗，被莫斯科共產國際指爲『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國共產黨

的陳獨秀與鮑羅廷，也就被指爲「機會主義的領袖」。一九二七年八月，共產國際重派新的代表來改組中國共產黨中央，取消陳獨秀及鮑羅廷的領導地位，以向忠發蘇兆徵等人接管陳獨秀的職務。在南昌八一事變，以及以後的廣州暴動中，陳獨秀完全處於消極的地位。隱匿於上海的秘密機關中，並沒有任何積極的活動。

南昌及廣州暴動都失敗了，兩湖的秋收暴動也沒有多大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日益破碎，中央機關也沒有了統率全黨的能力。於是共產國際決定在莫斯科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重新改組中國共產黨中央、並決定以後的新路線。這時候共產國際對於陳獨秀的安置，就是只要陳獨秀承認自己的錯誤，承認擁護共產國際，同時到莫斯科參加大會，則陳獨秀的領袖地位仍然是可以保持的。在這時候，陳獨秀一派分裂了。一部分主張接受共產國際的條件，到莫斯科參加大會，以便取得以後的領袖地位，這一派以張國燾爲代表，而陳獨秀與彭述之等人則完全不表示意見，不去參加大會，也不表示擁護共產國際，於是第六次大會所選舉的中央，便將陳獨秀等完全排斥了。新的共產黨中央，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是向忠發李立三等人所領導的。

陳獨秀繼續其靜默的態度，前後總計約有二年的時間。至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發生以後，陳獨秀便已與反史達林的托洛斯基派取得了相當的聯絡，於是開始對於共產黨中央的進攻了。中俄問題發生以後，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的口號是『擁護無產階級的祖國』，『擁護蘇聯』，陳獨秀則指斥『這種口號太高了』，『羣衆不了解』，陳獨秀所提出的號口是『反對誤國政策』。從這時候起，共產黨中央指斥陳獨秀『墮入國家主義的泥坑』，『機會主義的復活』等等，向陳獨秀致嚴重的警告，要求陳獨秀取消自己的主張。於是第三國際所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幹部派，便與陳獨秀彭述之最後宣戰了。

陳獨秀不但不取消自己的意見，在一九二九年底及一九三〇年間，反而接連發佈了幾次的重要文件，否認武漢失敗爲陳獨秀自己的責任，將主要責任推之於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身上。批評共產國際中史達林的領導，反對史達林獨裁，要求恢復托洛斯基的地位。指斥中國紅軍爲流氓地痞，反對提出建立蘇維埃與武裝暴動的口號，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內部的一些問題，則不服從向忠發李立三的領導，並且指出周恩來之黃埔系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把持，等等。

理論上與策略上的爭論便引起了組織上更大的鬥爭。中國共產黨中央開除陳獨秀及彭述之等一派的黨籍，稱之爲『機會主義的取消派』。陳獨秀也就另外建立新的組織，稱爲『中國共產黨反對派』，先出版的機關雜誌取名爲「無產者」，以後又出版「火星」及其他刊物，都是用來專門反對目前中國共產黨的。

兩三年來陳獨秀的努力，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上確實發生了非常嚴重的影響，因爲陳獨秀在共產黨一般幹部中是有着很大的潛勢力的。自從陳獨秀離開共產黨中央以後，中國共產黨始終未能產生足以統率全黨的領袖，黨的組織也因此非常薄弱，迨至經了陳獨秀之幾次的打擊以後，於是號稱「鐵的紀律」之中國共產黨，幾年以來，便走入非常破碎的瓦解的狀態。現在所有一切共產黨中的動搖分子，雖然不完全在陳獨秀的領導之下，然而這些分子所以發生動搖的原因，却是因爲共產黨之『鐵的』威信已經爲陳獨秀所打碎了。近幾年來，共產黨中已經脫離中央派的分子，「如我們的話」派，「戰鬪」派，這都與托洛斯基主義相近，與陳獨秀一派有很密切的關係。一九三一年由幹部派中新分化出來的羅章龍派，大部分也就轉入於陳獨秀派之中。現在尙在中央派統制之下的右派(張國燾領導)，在過去與陳獨秀一派的關係

非常密切，目下雖不敢公然與陳獨秀妥協，但這不過是時間問題。陳獨秀的政治活動如不就此終止的話，將來中國共產黨之更嚴重的分化自在意料之中。這是可以斷定的。

現在陳獨秀已經被捕了。政府對於陳獨秀之最後的處置如何，我們現在還不得而知。可是，政府如認陳獨秀爲目前中國共產黨的首領，因爲將他槍斃或判決無期徒刑，那麽，這與其說是國民黨的勝利，還不如說是共產黨的勝利。因爲陳獨秀果而死去之後，則再沒有第二個人還能以繼續陳獨秀的事業，還能以從共產黨內部中去消滅或分化現在的共黨。目前中國共產黨中央派的領袖們，對於陳獨秀彭述之等人被捕的事件，一定輕聲細語地向他們的黨徒說：『死了好！死了好！』但是，南京政府是否願意代爲中國共產黨除害，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今日還不敢給與一個正面的回答，我們只有等候事實的昭示。

清算陳獨秀

——載社會新聞第一卷第七期——

仿魯

近代政治怪傑的陳獨秀

路透社的記者，把陳獨秀被捕的消息，用無線電從上海傳播到各處以外，全世界的各大都會，尤其是像莫斯科，列甯格勒，柏林，漢堡，不律塞魯，萊布錫，倫敦，巴里，紐約，東京這些地方的報紙，都熱烈地載着這從東方傳來的消息，比起汪精衛出洋這一消息來，真是前者好比霹靂，後者好比蚊鳴了。的確，獨秀是一位近代的政治怪傑，他曾以個人的決心，推翻過第三國際東方部的決議；他曾以個人的力量，獨霸了將近十年的共產黨的黨權，在中國推動了思想的狂浪。雖說他現在已被共產黨及第三國際開除，雖說他領導的取消派現在已趨崩潰，但無論如何，他的過去的歷史，已經替他造成了不可消滅的偶像。尤其是一般中國青年想中，要把陳獨秀的印象除去，簡直是不可能的事，至於他的思想的荒謬與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因此，我們對於這位現代「政治怪傑」的陳獨秀，給以一番清算，無論如何

，是有價值的。

社會主義青年團之產生

民八，陳獨秀自北大教育長被逐抵滬，時適胡漢民戴季陶廖仲愷沈玄廬等，在滬辦建設雜誌，及星期評論：無政府主義者遺恨金家鳳袁振英等，在滬倡無政府主義。此時新文化運動者會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遷滬出版，甚爲蓬勃。而蘇俄適派俄人維丁司克偕同楊明齋，及韓人安某，攜欵到滬，爲蘇俄作宣傳，幷負組織共產黨之責任。抵滬後住霞飛路716號，即現在道路協會原址。遂與陳獨秀密商進行，時陳住漁陽里二號(即現銘德里)寓柏文蔚處。經措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羅左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其時又以國內思潮凶湧，倡無政府者最多，反對孔孟及舊禮教者亦甚多，反對軍閥者亦極努力，故由獨秀與季陶等決定約集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袁振英俞秀松葉天底等各個社會主義者，在戴宅密商組織辦法。當時以法界當局對革命黨之行動甚注意，上海流氓又時時索詐危害，乃由張繼柏文蔚二人之與法界有關係者出爲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漁陽里六號（即現新銘德里）爲團址，幷辦一外國語學校以避耳目。團務即由施存統葉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鳳主

持；事務由兪秀松主持；總務由楊明齋擔任。但此項組織尚係各個社會主義混合物而非馬克斯主義之幹部。故當時曾推定八人籌辦共產黨月刊，其人選至複雜，有陳獨秀張松年袁振英金家鳳兪秀松施存統沈玄廬及楊明齋等，一切經費當時均由維丁司克擔任之。當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時當有日人坂西多郎及韓人柏克及安某等參加之（日本勞動月刊上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情形完全刊出即係坂西之作也）。其後，各方志士周佛海張聞天李達卜士畸羅覺（即羅亦農）澎湃陳爲人李農志（即李立三）袁達時傳大年惲代英等等，均自各省及國外歸來，會集於外國語學社，遂成中國社會主義者之大集團，共產黨幹部亦漸因此醞釀以成。

共產黨之成立

社會主義者既以不容於各省，紛集滬上，維丁司克即正式提議組織共產黨，宣傳布爾塞維克，以糾正無政府主義之活動。於是一方而即由獨秀找北平李大釗廣州譚平山到滬，與戴季陶沈玄廬等密商，一方而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共產黨方具雛形，當時即由獨秀漢俊望道大釗明齋主其事。其後季陶等即已退出。社會主義青年團，至開代表大會時，無政府主義者之個性較強者如袁振英李綽均退出，黃哲民等欲加入而不可得矣。

第一次大會前的波折

維丁司克返國後，第三國際派鮑羅丁來華，少年國際亦派優林來滬指導中國共產黨運動及社會運動。抵華後鮑至各處考察一過，見優林之優柔寡斷，不及爲用，請改派越飛使華。十一年冬，復抵北平，與越飛及俄使館參贊伊凡諾夫等商議，認中國革命須經民權之過程，復見軍閥跋扈，必須先行去除封建餘孽。而北平共產黨中，時適急進與緩進分爲二派：急進者以張國燾高尙德何孟雄羅章龍范鴻劼朱務善爲中心，緩進者以鄧中夏許興凱爲主幹。當時明爭暗鬥，各不相讓。後者人數雖少，但李大釗甚趨向之。緩進者以爲中國不適宜於階級鬥爭，而需國民革命爲過程。因此問題而牽涉至於北平互相彈劾，地方書記屢經改派。學生運動方略亦有改易。其後主張緩進方面，迭與鮑羅丁數度密商，鮑遂在平招集各省共產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人物，有數次重要之演講，並召集各派主要人，在俄使館交換意見，以解糾紛，而聽第三國際之最後決定。俄使館會議後，急進方面，以種種零星問題，而至分化，緩進派遂占優勢，議遂得定，由鮑電東方局請示，東方局亦遂則接受，准於相機行動。但此議達滬，陳獨秀表示反對，有脫離第三國際之意，張國燾亦以主張否決，有改組勞工黨之運動

。共產黨至此，岌岌可危，鮑羅丁頗感無法應付，故再呈請東方局來一正式訓令，令其全權支配中國之計劃。以第三國際之威權，鎮壓行將渙散之勢力。適值陳獨秀等亦以政府追索通緝甚急，在無可奈何中，表面上表示無抵抗，暗中遂與陳炯明相往來。當時李大釗鮑羅丁見此情勢甚危急，即主張提早舉行代表大會。

國共兩黨合作的經過

當時一方面先與孫中山交換意見，孫以北伐不成，對李及鮑之提議，表示採納。於是李及派鄧中夏等賚書赴滬，請求孫中山接受社會主義之原則，改組國民黨，以容納青年革命勢力。孫以全部接受但須共產黨員全部加入國民黨。其時以共產黨與國民革命之關係，顯然日益接近　亟宜推進一步，以示拉攏。故又決議，請孫先生將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一節，重行確定，并須公開於社會，一方面由李鮑等在共黨內部作意志統一的運動，遂於十二年初，召集各省市著名人物，在廣州開會。其時陳公博方任通俗教育講習所長，即在該校開會，計到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張國燾，楊明齋，施存統，鄧中夏，許白豪，毛澤東等三十餘人；其中主張分爲二派：陳獨秀張國燾不若從前反對國民革命及民權革命之堅決，但認爲如須

改變其黨策略，應由共產黨直接指導民權鬥爭運動不必加入國民黨，上海及湘鄂同志均擁護之；李大釗鄧中夏等則均主張加入國民黨，作國民革命，但不以合作之形式由黨員個別參加而設法使國民黨赤化。北平代表及北方數省同志均贊成之。但其時北平代表金家鳳上海代表施存統等數人則對於國民革命及民權鬥爭之見解又顯與李大釗等衝突。金施等均主張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再及社會革命。為共產革命必經之途徑，故主張共產黨應誠意助成國民黨之改組，并完成其國民革命之使命；換句話說，即主張共產黨應以民衆力量交予國民黨，并圖國民革命之實現，再及其他；張國燾等會當場指控金施諸人為共產黨之叛徒，要求中央予以處分。爭執三日，無法解決；後經鮑羅丁之調解，及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一次大會之推動，時亦在李大釗等指揮之下，在廣州第一次公園成立，請求國民黨正式改組，共產黨黨員合作案遂得通過。

中國列寧時代的聲威

共產黨自第一次大會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開第五次大會，八月八七會議時止，其間數年，獨秀一直是以中央總書記兼政治主席團主席的資格，家長式的統治全黨。尤其是五卅

運動以後，共產黨的發展很快，陳獨秀的聲望，更是一天天增高起來。共產黨的中央是設在上海的，上海是全國的中心，即由獨秀坐鎮其間。除了上海以外，全國共產黨最重要的一區域，是廣東和北京，廣東的黨務，是由獨秀的大兒子延年一人主持的；北京的黨務，表面上雖然由李大釗主持，但獨秀的次兒喬年，却負着很重的責任。此外，獨秀的外甥，表姪，姪子，都在各地分任着重要的職務，這時候的共產黨，眞可算是陳家黨了。共產黨的勢力愈發展，這家長式的領袖陳獨秀的權威自然也愈增加，所以連我們戴季陶老夫子，也稱他爲中國列甯，孫中山在世時，也極稱許他的才幹。那眞是獨秀的全盛時代，但可惜時間過去太快了。

機會主義的由來

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獨秀即負荷了機會主義的惡名，而被開除了一切重要職務，一九二九年甚至被開除出黨了。至於這機會主義的罪名，也不是突然發現的，因爲他主持黨務的時候，現在的幹部派認爲對於國民黨的態度過於遷就。的確，他對國民黨始終抱着友善的態度，直至現在。他在國共時代，時時告誡他的黨徒，要顧到『革命的聯合戰線』，不

可過於激烈。一九二七年，他曾以家長式領袖的資格，下一道『上諭』給中央軍委，禁止軍隊支部接收士兵同志，爲的是恐怕破壞『革命聯合戰線』。在廣州中山艦事變發生的時候（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廣州陳延年張太雷黃平周恩來及鮑羅丁等共議，均主張即時與國民黨反臉，但獨秀則主張仍舊與國民黨合作，處處退讓，一面撤回高誤罕，一面親函草頭老總解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各方面反□空氣已很濃厚，而獨秀依然主張維持『革命聯合戰線』，所以汪精衛一到上海，他就命周恩來強迫汪精衛簽字發表所謂『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這一篇聯合宣言，被現在的幹部派認爲是一種『機會主義之一種最可恥的文獻』，但的確是一種有歷史價值的重要文獻，茲抄錄如下。

兩黨領袖聯合宣言

『國民黨共產黨同志們，此時我們的國民革命，雖然得到了勝利，我們的敵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還正在那裏伺察我們的弱點，想乘機進攻推翻我們的勝利，所以我們的團結，此時更非常必要。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重要，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

主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於主張打倒自己的友黨，主張打倒我們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素所反對之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便敵人稱快。無產階級獨裁制，本是各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國雖然實現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經過同樣形式的同樣階級，還是一個問題，何況依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趨勢，現在固然不發生這樣問題，即將來也會不至發生。中國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生獨裁來對付反革命，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獨裁。兩黨合作，本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員，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瞭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眞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現在國民革命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根據地上海，驚醒了國內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傷離間，無所不用其極！甲則曰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將衝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將打倒國民黨；乙則曰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這類謠言，不審自何而起。國民黨最高黨部全體會議之議決，已昭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

或有此意見而誤會，亦未必終不可釋解。在市黨部方面，愛護地方安寧秩序，未必亦後於他人；對於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贊同，總工會亦已發表不單獨入租界之宣言；對於市政府，亦贊同各階級合作策；事實俱在，更無造謠之餘地。國共兩黨同志們，我們強大的敵人，不但想以武力對待我們，並且想以流言離間我們，以達其以赤制赤之計。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商開誠協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兩黨同志，果能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獲乘機而入也。披瀝陳詞，萬希各省自察！勿致為親者所悲，仇者所快，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汪精衛陳獨秀，十六年四月五日」

這篇宣言發表以後，獨秀就與汪精衛先後到了武漢，為了維持這所謂「革命的聯合戰線」，獨秀老先生真是所謂煞費苦心。但是事實上這「革命的聯合戰線勢已不能不趨於破裂，可是獨秀還是想盡了方法想維持殘局，甚至提出了很可笑的口號「國共兩黨聯合到底，」這也是後來幹部派斥為最無恥的口號的。

八七會議後的陳獨秀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會議（即八月七日舉行），是共產黨轉變路線的關鍵，在這會議上，陳獨秀派（即所謂元老派）完全失勢，但新起幹部派，對於這位老前輩究竟還有相當尊敬，所以一九二七年八月回到上海以後，他雖然已經脫離了中央任務，但中央還時常諮詢些許多問題，他也以『撒翁』的筆名，在『布爾塞維克』上發表了一些短文（寸鐵之類）。廣州暴動發生的時候，獨秀對於暴動中的策略有所貢獻，他寄了一封信給中央，提供了兩個意見：（一）對帝國主義讓步，極力避免與香港帝國主義武裝衝突；（二）對國民黨左派及譚平山之社會民主黨一類組織，應與之聯絡。中央對此提議，表示前者尚可商議，而對後者則斥為機會主義，絕對反對。從此以後，幹部派對陳極為輕視矣。

開除黨籍的經過

自此項提議被駁斥以後，獨秀對幹部派更為不滿，卽密組小團體，謀推翻幹部派活動。一九二九年八月，中東路事件發生，獨秀致書幹部派主持之中央，表示意見，反對幹部派所提出之『武裝擁護蘇聯』，『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而主張代以『反對國民黨的誤國政策』，於是又被幹部派大罵一頓。第三國際東方部委員與本托夫，且公然發表一文以指斥其為『無

恥』。獨秀復致第二函辯護。乃越三日，獨秀又突然致第三封與幹部，將中東路事件，撇而不提，而在組織上極力攻擊幹部派，並指幹部派用『警察政策』來反對異己，這封信，不啻是一封哀的美敦書。這封信發出以後，即指揮其部下半公開的進行反幹部派活動，幹部派至此乃忍無可忍，遂將其開除黨籍，這是一九二九年年底的事。

在獨秀被共產黨開除黨籍以前，曾受過留黨察看的處分。在留黨察看期內，他曾發表過一個『黨治意見書』，其要點如左：

一、中國革命眞的完全失敗了，這責任完全是第三國際的錯誤，他在執行中早已反對過，所以他的錯誤，只是不曾堅決反對。

二、中國此後若干年中是沒革命的，須待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到某種程度，方有革命的好況來臨。

三、取消一切實際行動。

四、從新再行研究馬克斯列甯主義，和平秘密，培養革命力量，等待機會再幹。

五、取消紅軍蘇維埃，解散一切武裝。

六、取消罷工，遊行，示威、努力生產帮助民族資本發展。

七，主張召集國民會謀。

這是政治意見書中的要點。他這一主張，立刻遭受了開除黨籍的的處罰，然而畢竟他的主張，似乎有眞理存在，在他這個意見書上，簽名的有：彭述之，蔡振德，王獨清，李季，高語罕，劉仁靜·張振亞，馬玉夫，以及一些前所未聞不甚著名的，總共一百數人。他到底是個老牌黨桿號召能力，確是不少，不上數月，服從他的黨員，聽說也上千成萬了。

形成取消派

老陳雖然有了羣衆，所苦的是沒有經濟的來源，却好，這時有一批由莫斯科放逐回國的托洛斯基派的留俄學生，相互利用的結合了起來，獨秀在金錢壓力之下，修改了以前的主張，大約在他們政綱上，又加了幾條：

一、中國是沒有封建勢力的存在。

二、立時開展社會主義革命，

三、反對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

四、反對現有的僞紅軍，僞蘇維埃。

五、反對土地革命。

獨秀當時心下計較了一下，既是反對開除他的共黨，並且在這裏，可以弄到一大批的金鎊，只得答應了，同時發出了宣言通電，要求第三國際恢復托洛斯基的黨籍，這一來托洛斯基的金鎊便大批的源源的來了。此外又得了第三國際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資助，于是陳獨秀又活躍起來了。

獨秀處在這左右逢源順利的環境之下，立時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反對派中央，當時中央主要角色是：

總書記陳獨秀兼政治局主席團主席。

常委彭述之兼宣傳部長（常委即主席團之一員）

常委高語罕兼組織部長

常委潘問友兼北方及滿洲總負責。

常委李季兼農民部長

常委劉靜仁兼特務部長

常委王獨淸兼青年部長

常委張振亞兼軍事部長

常委蔡振德兼祕書長及江蘇省書記。

工人部長一席亦由蔡兼。

同時省黨部組成的也有江蘇，兩湖，兩廣，山東，福建，河南，北方滿洲，順直等，眞的又是一個共產黨了。陳獨秀仍舊是個赤色的王侯。

對於中國革命的見解

幹部派認爲中國封建勢力還頗佔優越地位，但獨秀反對此說。他以爲封建殘餘已完全沒有作用，至少已變成殘餘的殘餘。所以他在意見書中寫道：

『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封建剝削已經不是農村中的主義形式，所以現在農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經不是反封建勢力的鬥爭，而是反各種各式的資本主義的鬥爭。』

『其實中國的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的長期的侵略，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

，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爲商品經濟所支配，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制，本質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農民，久已成爲他們在經濟上(奢侈生活或資本積累)財政上(維持政權所必需的苛捐雜稅)的共同必要。……』

『而且中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無論是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沒有完全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爲他已開始了中國歷史的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就是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的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和幫助，增加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失了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對立地位的過程之中，變成了殘餘的殘餘。牠爲自存計，勢不能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以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

取消派分崩離析

馬玉夫自因爲接近取消派，被共產黨開除了，回到陳獨秀的組織內，滿想得一席中央常

委兼工人部長，不料遲之又遲，陳（獨秀）蔡（振德）等不答應認爲資格不够，于是馬便怒走南京，自首反共，蔡振德亦表示不幹，同北方（陝西某軍）做官去了。陳獨秀的組織，本來是脆弱的，經過了這一次風波，上海的下層組織，都冲得落花流水了。

托陳取消派的共黨，北方總負責原是潘問友，潘也繼馬玉山而起向北平當局自首，一般自潘以次黨員，正如甕中捉鱉，鮮有脫逃。接着又是山東省委與幹部派鬥爭失敗，感受着沒有出路，亦向韓主席自首，這一來北方的組織，完全坍台的

在此時兩廣與福建省委，均因交通騙去數千現款，經濟十分枯絕，便又起了裂痕了。除一少部份仍忠於陳外，大部被幹部派奪取而去，而零零碎碎的細胞，頓有風流雲散之感！接着河南省委又遭破壞。總之一九三一年度，共黨托陳派已由活躍而至瓦解崩潰之象，昔日陳獨秀的忠徒，都充滿了失敗無出路的情緒，再經生活困難的壓力，這班平時專賴反動爲生，別無技術的英雄們，在此情況之下；多數都往南京自首矣。

從失勢到被捕

倭鬼在上海擲炸彈開大炮的時候——一二八——陳起了絕大恐慌，第一，感覺經濟來將

斷源，第二組織由動搖而開始崩潰，第三，托洛斯基派對己有露骨的不滿，第四，前所認爲的革命眞理及主張亦覺把握不住了。因此他便決定了，重爲馮婦，要求幹部派與所領導的托陳派，開個聯席會議，退一步亦要求恢復其黨籍，後來聽說均不准，要他再等十年再說。

陳獨秀觸了這次霉頭之後，又受了下層同志的非難，說他是幹部派的投降者，不配做他們的領袖，後來經過王獨清彭述之等的解釋，說向幹部的投降，原是一種騙錢的妙計，這種解釋總算發生了效力。但接着又由羅章龍王克全等來奪取他的羣衆，散布出陳獨秀向幹部派投降，政治上已經破產的煽動，一方面又去聯絡托洛斯派，做劇烈的反陳運動。陳處此四面楚歌，衆叛親離中，不免懷念起他那悲慘的身世，他的土老婆（本刊三期請參閱）現在已不要他，他的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都已先他而死，這些原因，便一病不起，不料在病榻上，却做了階下囚，回憶當年威風，眞不堪回首。

陳獨秀死活預測

陳獨秀被捕，必然是報界絕好的資料，而判決他的死活則在法院，茲亦作一個短的預測，以作結論，陳雖是共黨取消派，然而他是赤匪的創造者首作俑者，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根據這種事實，照現行法規，似應正法，而無活命之可能，反轉來說，陳雖是共黨却是反對共黨現行暴動政策者，而且又是一個學者，只要他繼續反共，似可不至于死，或許這個怪傑使出了餘威，化險爲夷，亦未可知也。

托洛斯基主義——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博古

——原文載中國共產黨黨內秘密刊物中——

『實際上，托洛斯基主義，早已不是共產主義的小組織了。實際上，托洛斯基主義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維埃，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見斯達林致無產階級革命編輯部的一封信『關於布爾塞維主義史的幾個問題』。

一 中國托洛斯基——陳獨秀主義與蘇俄評論的反蘇聯的統一戰線

陳獨秀主義

沒有再比中國托陳取消派無恥的卑鄙的叛徒行動，能夠更好的證明斯達林同志給托洛斯基主義所下的斷語之正確了。中國的托洛斯基主義從牠們開始形成的時候，便直接的成爲敵視共產黨，敵視共產國際，敵視中國革命的政黨。中國的托洛斯基主義從來便不曾是共產主義的小組織。在中國軍閥武力佔據中東路作反蘇聯的軍事冒險時所形成的托陳取消主義的聯盟，兩年以來的行動證實了牠們不僅是中國革命的取消主義者，不僅是『某黨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戰鬥的先鋒隊。

日本的佔領滿洲以及由這佔領而引起的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強烈的高漲，揭破了一切帝國主義強盜們瓜分中國的陰謀詭計，揭露了國際聯盟是瓜分宰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強盜組合，揭破了某黨統治階級的卑鄙，無恥與『賣國』『辱國』的面目，揭破了一切反革命派別是帝國主義與某黨統治階級的擁護者，同時亦更進一步的揭破了托洛斯基主義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維埃，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佔領及其對於中國勞苦羣衆的蹂躪，污辱，掠奪與暴行；帝國主義列強與國際聯盟共同的來瓜分宰割中國；某黨統治的投降帝國主義與出賣民族利益；另一方

面，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驚人的成功，蘇維埃政府的和平政策及蘇聯工農群衆對於中國勞苦群衆的革命鬥爭的熱烈的同情與幫助，不能不引導到中國工農群衆革命鬥爭的緊張對於蘇聯的同情增長，與對於蘇維埃政權的信念堅強起來。這對於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統治及帝國主義者當然是極大的威脅。固然，他們使用一切力量，用盡卑鄙無恥造謠污蔑的方法企圖來阻止，破壞，撲滅這日益增長的工農群衆的革命鬥爭及不可阻止的對於蘇聯同情的增長以實現反蘇聯的戰爭爲目的的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當然是十分的厭惡，仇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蘇維埃政府的和平政策。所以他們首先使用一切的方法來咒詛辱罵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與蘇維埃政府的和平政策，以期達到反蘇聯戰爭的實現。

蘇俄評論——這大概大家都同意的，她是最無恥的，最醜惡的，最露骨的某黨專門反蘇聯的反共產主義的機關報，在滿洲事變之後，在接連幾期的社論上寫道：

『……再就你們所號稱無產階級的祖國——蘇俄而言，表面上看來，五年計劃蓬蓬勃勃的在進行着，但是單照這樣「富國強兵」的辦法，是不是會走上資本主義的老路，殊難逆料，本來一個國家能不能單獨建設社會主義，在你們隊伍中就有許多不同的爭執

。……』

『……關於此次日本人之以暴力佔駐中國東三省，一方面以強盜的方式，來壓迫整個的我中華民族，一方面用卑汚的手段來勾引我少數的敗類，如你們是忠實執行民族政策的話，便不應該說(？)就蘇俄的權利上思想，而應該以事實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暴行，亦不應該說（？）是對於國際聯盟說說風涼話，而應該忠實發揮列寧民族政策的精神。……』（見該刊第三期，明：『爲中國無產階級質問第三國際』）。

怎樣令人不發笑呢，醜惡的反革命者，某黨的『理論家』，居然成爲列寧主義的……『信徒』了，居然爲列寧的民族政策而鬥爭了，而且反對着……聯邦共產黨領袖者目前的『背叛』列寧的民族政策。眞的，假如警察不禁止人們在街上發笑，則將笑死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但是假如讓托洛斯基主義者起來「反對斯達林及其追從者的官僚保守的民族主義」，「擁護列寧托洛斯基的路線」，不更漂亮些麽？自然，托洛斯基陳獨秀主義便勇敢的，無保留的起來完成帝國主義者及其中國的反革命派的指令。不信，請看：

『……所以在現在的滿洲問題中，蘇聯在中國被壓迫民族面前，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民族面前，彷彿只是「一個善意的中立者」，只是個「消極的不侵略國家」，決看不見一點爲被壓迫民族爭解放而鬥爭的精神，爲被壓迫民族受侵害而反抗帝國主義的精神，這差不多已經完全離開列寧主義對於民族問題的遺教了。……』(述之：滿洲問題與目前國際局勢，火花第六期)

『……社會主義建設應當首先有利於工人階級，但是蘇維埃政治經過官僚階級的扭曲，工人階級反陷於貧困，不安。(!?)……當然，斯達林的整個路線是會削弱工人階級本身的力量，加增官僚階級的威權，客視上是幫助了敵人力量之增長，這是不容疑惑的……』(劉爾十：十月革命第十四週年紀念，火花第五期)。

在齷齪的，挑撥的，企圖破壞和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布爾塞維克隊伍的無恥文件上——所謂『告全黨同志書』上，更簡潔地寫着同樣的思想：

『莫斯科方面，根據他們『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反對理論，埋頭於國內的和平建設，向全世界工人大喊「和平」，「尊重國際條約」，這顯然是違了馬克思「不斷革命

和列甯「扶助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遺教。……」

在將上面的引語與蘇俄評論的引語比擬之後（十分的抱歉，不能將火花與蘇俄評論的妙文全部轉錄：極願讀者們將火花五、六期與蘇俄評論二、三期拿來同時對讀，這對於要了解托洛斯基者的真實面目的人們是很有益的），讀者們也許會驚奇這是怎樣的思想上的一致。雙方都一樣的咒罵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是『走上資本主義的老路』，是『使工人階級反陷於貧困，不安，』雙方都痛恨蘇聯的和平政策，怨望蘇聯爲什麼不出來『打抱不平』，因之痛罵俄國共產黨人對於『中國的無產階級風馬牛不相及』(蘇俄評論)，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消極與冷淡』，雙方都是以『擁護』列寧主義的民族政策的戰士自居，責讀斯達林主義的『背叛』列寧主義！……嗚呼，驚人的思想上的一致。……但是實際上沒有什麼可驚奇的，一張留聲機片唱不出兩種曲調，一個主人飼養的鷹犬說不出兩種的思想，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所御用的兩種兄弟刊物自然亦至多亦只能在字面有些不同！但是有時連字面不同亦是有限的，譬如關於目前勞苦羣衆所熱烈擁護的兩個口號，『反對世界大戰』『擁護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自然這兩個口號是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所最痛恨的——，蘇俄評論這樣

說：

『但是第三國際還在叫你們高叫：「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擁護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等等空洞的口號，更命令你們和其國內的民衆作「此次戰爭是帝國主義直接向蘇聯進攻」的夢語……』（見第二期，記者：共產黨人聽者）。

而托陳取消主義聯盟的現任領袖，尊貴的陳獨秀先生述之先生呢？

『即他們秘密指示給各國共產黨也只有「武裝擁護蘇聯」與「反對世界大戰」兩個離實際尚遠的空洞的口號』。（述之，見火花六期同文）

『……其實，只是些過於普遍，沒有特殊性也還沒有實現性的空洞口號：「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獨秀；此次反日運動中幾個錯誤，火花六期）

讀了這一迭三個「空洞的口號」，實在禁不住「心頭作惡」「肌膚起栗」。……但是這對於揭露托洛斯基主義的面目，却是極殘酷的。在反蘇聯的鬬爭中，托洛斯基主義已經與……蘇俄評論結合了一致的聯合戰線，自然，這對於還企圖假借共產主義的旗幟來進行反革命事業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多少有些不大好，但是怎樣辦呢？「食人之祿忠人之事」，雖然這樣無恥的

作用——甚至於……與最醜惡的反革命者同行並坐。何況反蘇聯，反共產主義，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已經是托洛斯基主義者專門的職業呢？

自然，對於這些以無恥的謠言，與惡毒的咒駡來造成反蘇聯戰爭的輿論準備的專家，去處列寧主義，去講客觀事實，將是極大的笨伯，但是我們來看一看這些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的死敵怎樣的曲解列寧主義，怎樣的抹煞事實，倒也不是沒有興趣的。這些老爺們斷言：蘇聯的工農羣衆及其領導者——聯邦共產黨對於日本侵略滿洲是取冷淡消極袖手旁觀的態度是以『中國無產階級爲風馬牛』，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與其領導的政黨——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亦一樣的冷淡，只有『空洞的口號』與『夢語』；同時抱怨蘇聯不出來『打抱不平』，積極的與帝國主義列強開戰，來貫徹他們所謂『列寧的民族政策的遺教』。……難道這不是最可恥與最卑鄙的造謠與污蔑麼？難道在這樣的斷言之下有任何的事實作根據麼？不，連事實的影子都沒有！下面是大家所知道的（連托洛斯基派與蘇俄評論的先生們亦不能不知道的！）事實：蘇聯政府的領袖，同情中國工農革命與蘇維埃運動的宣言（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十四年紀念的演說），蘇聯職工會大會對於滿洲事變的宣言，號召全蘇聯工人階級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

盜，保衛中國革命與蘇聯，緊接着滿洲事變後，全蘇聯境內的示威遊行，十月革命紀念遊行中熱烈的保衛中國蘇維埃，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佔領的示威；隨着共產國際西方局與赤色職工國際西歐秘書處的號召，各國的共產黨包經開始了廣大的羣衆動員，德國共產黨中央的宣言，嚴辭斥責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要求德國的勞苦羣衆起來保衛蘇聯與中國革命，組織了在日本公使館前的羣衆示威；法國共產黨國會代表在國會中提出了詰問，揭露了法帝國主義的陰謀，同時他已經進行羣衆的動員，美國共產黨中央斥責和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的野心，準備與組織着羣衆的行動；英國共產黨亦在選舉運動集中力量喚起工人階級對於滿洲戰爭與威脅蘇聯的注意；高麗的共產主義者已經以游擊隊的方式來阻礙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動；日本共產黨在瘋狂的白色恐怖之下，揭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面目，反對滿洲的佔領，聲援中國革命……不看見這些事實的，或者是瞎子，或者是最無恥的反革命的混蛋。自然，所有這些對於托洛斯基主義者和蘇俄討論都是『空洞』的，因爲一切帝國主義者向蘇聯挑釁的企圖都被蘇維埃政府的和平政策所粉碎了。蘇聯沒有接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挑釁，反蘇聯戰爭不曾能够實現，這對於渴望這個戰爭到來與極力準備這個戰爭的先生們，不能不覺到『空洞』，一個

『空洞』兩個『空洞』第三個還是『空洞』！

一切挑戰的企圖失敗之後，不甘心的資產階級便想利用『列甯主義』的旗幟來挑釁了，他們嘱其走狗們向蘇維埃政府及其領導的政黨說：『你們不是以執行列寧主義的遺教自豪麼？你們快些開戰吧！不然，我們要說你背叛列甯主義了！』……這多少有些像兒戲，多少有些喜劇的意味！在反蘇聯的挑釁中，甚至『列寧主義』亦可假借的。列甯的偉大，就在他早已預料到這些把戲。在『國家與革命』一書的開始時說：

『壓迫階級，在偉大的革命者生前用經常的監視和查究來迫害他們，用最野蠻的憤恨，最瘋狂的敵視，最殘酷的造謠污蔑的征討來對付他們的學說。在他們死後，却又企圖將他們變成爲無害的神像，給他們的名字以相當的光榮來「安慰」與欺騙被壓迫階級。……』

是的，最好的事情，在「擁護列寧主義的民族鬥題的遺教」的名義之下來進行反蘇聯戰爭，資產階級這樣想，托洛斯基主義者便遵命而行！

難道還不明顯麼？托洛斯基主義的『擁護列寧主義』的作用是替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服務

。難道還不明顯麼？托洛斯基主義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二　『勇敢堅決無保留的參加民族運動』

但是，不僅在反蘇聯的戰線上，托陳取消派與蘇俄評論結合了反革命的統一戰綫，而且在企圖絞死是正在高漲着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上，在號召勞苦羣衆去擁護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尾隨着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去出賣中國，汚辱中國上，托洛斯基主義者與蘇俄評論亦是一致的。

我們認爲最能夠清晰明白的表現托洛斯基主義者對於目前反帝運動的整個策略與戰術路綫者，莫過於在本節小題目所引的劉爾士的話：『勇敢堅決無保留的參加民族運動』（見校內生活第一期）。劉仁靜眞不辜負托洛斯基先生的面命耳提之勞，竟能在短短的一句話中將托洛斯基主義對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忠心耿耿完全揭露了。

反革命的地主資產階級企圖以『一致對外』來欺騙和緩羣衆的革命爭鬥，來使羣衆和他們妥協，來忍受他們的奴役和剝削，隨從他們去投降帝國主義與出賣中國。因之，蘇俄評論的先生們，便勸告中國共產黨人，效法社會主義的叛徒來『甘作馬克思主義的叛徒，而不爲

民族的罪人』。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人』作如下的忠告：

『中國共產黨，無果甘使中國淪爲日本或俄國的殖民地則已，不然，自己應以革命者的眼光，來決定你們的戰略。而此種戰略之決定，更應從民族的觀點上來準備，才能使中國的無產階級，不至淪於萬刧不復之地』。（見蘇俄評論第二期，記者！中國共產黨人聽者）

托陳取消派聽了中國反革命派這個『忠告』和『號召』，便『堅決勇敢無保留地』執行了。因爲個性嗜好和嗅味的不同，在響應蘇俄評論的號召之時，便有相當的分工。一部份如梁幹喬，陸淵，陸夢衣之流，便公開的『忠實誠懇』的回到某某主義與某黨懷抱中去『參加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綫』（陸淵：以前種種），即在蘇俄評論的編輯部之內合作，另外一部分却仍舊用着『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義，在蘇俄評論編輯部之外合作。這種在蘇俄評論編輯部之內或之外合作，簡簡單單地只是取消派內各人的分工，他們思想上的一致與其對於黨國的忠實誠懇程度的相等是不容懷疑的。

陸淵在向某黨『黨國』自首的文件上寫道：

「……所困難者，中國社會經濟的背景，却不能給反對派或共產黨以捷足發展的條件，過去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工人羣衆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產階級的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實由於中國社會背景此時尚未具備有反對派這類組織存在的條件：一則因爲中國工農羣衆的民族意識，還非常濃厚，反對派或共產黨的國際主義，在中國工農羣衆中決其無存在的餘地……」(蘇俄評論第三期，陸淵，以前種種)

這裏的思想是很直接爽快的，就是說：中國無產階級還是非常幼稚，對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沒有興趣。民族意識還非常濃厚，因之，『三民主義是最切合於中國實際社會條件的主義』，所以他便『回到民族爭鬥的領導者——國民黨來』。

但是這種直接爽快的言辭，在與蘇俄評論作編輯部之外的合作的人們，是有些難於出口的，因之，使他們便不能不委婉曲折一點。雖然，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作用不同，字面上亦須有多少的差異，這種差異資產階級當然是能容忍的，能諒解的。

陳獨秀，彭述之，劉仁靜，小陳(即陳代青)，在火花及校內生活上所寫的一切東西，實

質上，便是陸淵之流的思想的再版。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估計，陳獨秀說：

『我們號召領導羣衆爭鬥，……必須有一個總的政治口號，能夠召集比較寬廣的羣衆參加全國性的爭鬥，走上革命道路。這樣的政治旗幟，這樣的政治口號，在落後國家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只能採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我以爲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愛國」或「保衛祖國」更號是召廣大羣衆的唯一口號』。（見校內生活第一期，獨秀：被壓迫國家無產階級應不應領導愛國運動）

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呢，陳獨秀以爲：

『中國兩次革命對於資本主義基本利益都未有相當的滿足，所以中國資產階級不但過去曾向左盤旋，現在也向左盤旋（如反日排貨），即將來還有不少盤旋』。（同上）

總之，無產階級還是幼稚，社會主義口號引不起他們的興趣，號召羣衆的口號祇能是民族主義的，『愛國』是號召廣大羣衆的唯一口號，而資產階級則正在日益左傾（讀者可以看到

這與陸淵是沒有任何分別的）。從這裏得到的策略的結論是很明顯的：

『這就要求我們勇敢堅決無保留的參加民族民主運動』（校內生活，仁靜：中國革命的兩個根本問題）。

所論『勇敢堅決無保留的參加民族民主運動』，其真實的意義，便是去幫助擁護日益『左傾』的中國資產階級，去做某黨資產階級的民族的愛國主義的武斷宣傳的俘虜，去幫助他們鞏固自己的統治，與出賣中國。一卒先生更明白的說明了取消派的『心事』：

『同志們！「工人無祖國」，我們應該領導他們起來創造一個祖國，現在的抗日救國運動爲大小資產階級所把持，我們應當領導他們積極參加，現在無產階級的力量雖十分薄弱，然至少可以督促這種持久不變，迨將來牠的組織健全，戰鬥力加強，即可和五卅運動一樣，走到抗日救國的領導地位，並準備踏上第三次革命的大道』。（見校內生活，一卒：目前抗日救國運動和我們應取的態度）

不是堅決勇敢地爭取反帝國主義運動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不是殘酷無情的揭破一切資產階級民族的愛國主義的武斷宣傳，不是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統治，建立民衆的蘇維

埃政權，武裝民眾進行革命的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爭取中國的獨立解放統一——而是『勇敢堅決的無保留的參加民族運動』，而是擁護『大小資產階級所把持的抗日救國運動』，而且，『督促這種運動持久不變』，——即是說永遠在大小資產階級的把持之下。難道還不明白麼？這個策略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陳獨秀孟塞維克主義的復活（『老狗教不會新把戲』！真的，一點不錯！）。陳獨秀主義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實行後所得的悲慘與可恥的結果是大家所知道的。而現在呢？破產了的陳獨秀主義又成了托洛斯基主義的大纛了。難道還不明白麼？托洛斯基派污衊黨說：『自覺或不自覺的放棄民族運動』，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對於反帝運動領導權的憎恨。

難道還不明顯麼？火花與校內生活的整個路線是與蘇俄評論編輯部之外的合作的路線。難道還不明顯麼？托洛斯基主義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三　國民會議　反對蘇維埃政權爭鬥的大纛

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托洛斯基主義者，不能不同整個中國的反革命統治在一起一致的咒詛毒罵正在蓬蓬勃勃發展着的蘇維埃運動。同某黨的人們一致地稱紅軍為『土匪』

，咒罵斯達林主義的妄動，一千零一遍的預言中國蘇維埃的破產。但是歷史以鐵的事實打擊了取消主義者，蘇維埃運動打破了一切反革命派的軍事進攻鞏固地發展着，兩個政權的對立成了全中國政治生活的主要的因子。

在反蘇維埃的爭鬥中，托洛斯基主義者與一切某黨的人們一致地舉起了國民會議的大纛。他們追隨着某某要人等，第三黨及一切屠殺無產階級的劊子手高唱着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企圖以這個口號來組織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分子來反對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蘇維埃運動。直至滿洲事變之後，托陳取消派主義的英雄們，重新又將早已破產了的爲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所厭惡所反對的國民會議的口號提了出來。陳獨秀在自己的政綱式的論文上寫道：

『召集直接的普選的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建立代表大多數民衆的革命政權——反對軍事獨裁的訓政的某黨政權。』（火花第四期，獨秀：抗日救國與赤化）。

或者，更簡單的形成了如下的口號：

『召集國民會議，實現民衆政權！』（仁靜：滿洲事變與國民黨）

自然，獨秀之流的所謂赤化政綱，實際上只是貨眞價實的『青天白日』化：所謂直接普

選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實際上只能够是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的裝飾，與軍事獨裁的訓政的某黨政權一樣的是仇視壓迫屠殺革命民衆的政權。眞正代表大多數民衆的革命政權只能是中國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議)。

但是對於陳獨秀托洛斯基主義這還不够，他們認爲『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劉仁靜——嗚呼！)，我幾乎疑心「無」字是「資」字的筆誤，因爲只有這樣還說得過去。然而，這是沒有根據的，陳獨秀托洛斯基主義者正用全力來證明這個公式，來欺騙蒙蔽工人羣衆。劉仁靜說：

『……這個民衆政權，應具有何種階級的內容？這一問題各階級有不同的回答。改組派說民主政治（資產階級政權）即民衆政權。鄧演達說：「平民政權」是小資產階級的政權。斯達林派說的民衆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我們所說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之政權』。(仁靜：中國革命的兩個根本問題，校內生活)

『這一左傾的路線與斯達林派有一個共同點，即是鄙棄國民會議的口號，至少也不把牠看做一個革命的口號，不願意爲牠的實現而奮鬥，有機會還要向牠放冷箭，因爲牠

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機關，牠只能實現資產階級的政權，至於無產階級若是爲實現國民會議而奮鬥，無異於爲鞏固或改良資產階級政權而奮鬥。對於國民會議這種定命論即國民會議只能爲資產階級所御用，不能爲無產階級所御用，自然要否定「經過國民會議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了，那麼將經過什麼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呢？』（獨秀：兩個路線，同上）

這樣：照陳獨秀先生等看來，國民會議即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道路。當然，這個立場與列寧主義沒有一點共同的地方，是極端仇視與反對列寧主義的。爲着揭破托洛斯基主義者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先鋒隊的面目，我們把列寧主義在俄國革命的各階段上對於國民會議口號的估計來看一下是十分必要的。遠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前夜，列寧說：

『在目前國民會議的口號單獨拿來，按其本質看來是保皇派資產階級的口號，是資產階級與沙皇主義妥協的口號。革命爭鬥的口號只能是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革命的臨時政府。……』。（論臨時政府）

在一九一五年，當着俄皇軍隊在大戰中敗北及俄國革命危機的成熟，列寧在幾篇文章中有力地打擊了孟塞維克所提出的實質上是立憲民主黨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消滅戰爭，消滅沙皇專制制度』(而中國的孟塞維克甚至說出『召集國民會議實現民衆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來了，其「每况愈下」乎？其「青出於藍」乎？)。

列寧在俄羅斯之敗北與革命危機一文中說：

『不是國民會議，而是推翻君主政體，共和國，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與八小時工作制，忽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口號，我們黨的口號』。

在同一時期所寫的幾個提綱中說道：

『(一)以「國民會議」的口號，當作獨立的口號是不正確的，因爲目前一切問題是在誰召集牠。自由派在一九〇五年接受了這個口號，因爲可以將牠解釋爲沙皇召集的及與沙皇妥協的會議。最正確的是三大要求的口號(民主共和國，沒收地主的土地，八小時工作制，)更加上號召工人在爲社會主義，爲推翻交戰各國的政府及反對戰爭的鬥爭中的國際的一致』。

列寧認爲：社會民主主義的（即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口號不是國民會議，認爲以國民會議的口號當作獨立的口號是不正確的，最正確的是三大要求的口號；而取消派的英雄却說：

「斯達林派不是沒有單個的具體的民主民族的口號，不是沒有指出推翻帝國主義及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所謂「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階段」，他們更特別重視；然而他們却沒有胆子明白的決定一個民主，口號做總的政治口號，做一切政治爭鬥的旗幟，以至在實際戰略中，拿蘇維埃口號來抵制國民會議運動……」（見獨秀：被壓迫國的無產階級應不應領導愛國運動。校內生活）

在對讀了這兩段引語之後，難道還不明白，托洛斯基陳獨秀主義早沒有一絲一毫的列寧主義氣味，而完完全全做着中國的反革命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與先鋒。實際上他們以國民會議的口號作總的政治口號，總的政治爭鬥旗幟來反對……蘇維埃，共產黨與無產階級。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將忠實於列寧的遺教，堅决地與取消派的國民會議的口號爭鬥，而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統治及三大要求爲自己的口號，及爭鬥的旗幟。當然，估計到十月革命豐富經

驗，他不能夠不將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改變爲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因爲蘇維埃共和國比普通的國民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更高的民主主義的形式。列寧屢次着重的指出這點來，在四月提綱上他說：

「不是國會的共和國——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國會的共和國將是倒退一步——而是全國從下而上的工人，雇農，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

而在論國民會議的提綱上列寧又指出：

「……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不僅是民主機關的更高的形式（與普通的以國民會議爲頂蓋的資產階級共和比較起來），而且是能夠保證最順利的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

× × × ×

大家知道的，在俄國無產階級十月的勝利之後，布爾塞維克召集和解散了國民會議，而國民會議便成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在國內戰爭中的大纛。不僅如此，而且國民會議成了國際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大纛。正如列寧在一篇文章上所指出的：「顯然，德國和奧國

革命的主要問題現在是國民會議或蘇維埃政權的問題。』而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是擁護國民會議的，而自稱是擁護民主（考茨基稱之為『純粹的民主』）反對專政。列寧在這時候曾經在許多小册子及文章上（主要的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關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與報告等等）曾經堅決地與這些叛徒爭鬥。所有這時候列寧的著作已經成為共產主義理論的寶藏。在一篇文章中列寧說：

『資產階級不得不作虛作偽而稱民主共和國為『全民的政權』或為一般的民主或為純粹的民主（資產階級）而實際上他是資產階級的專政，是剝削者對於勞動羣衆的專政。雪德門，考茨基，與國派與冷納兒擁護這種謊言和虛偽。而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揭破這種謊言和虛偽，告訴工人與勞動羣衆直接公開的眞理：實際上，民主共和國，國民會議，全民選舉等等，是資產階級的專政，而為了將勞動從資本的束縛之下解放起來沒有別的道路，只有以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這個專政』。（論「民主」與專政）

列寧這個直接的指出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對於托陳取消派才眞是「風馬牛不相及」。他們認為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而堅決反對這種……列寧的國民會議

的「定命論」。他們同破產了的第二國際們一致地擁護國民會議反對蘇維埃，但是他們走得更遠，前者以擁護「純粹民主」的旗幟來進行擁護國民會議，而後者卻直接稱國民會議爲「無產階級專政」了！

× × × ×

誰想召集國民會議？國民會議的任務是什麽？托陳取消派這樣回答：

「民衆奮鬭的方式，應該是繼續現時的反日反國民黨運動不斷的加深與擴大。在反日反某黨的高潮中湧現出一個和賣國的某黨政府對抗的國民會議，這一革命的國民會議是不能而且也不會由國民黨政府召集的，牠應該是全國反日民衆代表自動集合的總機關，同時也是領導民衆反日鬥爭的總機關……」（熱潮第六期，頑石（即獨秀）：中國民衆應該怎樣救國即自救）。

十分顯明的，這個取消派的國民會議，雖然不是由國民黨政府召集的，但是亦不是在推翻某黨統治之後的革命政府召再的他是當着一切政權，軍隊，警察，牢獄等等都完全在國民黨手中的時候，「民衆自動」的集合起來的！好個自動集合的國民會議，但是他的權力呢？

國的力量呢？一切權力都在軍事獨裁的某黨手中。不依據暴動起來的羣衆武力之上的這個他民會議，最好的形勢，變成爲一八四八年德國佛蘭克堡的國民會議一樣；他「對抗」着某黨的政權，而實際上，只是使羣衆不立即起來推翻某黨統治而給某黨能够有時候從容的準備武力鎭壓一切革命運動，鞏固自己的統治；在最壞的情形之下，變成爲目下印度的國民大會，或者某人召集的國民會議一樣，他成了與軍事獨裁的某黨政權妥協的機關。無論如何他决不會成爲眞正革命的機關的。在提出國民會議作自己的總的政治口號時，托洛斯基主義亦很好的知道這點，提出這個口號爲的是：在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機面前，替某黨服務，欺騙工人羣衆，使他們不立即「拿起武器來」：推翻反革命的某黨統治；而與某黨妥協，或者則將一切權力依舊留在某黨手中，而自動集合一個毫無權力的佛蘭克堡式的國民會議。好一個錦囊妙計，托陳取消派不愧爲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但是妙計之妙，不僅如此，因爲這棍子的另一端却可以打着蘇維埃運動，可以把不滿意和仇視蘇維埃政權的蘇區中的地主和富農。組織在國民會議的口號之下，來反對土地革命，反對蘇維埃政權。托陳取消派這樣的要求：

「四，由黨員羣衆要求中央，決定令所有蘇區除原有的土地等農民切身利益要求之外，即時加上普選的全權的國民會議口號，因爲要求國家獨立民族自主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反對軍閥捐稅壓迫和爭取土地聯系這些運動之民主的反映，在一般民衆意議中，尤其在農民意識中，正是全體人民代表的全權的國民會議」（告全黨同志書）。

國民會議的口號已經不僅是在某黨統治區域中與某黨政權妥協的口號，而且這萬能的國民會議亦成了蘇區中地主富農的反蘇維埃的旗幟。被土地革命推翻了打擊了剝奪了選舉權的地主富農分子，在他們的意識中『正是全體人民代表的全權的國民會議』，是『民主的反映』，在廣大的勞苦羣衆的意識中，當然蘇維埃是更高的民主的形式。不滿意無產階級民主的地主富農當然要爲他們的階級的民主的而爭鬥，要在虛僞的全體人民代表的假面具之下，爭取他自己的政權的復辟。要使這『全體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成爲『全權的』來代替蘇維埃政權。十分明顯的，在蘇區中國民會議的口號是反革命的反蘇維埃的地主富農的口號，而托洛斯基派便是他們的戰鬥的先鋒隊。

難道還不明顯麽？國民會議的口號在目前中國的具體的環境內是反蘇維埃爭鬥的大纛：

在某黨統治區域內，國民會議的口號是地主資產階級與軍事獨裁的訓政的國民黨政權妥協的口號，而在蘇區內，則是地主富農反蘇維埃爭鬥的口號。

難道還不明顯麼？以國民會議為自已政治鬥爭的總口號的托陳取消派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反蘇維埃的先鋒隊！

四　對於托洛斯基主義的自由主義是源於叛賣工人階級的罪惡

中國的托陳取消派是敵視共產黨敵視共產國際敵視中國革命的政黨，他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維埃，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這在滿洲事變以後，由於他們的叛徒的理論與行動而更加証明的了。他們在反蘇聯戰線上與某黨的蘇俄評論結成了一致的統一戰線，他們的機關報（火花）成了蘇俄評論的兄弟刊物，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他們主張勇敢堅決無保留的參加民族運動，擁護H益『左傾』的資產階級，『督促大小資產階級把持的抗日救國運動使之持久不變』；他們的總的政治鬥爭旗幟——國民會議成了反蘇維埃爭鬥的大纛。所有這些都証明他們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

最危險的敵人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而口頭上還掛着列寧主義與

共產主義的辭句，他們假借着列寧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辭句來替資產階級服務，來蒙蔽欺騙工人羣衆，來汚辱列寧主義與共產主義，同時他們却最無恥的自稱爲共產主義者甚至要求所謂『共產主義者的聯合行動』！

當然，與托洛斯基主義是沒有任何聯合行動可言的。假如我們不願叛賣工人階級與革命。而且對於托洛斯基主義最小的自由主義的或調和的態度將是極大的瀕於叛賣工人階級的罪惡。每一個共產主義者與覺悟的工人應該記住斯達林同志的話：

『所以對於托洛斯基主義，雖然是擊潰了的隱秘的托洛斯基主義的自由主義是瀕於罪惡及叛賣工人階級的昏潰』。(致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而且應該以最主要的火力來打擊牠，因爲牠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因爲牠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牢牢的記着布爾塞維克的戰術的規律：

一，在接近革命爆發時期中最危險的敵人的社會支持是妥協的政黨：

二，不將這些政黨與羣衆隔絕則推翻敵人是不可能的；

三，在準備革命的時期中，主要的子彈應向着這些政黨打，將這些政黨隔絕起來，

將廣大的勞苦羣衆離開他們』。（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

共黨幹部派對陳獨秀的詆毀與批判（原文署名思美）

一　取消派之現形

在中國革命危機日益成熟的形勢之下，取消派內部的新的崩潰與分化，是必不可免的。這種新的崩潰與分化，第一，表現於取消派『理論家』陸淵，梁幹喬等的公開投降某黨，第二，表現於取消派內部陳獨秀主義者托洛次基主義者關於革命基本問題的新的爭論。

在中國革命危機日益成熟的形勢前面，取消派的『統一政綱』，當然已經被革命的事變打得體無完膚，（我關於這一政綱的理論上的批評，請參看布報第四卷，第三期『是取消派取消上國革命，還是中國革命取消取消派』）拿這樣的『政綱』去號召羣衆，去欺騙羣衆，去擁護某黨的統治，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的成績。

很顯然的，估計中國目前的革命形勢爲『革命的低落時期』，爲『反革命的勝利時期』，以爲祇有依帝國主義與某黨的合作，才能產生中國的『經濟復興』，才會『重新集合工人到工廠，提高他們的階級自信力，造成組織工會和擴大共產黨影響的條件』的取消派，當然結果必然會得出梁幹喬陸淵等所得出的結論。

梁幹喬在他向某黨自首論文『回憶與展望』上，說統一運動之後，雖是反對派各派在政治上，沒有絲毫不同的意見。

『然而，我却沒有看見一種鮮明的足爲建立健全無產階級政黨的要素。我開始對於自己表示懷疑！對於建立健全政黨的願望表示失望！的確，那些反對幹部派的思想內容及其行動的表現是使我懷疑，使我失望的！然而，它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正是現存的無產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純粹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們，落到中國現實環境上必然發生的心理現象』。（見蘇俄評論第一卷第三號）

陸淵在他的『以前種種』上也說：

『中國反對派的工作，是在極度的困難中進行的。但工作的困難，却不能阻止反對

派的發展，所困難者，中國社會經濟背境，却不能給反對派或共產黨以捷足發展的條件，過去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工人羣衆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產階級的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同上)

取消派的『理論家』等待中國的『經濟復興』等不到，那自然會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表示失望，自然對於取消派發展的條件表示懷疑，自然只有以投降到某黨某某主義的懷抱中去，作爲他們唯一的出路了。

但是像梁幹喬那樣公開的投降某黨，到底在擁護某黨統治上說來，沒有什麼很大的作用。至多在反蘇聯，反共產的蘇俄評論或光明之路的這類雜誌上多一兩篇文章而已，但可憐這些雜誌的讀者是鳳毛麟角一般的少！

二　取消派怎麼『領導』民族鬥爭

取消派內部這一次的爭論，主要的意義，是在到底怎樣做，才更能去維持某黨的統治，才更能去欺騙一部分工農民衆。陳獨秀劉仁靜等這一次新的主張的提出，主要的目的，是在拿一些新的革命詞句去欺騙民衆，去擁護某黨與反對共產黨。

在反帝鬥爭急速開展的條件之下，陳獨秀等主要的任務，當然是號召羣衆去擁護資產階級。他在取消派刊物火花第三期『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一文上曾經說：

『在此次抗日救國運動中，只有排貨和對日宣戰這兩個主張，不但是多數人民的意志，而且比較的正當。』

取消派更在『只有』這兩個正當的主張之下，號召『工農商學』的聯合，請求『全權的國民會議』的召集，要全國的工農羣衆在取消派的主張之下，去『一致對外』！（關於取消派這些主張的批評，請讀者參看紅旗週報第二十三期『滿州事變中各反動派別怎樣擁護着某黨的統治？』）

這就是在中國革命目前的階段中，取消派所能提出的唯一的主張！

陳獨秀在取消派內部刊物校內生活『被壓迫國的無產階級應該不應該領道愛國運動』上說：

『我們號召領導羣衆鬥爭，除在日常環境中找出些特別活潑的口號外，必須有一個總的政治口號即政治旗幟，能够召集比較寬廣的羣衆參加全國性的鬭爭，走上革命道路

。這樣的政治旗幟，這樣的政治口號，在落後國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只能採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原書第一百思美加圈以下仿此）陳獨秀並且更進一步的說：

『我以爲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在中國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之下，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將來還不斷的發生，一直到中國民族從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壓迫之下，完全解放出來。在解放鬬爭中，……『愛國』或『保衛祖國』更是號召廣大羣衆的唯一口號』。（同書第四頁）接着陳獨秀大作之後，即有一卒先生論文，主要的也是發揚光大陳獨秀主義的。他激昂慷慨地說：

『同志們！「工人無祖國」，我們應當領導他們起來創造一個祖國。現在的抗日救國運動爲大小資產階級所把持，我們應當領導他們積極參加。現在無產階級的力量雖十分薄弱。然至少可以督促這種運動持久不變，迨將來牠的組織健全，戰鬥力加強，卽可和五卅運動一樣，走到抗日救國的領導地位，並準備踏上第三次革命的大道』。（第六

頁）

從這幾段議論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取消派是怎樣的在幫助某黨宣傳民族主義，是怎樣的想拿『愛國救國』的口號，去欺騙民衆，要民衆做民族資產階級的尾巴。他們在這裏講到如何參加民族運動，愛國運動等許多好聽的話，但是他們一句話也沒有說到如何在這運動中揭破某黨，民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欺騙宣傳，來爭取廣大的工農羣衆到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來推翻帝國主義某黨的統治。他們一句話也沒有說到只有推翻某黨的統治，建立農兵以及勞苦民衆自己的政權，我們才能眞正的愛國救國，反對某黨，打倒某黨的口在號，他們是不敢提出的，因爲這是將來的事，在『落後國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力量十分薄弱』的中國，當然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在『積極參加』民族運動，『督促這種運動持久不變』，『迨將來牠的組織健全，戰鬥力加強』時，才說得上領導這一抗日救國運動！

取消派公開的告訴中國的工農羣衆，要『愛國』，『要保衛祖國』，『要抵制日貨』，『要對日宣戰』但決不要企圖打倒某黨，決不要想建立工農民衆自己的政權！這只有在很遠很

遠的將來，這只有在中國經濟得到帝國主義剩餘資本的幫助而復興之後！

至於向全中國無產階級與一切勞動羣衆宣傳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的綱領之下去團結這些羣衆，那在陳獨秀等取消派看來，檢直是空想！關於這一問題，我想取消派一切理論家同陸淵等完全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甚至陸淵所說的『中國工人羣衆，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產階級的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與陳獨秀所說的『這樣的政治口號在落後國幼稚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只能採用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在字句上也差不多完全一樣，

這樣，取消派一方而說中國的無產階級如何幼稚，力量如何薄弱，而另一方而不願意拿共產黨的黨綱去教育無產階級，去提高無產階級覺悟的程度，去領導千百萬工農羣衆的鬥爭，主要的是爲得要使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服從某黨，以維持動搖着的某黨的統治！

中國共產黨不像取消派所說的那樣，拋棄目前廣大民衆反帝的民族鬥爭的領導，却正相反，最近鬥爭的經驗已告訴廣大的勞動羣衆，只有中國共產黨是反帝的民族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但中國共產黨的參加這一鬥爭，同取消派的參加這一鬥爭完全沒有共同的地方，中國共

產黨參加這一鬥爭的目的，是在揭破某黨一切派別的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欺騙宣傳，使廣大的工農羣衆明白的了解，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打倒某黨，必須建立工農兵的蘇維埃政權，中國共產黨沒有一刻忘記把反帝國主義與反某黨的任務密切聯系起來，中國共產黨參加這一鬥爭，是在奪取這一鬥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使鬥爭不爲某黨與民族資產階級所出賣，而使鬥爭得到眞正的勝利，不反對某黨、不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取消派參加反日救國運動，不是在使鬥爭得到勝利，而是使鬥爭走向失敗；不是在領導鬥爭，而是使鬥爭失去領導！

三　陳獨秀與劉仁靜的『民衆政權』論

取消派這種反革命的，反無產階級的觀點，當然照例要弄些『左』的詞句來做調味。認爲目前是反革命勝利時期的取消派，近來忽然提出了建立民衆政權的問題。在取消派常委通告第五號上曾經這樣說：

『現在小資產階級的各種宣傳和煽動中，只有極少數的左傾派對於某黨政權發生了懷疑的傾向，然而仍舊不能提出某黨政權之任何代替物。這仍然不曾涉及政治鬥爭的

中心問題』。

在火花第三期上，陳獨秀說：

『要對日宣戰，要實現民族革命戰爭，要獲得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只有中國第三次革命復興，以革命的民衆政權（這一政權將經過全國抗日救國會而實現，或經過國民會議而實現，或經過蘇維埃而實現……）代替反革命的政權』。

劉仁靜在『滿洲事件與國民黨』一文上（同期火花上）說：

『歷史上不止一次，當資產階級對外喪城失地以後，民衆起來推翻牠……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民衆政權，……只有這樣的民衆政權，才說得上對日的經濟絕交』。並且最後劉仁靜還提出了『召集國民會議，實現民衆政權！』的口號。

這樣看來，取消派在反日鬥爭中似乎也沒有忘記打倒某黨，建立民衆政權。然而這祇是『似乎』而已。祇是因為現在全中國廣大的工農學生羣衆，不但高喊打倒帝國主義，而且高喊打倒某黨，所以取消派為得要維持牠對於民衆的欺騙，也不能想到『國民黨政權的代替物』，甚至提出了『實現民衆政權』的口號。

正像取消派中托洛次基主義者所批評的，陳獨秀等在這時提出政權建立問題，是同取消派的基本觀點不相容的。陳獨秀主張的反對者民傑在他的大作『革命的民衆政權與國民會議鬥爭』上說：

『這裏我們用不着駁斥把「政權」問題，當爲議事日程中一種行動的鬥爭，是很明顯的錯誤。目前是個反革命的階段，這是反對派對於現階段之具體的認識，亦即是目前政治鬥爭策略之出發點。在沒有革命形勢之下，提出「建立……政權」爲行動口號，這正是模範的斯達林主義者在現在所幹的勾當』。（校內生活十一頁）

但是實際上所謂『斯達林主義者』同陳獨秀主義者托洛斯基主義者，絲毫沒有共同的地方。陳獨秀等現在提出『民衆政權』問題，不過是爲得要欺騙民衆，表示他們的『革命』。至於方直正建立民衆政權，爲了這一政權而鬥爭，那還是將來的事，因爲現在是『反革命的階段』，根本談不上這一問題。這是一。

其次，陳獨秀他所要實現的『民衆政權』同中國共產黨目前所說的民衆政權，他絲毫沒有共同的地方。陳獨秀等所說的民衆政權是在某黨下面經過某會議的召集而實現的，而我

們所要的『民衆政權』是在用武裝暴動推翻某黨統治之後實現的。陳獨秀等所說的民衆政權是全民的，是工農商學各界用『直接平等不記名』選舉出來的國民會議而實現的。而我們的民衆政權，是由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者參加的工農兵以及一切勞動民衆選舉出來的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而實現的。

請問我們的民衆政權同取消派陳獨秀等所說的民衆政權，有什麼共同之點嗎？一點也沒有！

陳獨秀等過去夢想某人召集國民會議來實現『民主政治』。後來國民會議固然召集了，但『民主政治』是絲毫氣味也沒有。現在陳獨秀等又夢想某黨『召集直接平等不記名的緊急的國民會議，決定對日方針，並國家主要問題』！某黨現在又快要召集『國民救國會議或國難會議或國防會議』之類的會議，來滿足取消派的願望了。這一會議當然會決定對日方針（即投降帝國主義）並國家主要問題（『剿赤』與屠殺民衆）！這當然又會令取消派完全滿足吧？

也許取消派會說，他們所需要的是用直接平等不記名的選舉法選舉出來的國民會議，但這對於國民會議的本質不會有絲毫的改變！在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任何形式召集的會

議，祇能是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如像英國的『工黨政府』，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也祇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而取消派却希望在某黨統治之下，實現民衆政權，這不是欺騙民衆，擁護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是什麼？

取消派對於這種『民衆政權』的鼓吹，當然同國家主義派，新月人權派，改組派等所說的民衆政權沒有絲毫的不同。取消派在這裏是要廣大的工農兵學生羣衆，不去反對某黨，打倒某黨，而是要他們同某黨合件，去實行『官民共治』之局，以維持某黨的運動。

第三、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民衆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是工農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對於一切剝削者的壓迫，並且剝奪一切剝削者的選舉權與集會結社等的一切自由。而取消派陳獨秀等則說由那樣的國民會議所實現的那樣的民衆政權，就是無產階級的專政！

陳獨秀在答覆托洛斯基主義者小陳與民傑兩人的論文中說：

『如果我們不决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之上奪取政權，而决定須在社會主義基礎之上奪取政權；如果我們不相信落後國家的民主任務可以直接到無產階級專政，然後由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來踏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而主張一開始就實行社會主義

的革命，然後再回過頭來附帶的解決民主任務：這種「把車子放在馬前面」的辦法，將使中國無產階級獲得政權的時期，推遲到世界革命成功以後」。（校內生活三十二頁）

劉仁靜也在同書內說，對於取消派最重要的：

『這就要求我們勇敢堅決無保留的參加民族民主運動，因爲在這運動中，有我們奪取政權的前途；因爲在這運動中資產階級的作用永遠是妥協的，背叛的。民族民主的澈底勝利，也就是無產階級的勝利』。

讀者試想，在某黨統治下面用直接平等不記名的方法選舉出來的國民會議，原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當然是取消派陳獨秀等的新發明！自由主義者的陳獨秀等一方面要中國的無產階級只去參加民族民主的鬥爭，認爲社會主義的要求對於幼稚的落後的中國無產階級沒有絲毫的興趣，而另一方面，告訴中國無產階級說，參加某黨的國民會議，就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眞是值得一唱三嘆的高明到萬分的叛徒的理論。這種理論當然會在世界歷史上同第二國際的『建設的社會主義』等理論，先後輝映！

然而說到這裏，讀者一定要問：『既然取消派說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已

經完全得到政權，那末為什麼取消派又說中國無產階級祇能在民族民主的基礎之上奪取政權呢？」

劉靜仁回答這一問題道：

「這幾個同志(指小陳民傑——思美註)宣佈民主革命已經完全結的唯一理由是說資產階級已取得了政權。不錯，中國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但是牠能滿足全體資產階級的需要嗎？牠能用和平手段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嗎？某人的專制主義和沙皇的專制主義，除了其頭銜不同，其階級基礎不同以外，其妨害資產階級的社會發展有什麼分別？或者某人的專制(軍事獨裁)比俄國沙皇更妨礙資產階級社會之發展，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的主人是帝國主義，蔣介石不過是牠的代理人(不平等條約的保護者)。所以中國革命的直接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壓迫。將資產階級的社會從這些壓迫與桎梏中解放出來。但是任何派系的資產階級都不能推翻帝國主義，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所以我們也說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性」。(校內生活二十三頁)

這是劉仁靜給讀者喝的一碗迷魂湯，使讀者會覺得拜讀之餘如墮五里霧中。但是劉仁靜

所要說的眞話，對於我們還是非常明顯的。劉仁靜陳獨秀等要中國無產階級參加民族民主的革命，是爲得要『滿足全體資產階級的需要』，是爲得要『能用和平手段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是爲了要不妨礙『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總之，是爲了要『將資產階級的社會從這些壓迫與桎梏中解放出來』！正因爲這樣，所以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性！

這是革命叛徒們所能說出的最下流無恥，最卑鄙齷齪的資產階級走狗的狗話！

四　托洛斯基派與陳獨秀派之反革命的競賽

取消派內部的爭論就是關於這一民衆政權的問題。陳獨秀等這種對取消派『統一』政綱的新的修正或發揮，當然不能得到『眞正』托洛斯基派的完全同意！這些托洛斯基主義者除了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不願聽到任何關於其他政權的話。他們不但反對『斯達林主義者』的『工農民主專政』，而且也反對陳獨秀等的『民衆政權』，他們甚至說『民衆政權』就是『工農專政』的變相。民傑其人者在他反駁陳獨秀劉仁靜等的『論所謂革命的民權』一文中說：

『假使說民衆政權乃工農民主專政口號之變相，那麼，在中國已往階級鬥爭的經驗

已切實證明，這是在另一種形式之下來提出斯達林的反動口號。假使說這種政權乃國民黨統治之另一面目，那麼，這個對於資產階級專政的內容和實質仍舊沒有改變，那更無所謂「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之「革命的民衆政權」。如果說，這種政權本身就是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或如仁靜同志所說的「通俗公式」（？），那為什麼不可以直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呢？再不然，這個政權本身只有代表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小資產階級的階段，如仁靜同志所說的「第三者的統治」。可是這種論調比之斯達林式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反動口號來，更為墮落，更反動些』。（校內生活第八頁）

我們前而已經指出陳獨秀等的民衆政權是『某黨統治的另一面目』，所以對於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內容和實質仍舊沒有改變』，更無所謂『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的『革命的民衆政權』。這裏似乎民傑等是從『左』的方面來反對陳獨秀等的取消主義。

小陳其人者在反對陳獨秀等的主張的論文中說：

『這個政權（指『民衆政權』——思美）是什麼政權呢？這顯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無論如何都不能從國民會議而建立起來的，國民會議無論如何的「眞

正」，都沒有此種力量能夠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種政權在陳獨秀同志和仁靜同志的心目中，必然是與「反革命的」「訓政的」軍事獨裁的政權相對立的「革命的」（？）「最大多數的民衆的」民主政權了。……但是我們應當明白，這種「民主政權」——「革命的民衆政權」或「最大多數的民衆革命政權」，只不過是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面前自縛手足的鎖鍊，這個「實現民衆政權」的或「建立革命民衆政權」國民會議，也必然成爲無產階級在反動階段——兩個革命過渡期中走上政治鬭爭最可怕的絞繩了』。（同書十二頁）

這裏似乎小陳又是從『左』的方而來反對陳獨秀等的取消主義。

『我們在召集國民會議口號的鼓動過程中，要向羣衆解釋：說這個國民會議不一定能夠召集成功，如果召集成功了，但若物質權力仍在某黨軍閥手中的時候，這個國民會議，仍是沒有力量的。共產黨在爲國民會議的行動鬥爭中沒有一時一刻不向羣衆指示這一鬥爭之可能的前途，就是在國民會議鬭爭中就已經告訴羣衆：最後只有推翻革命的國民黨政權，代替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始能解決本身的根本問題』。（同書十三頁）

這裏似乎小陳也是從『左』的方而來反對陳獨秀等的取消主義。

然而，這不過都是『似乎』而已。這些托洛斯基主義者，實際上同陳獨秀等完全一樣，認爲現在是反革命的時期，所以根本說不上推翻國民黨，建立民衆的政權的問題。這是將來中國『經濟復興』以後的事。現在他們所能做的，也不過是『召集全權的國民會議』，去『決定對日方針與國家主要問題』而已。而且依照他們自己所說的這種國民會議只能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另一形式，那麼，他們之參加國民會議只是爲資產階級裝裝門面，是非常明顯的事。不，更正確些說，他們的目的是在幫助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合作，去造成中國的『經濟復興』！

陳獨秀下面的這段話，的確道破了托洛斯基主義者的眞意：

『在反革命的階段，只能做做灰色運動，大約一向羣衆宣傳鼓動推翻某黨政權和以革命政權代替反革命政權，就算是逾越了反革命階段的政治鬪爭之『正軌』，這種和平改良主義的傾向，陳同志和民傑同志是一樣的。他們當然不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但一談到政權問題，陳同志便諄諄的教訓我們：「目前是一個反革命的階段，這是反對派對於現階段之具體認識，亦即是目前政治鬪爭策略之出發點」。因此他們的路很明顯的是；在反革命的現階段，無論採用國民會議之口號與否，都只能做做不涉及某黨政權的灰色

運動；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下奪取政權，是將來革命階級的事。』（同書二十一頁）

陳獨秀更說；

『在我們的時代，若有人認爲中國資產階級的和平發展到了相當時期，能够準備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基礎，這便是戴季陶混進了中國左派反對派的隊伍中！』（同書二十二頁）

陳獨秀這幾句話拿來罵罵小陳民傑之流，固然痛快，但是拿來罵罵陳獨秀自己，也未嘗不可以通用！而且陳獨秀大概決不能忘記他自己是取消派『統一政綱』的簽名者與擁護者吧！托洛斯基主義者反對『工農民主專政』，反對『民衆政權』，這在我們看來是毫不足爲稀奇的。正當全中國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在反帝反某黨的鬭爭的開展中，迫切的要求着民衆的政權時，取消派又出來給這些民衆以打擊，說民衆的政權，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專政，以此來反對革命的民衆與擁護某黨的統治！

只有擁護某黨，實行各階級聯合的陳獨秀的『民衆政權』不能不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但是打倒帝國主義與某黨，取消一切剝削者政治權利的民衆的，工農兵的，蘇維埃的政權，

決不能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

托洛斯基主義者是懼怕中國廣大民衆反帝的民族的與土地革命的鬥爭之發展的。因爲參加這一鬥爭的不但是無產階級，而且是廣大的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因爲這一鬥爭不但要搗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而且也要搗毀地主資產階級某黨的統治，因爲這一鬥爭的發展，必然要建立民衆的，工農兵的代表會議（蘇維埃）：實現工農民主專政。要擁護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必然要反對這一鬥爭的發展，必然要反對民衆政權，必然要反對工農民主專政，說一切這些都是『斯達林主義』反動的陰謀，正像一切某黨的派別把近來工農學生反某黨的鬥爭完全看做是中國共產黨（當然是指『斯達林主義者』）反動的陰謀完全一樣。

陳獨秀主義者要中國無產階級做某黨與資產階級的尾巴，以出賣反帝的民族革命鬥爭，托洛斯基主義者要中國無產階級放棄對於有千百萬革命羣衆參加的反帝的，民族革命鬥爭的領導，而等待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到來，請問這中間根本上有什麼差別呢？

托洛斯基主義者是反對農民羣衆，認爲農民羣衆不能是革命的力量，所以拒絕與千百萬農民羣衆聯合，領導他們去奪取政權。中國共產黨認爲農民羣衆是中國目前民主資產階級革

命中主要革命動力之一，是無產階級鞏固的同盟者，所以中國無產階級必須和他們在一起去取得政權。這一政權就是民衆的，最大多數的，工農兵的蘇維埃政權。中國無產階級更將經過這一政權去實現無產階級的專政。

讓取消派在亭子間裏去背誦『或者是資產階級的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的專政』的托洛斯基先生的這一公式吧！讓他們去等待將來中國經濟復興後』(等不到時只有去走陸淵梁幹喬所走的道路），去實行純粹的無產階級專政吧！中國共產黨則一刻也不放鬆千百萬工農勞苦羣衆鬥爭的領導，領導他們去推翻帝國主義與某黨在中國的統治，去建立民衆的，工農兵的蘇維埃政權：

中國共產黨，同取消派完全不一樣，牠相信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牠相信中國無產階級能領導千百萬勞苦羣衆反帝國主義反某黨的鬬爭，達到蘇維埃革命的勝利！

托陳取消派首領陳獨秀被捕之意義（C）

——載共黨幹部派大衆評論創刊號——

托洛斯基取消派領袖陳獨秀彭述之等被捕後，衆議紛紛，尤其是取消派乘機活動，掛着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革命招牌，到處招搖誆騙，企圖以欺騙麻醉的手段，爭奪在羣衆中反革命的領導權；用卑鄙齷齪的漫罵中傷，與曲解馬克斯列寧主義，以動搖眞正革命政黨在羣衆中的威信；以更險毒的破壞革命，完成其反革命的帝國主義某黨的先鋒隊的任務。

在此，我們有充分的必要，根據取消派反革命的史跡；陳獨秀被捕後某黨與取消派演變的一切事實，來剖析陳獨秀被捕的意義。

陳獨秀被捕的意義：（一）某黨和取消派更親密的携手的關會——統治階級以拘捕陳獨秀的手段，與陳氏等共同協商進攻中國革命，取消派趁陳獨秀被捕的機會大大的活動起來了。十月廿一日出的『革命時報』和『太平湖』，便是最無恥的欺騙的東西；但是不管取消派怎樣扭扭妮妮的否認，事實證明：陳獨秀被捕不久，便要求見陳公博顧孟餘等，好訴訴取消派有史以來一切反革命的功績，與苦心積慮爲維持帝國主義某黨統治而費的心機要忠忱，以求諒解，并借此永訂盟好。此舉正中某人下懷，豈有不喜之理？○便即刻派中央某和人到牢獄中慰問，問寒問暖，問病即刻請大夫，問寒即刻由中央黨部撥百元爲之添購被褥，

及飲食爲獄中之超等，諸般疼愛，不勝枚舉。其中最令人不得不懷疑的是『陳彭同居一室』，蓋任何重大案情的要犯，而尤以共黨要犯被捕後，爲防止假供，向必嚴格隔離。今竟由中央要人來問陳獨秀『寂寞否？要彭述之和你同住好嗎。』實在是破題兒第一遭！這証明取消派和某黨已經更緊的握好手了，取消派已經公開的投在某黨懷裏了！取消派還再拿什麼來做欺瞞？！

十月廿五日中委會擴情談話：『據談共黨陳獨秀雖號蘇俄共黨，中央派目爲投降本黨而開除共籍，此仍係共黨內部問題』，倒還有些吞吞吐吐，十月廿六日楊杏佛談話語氣可爽快了：『羅文幹日前來滬時亦表示對陳主寬容，蓋陳非眞正共黨……』一個說陳獨秀投降某黨，一個又說陳非眞正共黨，那末，當然是已經反革命投降某黨的假借馬克斯列寧主義冒充中國共產黨以欺騙羣衆破壞革命的取消派，也就是『某黨的好朋友』(取消派在革命時報上的自稱)啦，而應該寬容的了，然而取消派反革命的眞面目被鐵鐵的事實赤裸裸的暴露了以後，還竟企圖抹殺一切事實，以『這是史大林派造謠』來繼續維持其欺騙作用？可是中國勞苦羣衆知道只有在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是打倒帝國主義某黨的唯一革命領導者

與惟一力量，也就是某黨的眞正敵人，某黨的報紙上會不會登載共產黨（史大林派）的新聞稿子？』（有當時報紙上說此消息是根據那個通信社的電一節可憑）取消派這種愚蠢的欺騙，恐怕只有更暴露其破壞革命的面目，而在廣大勞苦羣衆的銳眼中自己宣布死刑！全國工農勞苦羣衆們！請看這是誰造誰的謠!?是誰中傷誰?!是誰向革命進攻?!是誰作了反革命的先鋒隊!?

（二）取消派反革命勢力猖獗的機會——統治階級企圖以逮捕證明陳獨秀取消派『還有革命性』，以加強取消欺騙麻醉的反革命作用。我們看看陳獨秀被捕後取消派如何加緊欺騙羣衆，破壞革命領導權的一切有計畫的陰謀吧：

1.以陳獨秀被捕來證明取消派是革命的，以騙取工農羣衆對取消派的好感……十月廿一日取消派爲陳獨秀被捕，特出版『無產階級革命者戰士陳獨秀家世，才能，個性及革命事業』專刊名『太平湖』上說：『爲陳氏爲革命前途，玆將陳氏生平略歷寫出……』惟不知『革命前途』與『老戰士』的略歷有什麼關係?!取消派答：『陳獨秀被捕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按中國現在只有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民權革命，並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可惜取消派不能了解

的損失，而且是……，陳先生過去新文化運動上有極廣大的助力，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是開荒播種的偉大的領導者』然而一切曾經參加過革命后來又叛變革命的政黨（某黨，第三黨，改組派，社會民主黨，取消派等）或個人，都是革命的敵人，都是工農勞苦羣衆階級的敵人，取消派企圖拿在革命歷史上曾經『開荒播種』的革命『領導者』的過去，來遮掩其目前反革命的事實，以取得廣大工農羣衆的擁護是不可能的。

又說：「…中國思想界之能有今日的展開，謂為陳先生之薰陶不為過譽，中國革命之能有有今日之擴大，謂為陳先生的推動，又更中肯，他是中國學術界的太陽！是中國勞苦大衆的救星！』這便是取消派親手寫出的告白，這便是取消派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真面目！這便是托陳取消派的『革命政黨』的正確理論！這便是根據馬克斯列寧主義與辯証法唯物論的理論，中國羣衆的革命意識，不是建築在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礎上，即帝國主義與軍閥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及國民黨的剝削關係上，而是中國民衆的革命要求是由取消派領袖陳獨秀天才家應用『特殊（借用調查團報告書上的字）馬克斯列寧主義』一手獨創出來又『薰陶』到勞苦羣衆的腦子裏去的；而且中國革命之發展，不是因為帝國主義加緊瓜分中國，某黨加緊

剝削民衆，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及殖民地革命勢力的高漲，和帝國主義某黨內部經濟危機之加深，統治之日趨動搖崩潰及其向社會主義蘇聯，全世界與中國革命勢力。之進攻不是中國革命羣衆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之下由鬥爭血戰而獲得偉大發展與勝利，而是由陳獨秀之一手推動便建立了南方各省蘇區紅軍，北方數省份中的紅軍游擊隊，與各地的工人罷工，農民鬥爭，這是十足資產階級的英雄主義與取消革命的理論！又說：『他（陳）是中國勞苦大衆的救星』這又是與馬克斯列寧主義沒有絲毫相同，而且完全是敵對的資產階級的理論，馬克斯列寧主義是不能承認任何個人爲解放勞苦大衆的救星的，只有在共產國際的正確領導之下，中國革命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中國勞苦大衆才能得到眞正的解放！

但是，取消派爲什麼要這樣抹殺事實胡說八道呢？當然有他們的用心，妞妞妮妮的欺騙了半天，終說出『而爲勞苦大衆謀福利「出賣勞苦大衆的」與資產階級作艱苦鬥爭的「好艱苦！一百元的被褥先到手，美味的飲食先到口了」陳獨秀的被捕而一方面証明了陳先生在革命的前衛中之偉大「小心呵！此處但是欺騙的毒箭，」他方面則暴露了資產階級之卑鄙下陳！「當心！此處又是麻醉的毒矢！」……無產階級勞苦大衆革命學生！立刻團結起來，用我

們全團的力量奮同我們的嚮導前衛陳獨秀先生！……」這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陳獨秀在他們住人家早已服服貼貼住得很稱意了，過幾日何愁不把整個取消派搬進洋樓住？「奮」什麼？不過借此來騙取羣衆以增厚取消派的實力，以更努力執行其破壞革命的先鋒任務而已！

全國工農兵勞苦羣衆革命學生們！正當爲爭取十月革命十五週年紀念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一週年紀念的勝利而鬥爭的時候，反革命取消派公開投到某黨懷裏去了，取消派在與某黨共同陰謀下，在某黨政府的武裝保護下，更加積極的向革命進攻破壞革命了！我們必須給取消派及一切反革命派以最嚴厲的打擊，揭破其破壞革命的一切陰謀，在廣大羣衆中宣布其死刑！才能保障十月革命的徹底勝利。

陳獨秀案移送法院

——天津大公報社論——

據京電，昨日中委談話會，根據蔣常委提議，將本月十五日在上海逮捕之陳獨秀彭述之等一案，解送法院公開審判，此極端正當之辦法也，然而吾人於此，願更爲徹底之要

求。

按陳案發生以後，因其人係中國新文化運動之開拓者，聲望素著，極爲社會注目；且以陳氏自來反對共黨之殺人放火政策，早被第三國際開除黨籍，久失領導地位，自不應與以暴力危害民國之黨徒同視，故一般多希望能從寬辦理。吾人以爲陳氏言動，是否有與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二條第二款及第六條規定相符之處，應由法庭審核，毋庸置論，要其能受司法機關之公開審理，已爲幸運。試更以牛蘭案與陳案比較，尤應視爲國家法治精神漸見進步之證明，蓋牛蘭案情節重大，證據充足，遠在陳案之上，此兩案皆能依法律軌道處理，實值得注意也。查牛蘭係於去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被捕，先經租界內之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受理，嗣爲淞滬警備司令部提去，於八月十四日解送南京軍政部陸軍署軍法司審辦，羈押四閱月之久，至十二月十七日始稱犯罪非在戒嚴區域，該司無權管轄，將案解送司法行政部，發交該管法院依法辦理，其後因聲請。轉管轄與要人要求保釋等事，引起不少糾紛，終以主管長官堅持獨立精神，卒未通融枉法，至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判處無期徒刑，受者帖服，並未上訴，判決確定後，今已移監執行矣。牛案本較陳案爲嚴重，牛蘭夫婦且歸法院審判，則陳

案之不由軍事機關管轄審訊，自是當然措置。所可遺憾者，前平牛陳兩案，情節相類而未經正式裁判。卒予處決者，不知凡幾，最著者如鄧演達之被殺，是其例也。即在今日，地非戒嚴，亦未剿匪，乃以共黨嫌疑，受逮捕與羈押，延不處理者，更不知凡幾？夫法律效用，在於公平，因人異法，決非正軌，吾人不願牛蘭夫婦因係國際學者而受中國優待，亦不願陳彭諸人因係社會名流特被法律保護，謂宜一視同仁，澈底行法，往者已矣，來猶可追，希望政府嚴厲通令各省區，一體清查，凡非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七條所應適用之地方，所有黨案，概限尅日移送該管法院，公開審理，依法判決；並應申明約束，將來再有此種案件，適令交由法院核辦，任何機關，不得擅自受理，或違法久羈，以重人權，並示公道，應幾同一罪名，不致顯有個別待遇，此事匪特人道正誼所應爾，實又愛護司法獨立者所應努力施行者也。抑自國家政策上言之，消弭反動，與其使用強力，不如訴之理智，與其秘密處置，不如公開啓導。近來政府對待共黨，一意擊破組織，從事分化，然而擊破之後，應有以替代之，分化之後，應有以整齊之，其法惟有一方面揭示法治之保障，使社會生活，造成一種新組織，新秩序，一方面樹立健全之理論，使青年人士懷抱一種新興趣，新希望，凡此皆非以公開

方式，予人以共信合作之信念不爲功，如果擴大法治精神，則於不安不定之人心，必可收潛移默化之功，此尤望負責當局鄭重注意也。

因陳案而引起的幾個問題

——天津益世報社論——

自陳獨秀在上海被捕以後，因陳氏個人在學術上以及早年在共黨中所處地位，故該案頗引起社會各方注意。近日各地輿論，對這案件，亦多加以討論。我們願乘此機會，提出下列數點，在原則上與社會各方共同研究：(1)思想言論自由問題；(2)懲治危害民國罪犯問題；(3)審判反動法律手續問題。

(1)思想言論自由問題。思想言論自由，訓政時期約法，加以保障。所以在思想言論自由一點上，不是贊成與反對的問題，而是自由的範圍問題。在理論上理，『自由』與『範圍』是矛盾的名詞。所以英國學者拉斯基是主張無限制的，他以爲有人主張天方地圓亦可以，有人主張月大於日亦可以，他們管這樣去運用思想，這樣去發表言論。因爲要有限制，這限制

果以何爲起點，以何爲終點？本然，思想言論自由，與思想言論本身的是非兩件事。讓人主張天方地圓，主張月大於日，這與接受主張絕對兩件事。取締不對的思想言論，每每牽連到對於的思想言論，這是人類進化的大障碍。所以學者們對於言論思想一點，大都主張取容忍寬恕的態度。許多人以爲這是過於理想的學說。其實在實際政治上，這亦是極聰明，極便利的策略。世界上只有思想可以代替思想，言論可以攻破言論。政治與法律的威力絕對不能消滅任何錯誤的思想。用政治與法律的威力，對付某項思想言論，每每爲某項思想言論做反宣傳。歷史上這種例証很多。李大釗殺了李立三亦殺了，許多中國共產黨徒都殺了。然而共產的思想與言論，并沒有因這班人的死而同近來於盡。共產主義的是非，是一問題，取締共產的思想與言論的策略，又另一問題。英美德法讓共產黨公開競爭政權，表面上似乎是縱容共產主義，實際這或者是取締共產思想更厲害。更切實的策略。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在倫敦寫的，英國在十九世際的末期，共產思想亦很興盛。法賓社起以後，社員從事研究政治上許多實際問題。當時英國保守與自由黨的政府充分應用法賓社的材料，改革英國的實際政治，一方面政治有了進步，一方面法賓社的主義完成，共產派的實力，就江河日下，這是對付共產方

法上一個極好的參攷資料。

（2）懲治危害民國罪犯問題，中國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此爲應付中國目前特殊環境而設，即在政局比較安平的國家，亦有維護政府本身生存的法令，英國法律在這點上比較寬鬆，英國憲法無所謂戒嚴法，英國絕不聞有宣佈戒嚴的事實，然而英國習慣法上，政府官吏依然隨時有用武力制止暴動，革命，叛亂行爲的權力，因有非此，政府本身失去生存保障。然而這種權力的行使，極有限制，其一，則所謂「危害國家」者，必爲眞實的「危害」：其二，制止暴動時，不得用過量的威力與過分殘刻的手段，所以在英國，法律上有禁止叛逆的條文，然而公園裏喊革命口號；刊物上印革命論文，是不礙事的，因爲口頭上文字上的革命，不是政府生命上眞正的危險，倘有人根據這種演說文字去暴動，去革命去叛逆，這種人馬上受警察的逮捕，法律的干涉，演說與言論的人，依然不受誘惑鼓動的牽連，這種法律原則又很可供我們的參攷，對陳獨秀案件，社會與論多認爲今日共黨中失勢的陳獨秀，組織托羅斯基學會的陳獨秀，應與實行暴動，實行革命的其他共產黨分別看待，此義甚是，此不止於陳氏應如此，我們且希望政府本此原則，以處理一切「危害國民」案件。

（3）審判反動的法律手續問題，據報載陳獨秀已引渡，且當轉解南京，組特別法庭，加以審判，此間所謂特別法庭，不知何指，查緊急治罪法第七條，有這樣的規定：「犯本法所定各罪者，在戒嚴區域內，由該區之最高軍事機關審判之，在剿匪區域內，由縣長及司法官二人組織臨時法庭審判之，」陳獨秀被捕地點在上海，今日上海既非戒嚴區域，亦非剿共區域，陳案自應由普通法庭審判，絕無組織特別法庭必要，此絕非爲陳氏解脫，查法治的眞義，是全國人民受同樣的法律，同樣的法庭管理。這又是西方所謂法等平等的原則，英國憲法學者載實對於身體自由的定義，就說人民非經普通法庭判定犯法，身體自由，不受侵犯，這裏「普通法庭」幾字，有絕大的意義，換言之，英國不得用特別法庭審判人民，所謂特別法庭，例如十七世紀時的「星庭」StarC hamber以及軍隊中現存的軍事法庭，中國目前軍事法庭，隨時隨地，代替普通法庭，執行職權，這的確不是法治國家的正當軌道。此外，又有反革命案件陪審制的規定，此亦爲特別法庭之一種，此亦與法治意義相反，全國人民，受同樣的法律，同樣的法庭管理，這是法治的原則，這又希望主張法治的人注意。

最後我們要聲明，我們這篇文字，不牽及任何主義與任何個人問題在內，因陳案的發生

FF起我們對社會應該注意的幾條原則，加以討論而已。

陳案應歸司法機關辦理

——導報社評——

共黨領袖陳獨秀在滬就捕之後，經高等法院及公安局之審訊，已於昨日解京，羈押於軍法司，今後政府對陳如何處置，尚屬難料，或謂陳爲杜洛斯基派之共黨，其主張異於一般共產黨徒且被第三國際除去共黨黨籍，其罪似可末減，或謂陳之破壞工作甚厲，將如鄧演達之組特別審判法庭辦理，或謂陳罪之輕重，應調查其最近實際活動之情形如何爲斷，或謂陳昔爲大學教授，對於教育文化上，曾有所盡力，功罪可以相抵者，論議紛紜，主張歧異，雖共有其一偏之見地，要尙未能賅括陳氏之平生，是以吾人主張一切應以法爲依歸，政府對於陳氏宜立即逕交法院公開審訊，俾符法治的精神，斯最爲上策，蓋法律所以維持一國之秩序，而奠定國家之基礎，自府政以至於小民，皆應共同遵守，不能有二言，否則法律紊亂，國政必將衰弛，所關非細，矧陳氏係共黨之領袖，國際聞人，視聽所在，尤不應不愼重將事，藉以表章法治，無愧大公也，况最近之牛蘭案，當捕獲之初，雖經軍事機關偵查審理，而其後

亦交付法院裁判，以陳氏比牛蘭，其所犯情節相若，亦無組織特別法庭之必要，當以普通共犯視之，故政府宜交法院秉公審判，庶足以昭示中外垂法來茲，吾人之意，初不僅關於陳案應如是辦理，即今後所有違法典章者，亦均應依法律程序處理，不可紊亂，不能擅越，蓋自民國以來，國人致力於收回法權之運動者，二十有一年矣，而至今終未有些微之效果者，雖強半爲帝國主義不肯放棄非法權益之故，而我內部一二有力者，專擅越權不能守法，使法律失其權威，亦有爲外人藉口之處，故吾人希望政府，一切應以法爲依歸，而陳案所以必須由司法機關辦理也。

陳獨秀被捕事件

——世界日報社評——

中國共產黨反對派首領陳獨秀氏，本月十五日在滬於病中被捕，十七日由特區法院移解市公安局，並將提京，依危害民國罪處理，此爲牛蘭案後共黨首領被捕，最能轟動中外人士之又一事件，陳氏在十年前，與蔡元培胡適等，固同以中國新文化先鋒自任，今日中國各派之可壯人物，甚至卽國民黨中之赫赫新貴，亦少有與陳氏無無歷史關係者，陳氏曩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以反動關係逮入警廳，一時舉國智識界爲之騷然，函電交馳，紛請釋放，終達目的，前後主辦新青年，嚮導等刊物，中國青年受其鼓吹煽動者，頗不乏人，至陳氏與中國共產黨之關係，則因其爲共黨發起人中之最賣力氣者，直可謂爲中共之唯一開創人，故今日其黨中重要份子，無論其爲幹部派，或反幹部派，覺爲陳氏所孕育而成，自共黨成立至國共合作時代，陳氏固儼然共黨之首領也，國共分家後，不知以何原故，爲第三國際及中國共黨幹部所不容，致被開除黨籍，自是，中國共黨，分化爲幹部派與反幹部派，陳氏領導反幹

部派，師宗杜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與其在施塔林領導之下的朱毛等相對立，陳氏拘於杜洛斯基立場，對中國革命的估計及理論系統，與行動路線，壹以杜洛斯基所著「中國革命問題」爲依歸，認爲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已佔統制地位，無產階級，已養成諾大的勢力，故鼓吹在中國實行「以無產階級專政開始的不斷革命論」之主張，抹殺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生拉活扯，務欲以中國革命的客觀需要，強合其主觀的理論系統。果如所言以行，中國革命，將永無完成之日，陳氏黨徒，亦覺該派前途黯淡，多望然去之，加以第三國際視爲左道旁門，不予接濟，杜洛斯基則自顧不暇，該派經濟既無來源，黨員人數又極寥寥，故雖有種種圖謀，迄不能發生何種作用，惟聞陳氏本人仍野心不戢，每化裝出入於上海各工廠，作工人運動，其個人生活，則殊艱苦凄涼，兩妻前後離異，長子次子均以反動伏法，剩此皤然老叟，貧病交加，亦卒被捕繫獄，生死莫測，若繩以恒人之人生觀，其一生憂患，誠有不堪言者，此番就逮，政府自將依法處理，昔日友生，處境迥異，恐無能如前此之加以營救者，即或有之，亦不能以私交而毀法律之神聖。吾人在政治立場上，固與陳氏不能並存，然對此老戰士之悲壯末運，則不能無動於中。蓋陳氏之思想及行動爲一事，其個人堅忍不屈，始終一貫之

風格，則實另一問題。回憶當時與陳氏致力於文化運動諸人，今日或居黨國顯要，或受社會崇拜，以陳氏之學力，若求高名厚利，與世人爭一日之短長，將何往而不自得？顧乃獨甘如此結局！吾人一方雖深悲其誤入歧途，一方則當此新式士大夫廉恥道喪，首鼠兩端，名雖標榜主義，實則唯利是圖之今日，陳氏未因個人榮利，而一變為世之斯謂新官僚，就此點言，尚值得吾人矜惜也。

陳獨秀引渡以後

廣州民國日報社論

吾國今日之危難，人人皆知爲暴日與共匪之所致，而暴日之決然於去年九一八逞其野心者，乃乘吾國水災洊至，共匪猖獗，吾國上下忙於救災，急於剿共。是暴日之肆惡，實與吾國共匪爲因果，則亦國人所不能否認者也。溯吾國共匪之由來，不能不憶及十年前李守常陳獨秀等之提倡，李陳等國人皆目爲智識份子者，徒慕蘇俄革命之新奇，極力介紹其思想輸入吾國，且有中國共產黨之組織，當時之蘇俄，外受列國之圍困，內恐爲帝黨所傾覆，不惜浪用盧布，助長國外之共黨，以壯自身之聲勢，且可藉此分散各國壓迫之目標，李陳等既炫於新奇，又迷聯於盧布誘惑，引狼入室，遺禍無窮，及後本黨恐共黨貽禍國家，因許其加入，欲其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乃李陳等不獨毫無誠意，且企圖乘機消滅本黨，以效忠蘇俄，其叛黨賣國之罪實已不容誅矣。

蘇俄以（世界革命）『工人無祖國』之名詞，欺騙國外之共黨，尤垂意於與世界關係複雜

之中國，設東方中央局統籌一切，以餉械接濟吾國各地之共匪及收買軍隊，務使中國糜亂，造成赤化以作其臣虜，其用意與帝俄時代之侵略手段同，中東路戰役之殘暴，伯力會議之無理，又何異於帝國主義？國難發生，擧國同仇，凡有人性，莫不同聲呼號，反觀敵國共黨，且宣言贊同其帝國侵略政策者，而吾國共匪反乘機暴動，予敵人以便利。今之贛南，閩西，皖中鄂北，皆赤地千里，不見炊烟，無不焚之屋，無不伐之樹，無遺留之鷄犬，無不殺之耕牛，百物盪盡，白骨纍纍。然其發縱，指揮，接濟，皆爲受第三國際所豢養之上海租界中國共黨總機關，昔者牛蘭夫婦之被捕，按出證據，盡與中國共匪有關，科以危害民國之罪，處以無期徒刑，因已過輕，而陳獨秀則爲中國共匪之鼻祖，雖曾被幹部派所排除，現在對內地共匪之發縱，指揮，接濟，有無參加，在吾人未得確實證據之前，雖不必即與明斷，然據報傳，陳氏曾組織杜洛斯基學會，自爲常委，在其寓所搜出反動文件書籍六十大綑，則其立意危害民國已無可疑，自應處以極刑，勿能寬縱，然陳氏雖經被目爲所謂吾國之學者，而吾國目下之所謂名流，多與陳氏有交誼，恐又將有效保牛蘭者，以保陳氏而嘵嘵於司法當局之前故吾人於陳氏引渡以後不能不特爲國人言之，應無致吾人一面勦共而一面縱共耳。

陳獨秀被捕

——北平晨報社評——

當年「拖四十二生的大砲」，為文學革命先鋒之陳獨秀，孰知於十年之後，為共產黨中央派所驅逐，而列於取消派之林，雖曰世變之遷流，可以知時代之混亂為何如矣。

國人聞陳獨秀之名，每以獨秀尚為共產黨首領者，乃不識共產黨內情之言也。共產黨之秘書長，第一屆為獨秀，近年以來，為瞿秋白，為李立山，為某某，已易姓四五次矣。其領袖所以再三更迭之故，曰由黨內關於革命策略之不一致，一方曰中央派或曰幹部派，斷定中國社會尚在封建時代，故其策略為農民暴動，贛皖鄂之紅軍，此派所主持者也。其與之反對者，曰托洛斯基派，斷定中國社會已入於資本社會，彼等不反對農民武裝，然以為同時應注重工人罷工，及世界革命之手段。蓋俄國內共產黨之兩派，史丹林派近年絕不提世界革命，獨注重俄內部之建設，發展集合農場。而托洛斯基派不忘情於世界革命，且以史氏之忽視工人當非計。此兩派之分裂，自有其俄國內情為背景，不知吾國之共產黨何以必沿用之，而造

成同樣之分野。無以名之，名之曰盲從而已。

或曰獨秀雖已非共產黨之首領，然近年共產黨之殺人放火，獨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竊以爲主持共產學說，組織共產黨與夫實行危害國家，此係三事，不可混而爲一。共產學說以反抗現社會爲目的，然其所以發生，由於人心之不平。人心之不平，必其國家本身上早有病根。故負其責者，不獨在主持異端之人，而政府與有罪焉。英政治學者賴司基氏不云乎：

「依往事觀之。政府與文字之獄，而能阻遏人民之指摘者，蓋無幾焉。其准人民之自由言論也，弊政既除，自少可以攻擊之機會，反是而加以禁阻也，愈令人民迫而爲秘密行動。」

可知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說之由來，其責任在政府，而不在倡異說之個人。賴氏又曰：

「以云列寧，亦復如是，使彼長居俄國，爲國會議員，何能爲革命領袖，乃既被逐而居瑞士，而謀覆俄皇政之心，乃刻不去懷矣。」

蓋政治上誠有疏導之法，何至以好生惡死之人類，迫而出於秘密革命之一途乎？故賴氏

之結論曰：

『政府爲周諮博訪計，得力於反對者之批評，必較贊助者頌揚爲多。阻塞人民之批評，即自種滅亡之根而已。』

至於共產黨之結社，視共產學說之傳播更重要矣。然所應研究者，則政團之被禁止者，實際上是否絕跡？賴氏亦有言曰：

『若按國家法律，告共產黨曰：「汝等不得爲共產黨之結社」，則此類結社，其絕跡矣乎？殆不然矣。表面上或不見共產黨團之成立，而秘密中彼等活動之難防自若焉。』故秘密結社之防止，乃不可能之舉也。即令獨秀尙有所謂托洛斯基學會之組織，不能以此定獨秀之罪名，當問此托氏學會在實際上有無危害國家之行爲。蓋政府根據一切法令，有維持其自身生存之權利。若由人民可以自由推翻，則政府且不能一日安居，安有執行政務之可言乎？故禁止實行危害國家之結社，乃事之當然者也。然此有無危害國家之行爲之問題，應由誰決定？曰此非政府自身之事，而應由法庭判決，政府應將關於獨秀現時擾亂國家之行爲，提出証據，由法庭在嚴格之司法保障之下，加以審查，果有眞憑實據，則國家自有常刑

。若徒以昔日曾爲共產黨領袖，或今日尙立於托派旗幟之下，乃亦與江西殺人放火之共產黨同類而並觀，此大不可也。政府之所待其人民，當以理性爲標準。因獨秀昔日之同志方以武力爭奪政權，乃遷怨於獨秀之身，則人權一無保障，所以支配中國者，獨有力而已，而吾國家非陷入於大混沌之狀態不止矣。

起來！起來！

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

先鋒報第四期——

中國革命的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左派反對派的導師陳獨秀，已被殘酷的國民黨逮捕了。這不僅是左派反對派的損失，同時也是整個中國革命的損失！

陳獨秀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同時，又是全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者，他那堅苦卓絕爲無產階級鬥爭的精神之偉大，他那爲中國革命鬥爭之不可磨滅的偉績，只要知道中國共產黨的人都沒有不知道的。在革命的陣營中他是偉大的領袖，在軍閥，官僚，資產階級………等反革命的眼中，是牠們惟一的死敵！這次他之被捕，並不是歷史上的列外，乃是階級鬥爭中之事實上所難免的！

反動的者[illegible]階級某黨幾年以來壓迫工農革命運動，日益毒辣的加緊對中國革命分子底攻進，逮捕，屠殺，監禁眞是無所不用其極！現在更逮捕中國革命的領袖陳獨秀，企圖更有力

的壓迫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每一個革命羣衆，在此種情形之下再也不能稍事猶豫了，起來！

為中國革命反對某黨逮捕陳獨秀，

推翻某黨的統治，從反動的手中奪回我們的領袖陳獨秀！

只有喪心病狂的史達林派才會誣衊陳獨秀，說他是「資產階級的先鋒隊」，只有階級的叛徒才會這樣作可恥的謾罵造謠！一切革命的戰士們！認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已被反動的某黨逮捕了！我們還不起來為奪回我們的領袖而鬥爭嗎？

起來！起來！為援救陳獨秀首先要接受他對中國革命的遺產，立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

為援救陳獨秀，要立即粉碎史達林派的造謠誣衊與他葬送中國革命的錯誤路線！

陳獨秀被逮捕了，中國革命失掉了偉大的領袖，中國的革命羣衆和一切左翼的社團，一切革命的份子都應立即起來，遊行，示威，通電，開大會，堅決不拔的為援救陳獨秀而鬭爭！

反動的資產階級某黨，幾年以來壓迫羣衆運動，屠殺革命份子，某種旗熾的白色恐怖旗幟之下，不知有若干萬的革命者的鮮血與頭顱，現在更日益毒辣的加緊對中國革命分子殘酷的進攻，逮捕，屠殺，監禁，眞是無所不用其極，現在，更捕獲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並在各地大批的屠殺工農羣衆，每一個革命羣衆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能屈膝忍受嗎？還不起來推翻某黨資產階級的政府嗎？

論「未亡人」陳獨秀

社會生活第一卷第五號——

中國取消派領袖陳獨秀彭述之及其黨徒十一人於十五日在滬租界先後被捕，頗引起一般社會之注意。有謂陳彭等此次必遭「毒手」，有謂陳等即無生命危險，取消派的政治生活也必就此結束。事實是不是這樣，會不會這樣，我們仔細考察之下，以爲未必盡然。

第一，陳在國共合作之際，頗博得一般社會的聲望，國共發生裂痕時，陳主張維持革命聯合戰線，與國民黨領袖汪精衛共同發表「國共聯合宣言」，事雖不諧，也頗得黨國之諒解。國共分家，陳因思想錯誤爲共黨所蔑視，後因他估量中國革命已失敗，此後若干年間沒有革命，而主張取消一切實際行動，取消紅軍蘇維埃，取消罷工，示威，遊行，主張召集國民會議等等來附和黨國，致被共產黨開除黨籍。開除後，他組織了所謂取消派與共黨幹部派對立，重新修改其政綱，估定現在中國社會沒有封建勢力存在，反對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反對土地革命，此外在實際行動又與幹部派處處爲難。這些不但沒有危害着黨國，而且是黨

國一個有力的助手。

第二，陳彭被捕後，我們看到陳等因「倉卒被捕時，未多帶衣被，函請添購，中央黨部當撥洋百元作陳彭添置衣被之用，陳要求晋謁蔣中正陳立夫，申述過去主持托洛斯基派在中國政治活動情形，當局已接受。」（十月廿一日晨報）。同時國內名流學者北平胡適及滬上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致電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請求「矜憐耆舊」，「愛惜人才」，「開其自新之路」，蔣夢麟卅一日親往監獄探視，並携帶書籍多種水果數簍以慰岑寂，朱慶齡又飛漢臨滬營救，這都是表現陳彭諸人非一般應立予鎗決者可比。

過去如彼，現在如此，則未來思可過半，故我們逆料陳彭等的「厄運」一過，即不能在黨國獲得高位重爵，生命危險，正可毋勞我們小百姓過慮，又何況陳彭諸先生，現在神氣十足，在獄中大閱讀其黨義，前途殊未可限量呢?!

陳獨秀被捕

申江日報社評

過去中國共黨首領陳獨秀氏，竟於前晚在上海岳州路榮慶里十一號被捕，同時被捕者，尚有同黨九人，已於昨晨在高等二分院開調查庭經過了初步的審訊，據國聞社消息，謂「中國方面警備司令部及市公安局均有人前來迎提，日內可交警備部提去云云」。而陳氏則以患病，尚在斐倫路工部局醫院醫治。

此案既尚在調查中，吾人本暫時不願有所論列，但陳氏與中國共黨有過甚深之關係，則為舉世所共知，故吾人亦不妨略述對於此事之感想，以供注意此案者之參考。

吾人對於共黨在湖北江西的行為，完全立於反對的立場，認為即以武力討伐之亦不為過。但共黨如放棄其殺人放火的行徑，在不擾亂社會秩序的條件之下，僅力從事言論思想之鼓吹，或參加某種會議之選舉，則亦應有其法律上之保障。

吾人希望當局對於此類政治背景較為複雜之案件，最好以尊重法律尊重司法獨立之精神

出之，一切依法以爲解決，如最近司法當局對於牛蘭案之處理，頗不失法治國家持平之態度，吾人固希望司法當局之審愼精神，不僅適用於一國籍不明之共產學者牛蘭，而類於牛蘭相似之中國人亦莽出之也．以。

論陳獨秀

老 贛

社會新聞第一卷第七期

陳獨秀被捕了，正和當年列甯在克姆達特工廠被社會革命黨行刺受傷的消息一樣的震動全世界，尤其是震動每一個中國青年的腦海。雖然現在陳獨秀還沒有到蓋棺論定的時候，但無論如何，此次即使不死，而他的政治生命，也必就此結束，所以我們可以有充分的權利來總論陳獨秀了。

獨秀的思想如何，他的一身事業如何，這是另一個問題，但無論怎樣，我們總不能不認他是一位出人頭地的怪傑。這十餘年來，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獨秀都有極大的影響。五四運動是中國的啓蒙運動，而這運動，是獨秀暗中領導的。自稱爲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的胡適之。在獨秀而前也不能不承認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大師了。五卅運動高潮，獨秀尤其是一位主要的導師。由於五四，五卅這兩個偉大的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中所佔的重要的地位，因而獨秀的貢獻，在歷史上也是不朽的了。這，即使反對陳獨秀的人，也是不否認的。

但獨秀也有他的缺點，第一：他的思想沒有系統，無論對於那一種學說，都沒有深刻的研究。例如他以馬克思主義革命家自命，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是門外漢。這點，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他生平沒有關於理論上的任何著作。第二：他的個性過強，而那種唯我獨尊的宗法社會家長自命的態度，也是他失敗的原因。因此我們只能說獨秀是一個政治家，縱橫但一理個家，思家。類，回當不家不想可

陳獨秀等被捕以後

靜

——壬申半月刊第三號

最近轟動全國的消息，要算是共產黨托洛斯基派的首領陳獨秀在上海被捕一事了。實行奸淫擄掠殺人放火的政策，糜爛地方，危害國家，如現今盤據贛湘豫鄂……等省的共產黨徒，其罪大惡極，自然是應該：聚而殲之，若共產黨而在不擾亂社會秩序的條件之下，專從事于理論的宣傳，思想的鼓吹，論理政府尚應認定其黨的存在，其黨及黨員均應享受法律上的保障。

陳獨秀大約要算是我國最先的社會革命運動者，他起初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S.Y.)，進而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C.Y.)和共產黨(C.P.)。推今日赤禍之由來，陳氏固不得不負一部份的責任，然他確爲反對共黨幹部派所現行的暴動政策之最力者。他在一九二九年曾發表『黨治意見書』，其要點如下：

1.中國革命眞的失敗了，這責任完全是第三國際的錯誤，他在執行中早已反對過，所以他

的錯誤，只是不曾堅決反對。

2.中國此後若干年中是沒革命的，須待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到某種程度，方有革命的好況來臨。

3.取消一切實際行動。

4.從新再行研究馬克斯列寧主義，和平秘密，培養革命力量，等待機會再幹。

5.取消紅軍蘇維埃，解散一切武裝。

6.取消罷工，游行，示威，努力生產幫忙民族資本發展。

7.主張召集國民會議。

他發表上項的『黨治意見書』以後，即被共產黨及第三國際開除黨籍。後雖領導共黨托洛斯基派，而該派現在也似乎已經崩潰。是陳氏不過是一過去的共產黨領袖而已，不過是一馬克斯列寧主義的信徒，而宣傳其理論，鼓吹其思想而已。自陳等被捕解京，我當局尊重法律尊重司法獨立，由蔣委員提議，經中央常務會議通過，將全案移歸法院審理。此誠不失為法治國家持平的態度。

抑又思之，司法當局之辦理牛汪一案，頗極審慎。牛汪之與陳獨秀，一爲指揮暴動的現行犯；一爲從事宣傳的言論家，法院方面如其能本辦理牛汪案件的精神態度來辦理陳獨秀案，那陳獨秀案之如何判決，我們也就不難預測到幾分了。

陳獨秀被捕後的取消派

汪均予

——社會新聞一卷十期——

自從陳獨秀被捕以後，在野黨方面又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動。陳獨秀早已被共產黨開除了，共產黨把牠目爲政治敵人，所以獨秀之被捕，對於共產黨可說是毫無損失，而且是減少了共產黨的一個敵人，在這意義上說，對於共產黨還是有利的。但在取消派一方面，則自經此打擊，其前途實在很難樂觀了。

取消派的內部，無論其派系如何複雜，無論陳獨秀的基本勢力如何單薄，但他究竟還是取消派的重心。取消派之所以能够與幹部派成對峙之局，到不是靠什麼主張，而是靠陳獨秀的牌頭。所以有人說幹部派所依賴的，是第三國際蘇聯與朱毛的所謂紅軍，而取消派則靠陳獨秀一班人的聲望，這句話是頗有眞理的。因爲無論幹部派怎樣攻擊陳獨秀，而陳獨秀的偶像，終於還很大。取消派之所以能够從第二國際領得一筆津貼，也是樊迪文買陳獨秀的面子，而一些莫名其妙的小黨員，也是因爲震於陳獨秀的威名，而纔加入取消派的。如今陳獨秀

被捕，縱不致立刻就死，但也總不能立刻恢復自由，所以他已不能再在名義上實際上領導取消派了。本來一個有強鞏的組織基礎的黨，則領袖的作用可以減少，以列甯如此能幹偉大，但因爲俄國布爾塞維克已有強鞏基礎，所以雖然沒有了列甯，黨還是存在。沒有組織基礎的集團，領袖就是集團的生命，所以縱然鄧演達的能力與作用無論怎樣趕不上列甯的萬一，而因爲第三黨沒有基礎之故，他一死第三黨就完了。陳獨秀之於取消派，正如鄧演達之於第三黨。所以陳獨秀被捕以後，取消派事實上已等於消滅。羅章龍雖然想重振旗鼓來鬧一下，但強弩之末，已沒有多大作用了。現在上海方面，取消派已大起分化，一小部分投降了幹部派，表示悔過，大部分則丟去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招牌，公然做了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徒，如李季劉仁靜李麥麥輩，已經正式宣佈爲單純社會民主黨了。在北，方去年九一八以後，取消派的勢力本有澎漲的趨勢，但因爲獨秀被捕之故，引起極大的分化，王藹林輩公然宣佈脫離取消派，而另組成馬克思主義學會，宣告停止實際行動，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北平楊凱一派，亦正式宣告取消派爲革命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叛徒，而承認自己的錯誤，向幹部派要求恢復黨籍。總之，可以作這樣一個結論：因陳獨秀被捕之故，取消派已等消滅，這

一方面減少了幹部派政敵的影響，而另一方面又加重了社會民主主義的作用。

陳獨秀與牛蘭

——主張與批評報——

王造時

共黨杜洛斯基派領袖陳獨秀及其同志十人被捕，並已解送公安局。將來結果，有人說是凶多吉少。我們雖不贊成共黨的盲目暴動，但認爲陳等被捕以後，應經過法律的手續，才能判罪，不能隨便『解決』。(一)陳等應交法庭；(二)法庭審判應該公開；(三)被告應有聘請律師辯護的權利；(四)不應用刑強逼陳等自認犯罪。回想當局對於指揮共黨幹部派的牛蘭夫婦還能依法解決，那麼對於取消派的陳等，當然不會採用鄧演達式的解決辦法；否則，豈非又表示我們怕了外人。至於爲牛蘭夫婦奔走呼號的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諸氏，對於陳等，不知有同樣的熱心沒有？更不知前此以去就力爭的司法部長羅文幹，再有維持司法獨立的精神沒有？

取消派消滅蘇維埃運動的妙策

筱妞兒

共黨機關報

蘇維埃是致某黨及一切反動階級死命的武器，所以某黨和它直接間接的走狗們拚命向蘇維埃進攻，極端仇視蘇維埃運動是當然的。不過進攻蘇維埃的方式，因地位及力量的關係有些不同罷了。某黨是用圍剿的方式從正面進攻，而某黨的朋友取消派則用無恥的謾罵和造謠從側面進攻。正因爲取消派的進攻是從側面的，而且他是拿着馬克思主義的招牌的，所以它的方法也最毒辣和無恥。

下邊是取消派在國民會議專號中提出來的方法，在這裏有機會請大家賞光一下（大意）：

（一）蘇維埃一定要經過國民會議，才能和城市工人運動及整個革命連繫起來，才能擴人。所以蘇區必須派代表參加資產階級召集的國民會議，把平分土地問題，請求追認，即非蘇區也照樣辦。

（二）紅軍必須派代表參加國民會議，請求追認貧農有自動武裝的權利。

朋友們，這是多末漂亮的說話呵！這是多麼無恥的鬼計呀！蘇維埃紅軍是由武裝鬥爭中生長出來的，而取消派胆敢計算蘇維埃紅軍派代表大國民會議中追認！這樣，則很容易的把蘇維埃紅軍消滅了。取消派除這些毒計外，還玩些中國的蘇維埃紅軍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聰明的寶寶）不是十月革命時的工農紅軍，而是貧農武裝，是二十七年革命的迴光的字眼來降低蘇維埃的政治意義和安慰自己！

這有什末呢，這只是比取消派從前罵紅軍為流氓無產階級，為土匪，為共產黨「製制」的革命勢力更無恥罷了。

某人三十萬大軍的圍剿，托洛茨基陳獨秀的惡罵，都沒有把蘇維埃運動消滅了。恰恰相反，它一天天更加強壯起來。于是取消派的先生們惱恨，苦悶的結果，想出了這條妙計，這眞是取消派的進步！

現在蘇維埃的發展，已經成了革命的一個主要部隊，不只動搖了某黨的政權，而且威脅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帝國主義某黨更加緊的向蘇維埃進攻，在帝國主義直接援助之下的第四次圍剿已經開始。正在這個時候，取消派能提出這樣的妙策來消滅蘇維埃，並不是偶然的，

這是它在中國革命中一貫的政策，和唯一的任務。

但歷史真是頑固的，蘇維埃能突破某人的三次圍剿，必然也要要壓碎取消派的荒謬中傷，蠻橫的走向革命成功的前途！

陳獨秀底生平及其政治主張（赤光）

這是托陳取消派的宣傳刊物之一，我們拿牠和前面中央幹部史達林派蔡和森等人所發表的幾篇東西對照觀察，可以知道兩派如何在互相詆毀，仇視。同時，盡情暴露了中共派別之分崩離析與組織之不健全。至於理論上孰是孰非，請賢明讀者自己去判斷。　　編者

自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於十月十五日在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某黨政府的陰謀之下被捕以後，全國革命民衆，沒有不憤慨痛惜，同時也引起了大衆對他的革命事業的特別注意。我們倉卒之間，寫出這篇文字，因爲手邊缺少一切重要的參考資料，所以只能作簡單扼要的敘述。

一．他的家庭生活

二．日本留學回國之前後

三．五四運動之前後

一．他的家庭生活

陳獨秀的歷史，就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因爲中國共產黨是由他一手創造的，所以他的歷史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因爲他是中共左派反對派的創始人之一，所以他的歷史也就是恢復中國黨到列寧主義的黨的歷史。

讓反動的某黨誣蔑罷！讓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造謠罷！讓史大林主義者無恥地幸災樂禍罷！這一切，都不能改變歷史的事實！

陳獨秀是安徽省安慶人，現年五十四歲。他於父親在前清任武官於東北，（大約是統帶）前東北某大軍閥當年脫身綠林以後，曾作過他的衛兵。所以他的家庭是所謂「安慶望族」，且富有資財；在安慶，東北，與北平等處之地產和商業，至少有好幾百萬。但獨秀同志自二十

歲留學日本時，即從事於革命運動，對財產則棄如敝屣，至今土地全被佃戶分種，商業則全被舖夥侵佔，陳亦未嘗過問，不歸家已二十餘年了。

他在安慶的家屋，北伐以後曾被反動的某黨查封過一次，後因知他與家庭十餘年來毫無關係，得其同鄉舊好柏文蔚之援助，又予啓封。現在家居者僅其年逾八十之老母一，且惟恃典質爲生。他的妻子因不慣於受他那流離的革命生涯，早已和他分離了。他的兩個兒子，喬年和延年兩同志，自幼亦都獻身於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延年同志首先犧牲於上海四一二的屠殺中，他受了極殘酷的刑訊；喬年同志亦於一九二八年被害於武漢。但這一切爲常人所絕不能忍受的悲慘的命運，在他的革命的人生觀上看來，都毫不足以使他的革命的決心有所動搖！

他永遠渡着一種儉約刻苦的生活，他作教授的薪金，他的著作稅和他的稿費，除過維持他一個人的最低生活而外，都貢獻於革命工作。他經過北京政府之反動，孫傳芳之反動，武漢時代之反動，以及數年來某黨資產階級軍閥之白色恐怖，時時渡着一種提心吊膽的生活，被捕入獄和這次共有四次了；但他爲革命爲無產階級，爲共產主義而奮鬥，始終如一，永遠

沒有鬆懈過。這一次無論資產階級的文人新聞記者們及史大林派官僚們怎樣對他造諸誣蔑，他是決不會因愛惜自己的生命而被人軟化的！

二・日本留學回國之前後

當清季，他留學於日本，年方二十左右，就已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其時中山正組織同盟會，主張狹隘的民族主義，以『興漢滅清』爲口號，他即表示反對，他不贊成這種『民族殘殺』的政策。辛亥革命就以這種漢族殘殺滿族而終結，僅僅在形式上推翻了專制政體，實際上對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官僚資產階級，絲毫沒有解決。由此可證明他對革命之卓識。

他中途廢學歸國，奔走革命，曾與于右任之民立報同時，在上海創辦『國民日報』，主張實行徹底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反對專制。他獨樹一幟，始終拒絕參加同盟會，以後也始終沒有參加過某黨；即一九二三年，共產黨國際史大林的領導機關決定令中國共產黨加入某黨，惟他一人首先表示反對。他前後反對參加同盟會和某黨的意義雖稍有不同，但對中山的政治路線總算有一點認識了。

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雖然比中山要高出一籌，但還不能說他在政治上已如何的成熟。他的政治思想還只限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革命，還未發展到無產階級革命。這正由於他受了歷史條件的限制，一個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家，不是可以由天上降下來的「生而知之」者，而是要經過歷史的訓練，長期鬥爭的經驗，才有可能。

三・五四運動之前後

民國六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他爲該校文科學長。

民八以前，他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他的政治思想就大大的改變了，他此時已開始注意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問題，他認爲這是最正確最澈底的一種政治運動，他曾勸導政治的朋友們應向這個道路走。

迨民八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就站在領導的最前線上，因爲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政黨之組織，所以他不得不獨自行動，有一天他和其朋友煽動羣衆，自印反對北京政府，援助被捕學生的傳單，親自到天橋香廠一帶散發，被安福系政府的軍警捕去監禁，經全國各地的「學者名士」紛紛通電援助，始得免於毒手。出獄後他爲環境所迫，已不能立足於北京了，便毅然

辭人北大文科學長之職，南走滬上，主辦新青年雜誌。

五四運動，在中國的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個分割時代的『政治運動』，而且是一種『羣衆的』民族革命運動。牠是辛亥革命所未解決的革命任務之從新開始爆發，獨秀同志曾說這並不是陳獨秀胡適等可能創造得出來的。此時已有十月革命的勝利，若中國已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對這一運動加以正確的積極的領導，使之繼續發展下去，則第二次大革黨之爆發，也許待不到一九二五年。

不幸，五四運動終被資產階級改頭換面了，即消滅其政治運動的意義企圖轉變到『文化運動』的方向去。實驗主義者胡適便是代表資產階級以『文化運動』欺騙羣衆的急先鋒。

然而，五四運動已衝動了中國無產階級的覺悟，他們已走向政治舞台，全國如大產業區城與鐵路工人對五四運動都曾熱烈的參加過，資產階級要把五四運動『向後拖帶』的企圖，終不能完全實現。

獨秀同志在五四時代的功績，不僅在他能領導五四運動，而特別在他能竭力反抗資產階級的陰謀以保持這一個運動的『政治面目』；不僅在他能注意到政治運動，而且在他能把這一

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運動聯繫起來。獨秀同志的這種卓識自然是發源於當時的十月革命之勝利與中國無產階級的覺醒，然而當時惟有他能反映時代的最前線，唯有他能把握住這一新的客觀形勢，把新興的無產階級運動發展下去。

迄一九二〇年，在新青年雜誌中，他與胡適一派在思想上就完全分野了。他以辯證唯物論的政治家的觀點，主張五四運動必須在政治的道路上繼續的發展下去，而且只有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繫起來，才有繼續發展下去的可能。胡適則唱出『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二十年不談政治』等口號與他對抗，極力主張把五四運動只限於『文化運動』的範圍以內。獨秀同志則以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認爲『文化運動』自然應該領導，但單獨的做『文化運動』而忽略了『政治運動』，則『文化運動』便不可免的要成爲資產階級的『俘擄』了，極力予胡適以反駁。

他們經過一個時期的論戰以後，就完全分開了，新青年雜誌也就完全成爲獨秀同志一派——共產主義者的言論機關了。

那時法帝國主義者就認識牠（新青年）是代表着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怪物——共產主義之

萌芽，故兩次拘捕獨秀同志，終因多方營救，將拘禁改科罰金而出獄。他自始即站在階級鬥爭的前線上，他認為『坐牢是革命家的點心』，每次出獄後都更緊其革命運動，不過新青年則因帝國主義者之壓迫最後仍然停辦了。

此時共產黨的組黨運動已漸漸成熟了。

四・中國共產黨的組黨時代

一九二〇年，在上海他首先聯合少數同志，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開始工人運動，這是他投身於無產階級革命實際工作之開始，是中國總工會的雛形，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萌芽。

一九二一年初，他及其同政治主張者又開始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即SY）；隨即組織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至一九二三年，經過一月十二日在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指揮之下的六萬餘工人大罷工之勝利，影響到長江流域以及北方的工人羣衆，工會紛紛成立，工人罷工，七月間之漢陽鐵廠工人罷工，八月間的京漢路工人罷工，九月間的安源鑛工罷工，結果都得到相當勝利，工人由罷工中得到教訓，工會的組織更加擴大了，更加鞏固了。但工會

甘任遇到軍閥之摧殘，故於本年八月間全國工人皆發動勞動立法運動。至十一月間因唐山五礦工人三萬餘人罷工失敗，各鐵路工會代表乃集合於北京，決議：(一)籌備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以統一各路組織，(二)如遇外力壓迫，各路一致行動，以保障工會之存在。至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因京漢路統工會成立大會被禁止，乃引起『二七』流血劇。

經過這些運動，革命運動已深入於工人羣衆，這些運動大都是當時還在『嬰年』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的，共產黨至一九二三年秋間便擴大組織，全國各重要區域都成立了支部。社會主義青年團也改爲共產主義青年團(CY)了。

中國共產黨自組織成立加入第三國際以後獨秀就任黨的領袖（總書記），並主編嚮導週報。自一九二三年以後，共產黨在政治上差不多支配了全國勞苦工農及左傾青年的思想，不幸，這種偉大的力量，最後被『加入某黨』那史大林路綫斷送了。

在開始組黨的時候，發起人除他而外，有李大釗戴季陶邵力子譚平山陳望道李漢俊等等。這些份子除很少數以外，中途不是因某黨的關係而退出組織，便是叛變而投降了某黨。李大釗於一九二七年在北平犧牲於革命，譚則於革命失敗後背叛了。今日共產黨尚存的幹部，

以及在反動旗幟之下的闊人們，多係受過他的薰陶者，然而有始有終，盡瘁於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而且具有偉大的人格者，僅他一人，即他的敵人也不能否認這一事實。惟有喪心病狂的中國史大林主義者，惟有那些想藉罵陳獨秀而要好於史大林以增加或保持其黨的官僚地位者如瞿秋白李立三等大言不慚的罵陳獨秀爲『反動』！

獨秀同志自組黨以來，惟以其純潔的人格貢獻一切精力於革命，在黨內從不『鬧小組織』，『爭領袖』『排斥』『拉攏』等等卑劣的行爲，在政治的道德上說，他可算是一個最眞實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看看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那些小官僚的行爲！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等在五次大會以前，就進行小組織，互相拉攏，互相排斥？這幾年以來更加烏煙瘴氣了，有所謂『李立三派』，有所謂『陳紹禹米夫派』有所謂『調和派』有所謂『周恩來派』，最無恥的要算瞿秋白在莫斯科組織『江浙同鄉會』了！然而就是這些人物來罵陳獨秀是『反革命』！

五．第二次大革命失敗的前後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過程中，無疑的陳獨秀同志曾執行了不少的錯誤路線。

但我們必須研究這些錯誤路綫是怎樣構成的？錯誤的根源何在？他是不是應該負錯誤的主責任？史大林派的國際領導機關和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的）把錯誤的全部責任推在獨秀同志一人身上，取消他的領袖地位，最後並開除了他的黨籍，不惜採取一切卑劣的手段打擊他，這是不是應該？對革命的利益何在？

假若主要的錯誤之根源在他個人，假若他毫無理由的不承認錯誤，那麼爲了革命的利益，爲了無產政黨的紀律，獨秀同志當然是不可饒恕的！饒恕了他就是不忠實於革命！

假若不是那樣，主要的錯誤之根源在史大林派的國際領導機關而不在獨秀同志個人，他個人不過是錯誤路線之執行者，他的錯誤不過是錯誤路線之『必然結果』，那麼這樣單方面的打擊每個同志個人，這樣的官僚主義手段與教育，便是背叛革命，便是使全世界無產階級得不到教訓，便是使中國共產黨破產！正如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獨秀同志覆國際的信中所說：

『自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了悲慘的可恥的失敗後，我因親身負過重要責任，一時實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的反省期間。我雖未能及時

澈底認清這個失敗的教訓並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親歷的經驗，得深深知道這種失敗是過去整個的政治路線之必然結果。然而國際的領導機關却輕輕地把這個失敗幾乎簡單的歸過於我個人。如果這樣便解決了問題，關於我個人當然用不着說什麼；但若以個人的責任問題掩蓋了全部政治問題，掩蓋了失敗眞實教訓，因而斷送革命之前途，其罪實不可恕！』

我們現在開始由一九二五——二七年黨的總政治路線來研究這一是非；我們爲了革命利益，完全取着一種極客觀的態度來研究，我們不代人造謠，我們也不代人掩飾。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共產黨的總政治路線是；共產黨與某黨即史大林所謂『工農黨』！聯盟，不僅在政治上要與某黨完全合作，實行國民革命；而且在組織上共產黨也要『加入』某黨，於某種旗幟之下，共同行動；這種聯盟規定一直要繼續到『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這個『階段』爲止，共產黨中途若『推倒某黨的領導，便是超越階段的危險』；所以爲要保持聯盟的良好關係，共產黨就得對某黨整個妥協！

存聯盟之初，居然不定出具體的『聯盟政綱』，共產黨居然不保持牠自己的『獨立權』與

對聯盟者某黨之『批評權』；居然對共同的責任，相互的義務，和聯盟的限度，並不定出；因爲既是『加入』某黨，這些條件當然就用不着！

這種聯盟自始就是出賣無產階級革命，出賣中國共產黨的孟塞維克政策！決不是列寧的原則。

這種總的政治路線完全是由史大林派的國際領導機關決定的。這由過去一切文件可以絕對證明！舉凡第三國際與中國黨的一切主要的政策和戰術，都是根據這一路線而產生的！總的路線既有錯誤，則由他而生的政策和戰術之錯誤，便是必然的結果；故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之失敗，其『主要的』責任當然在史大林派的國際領導機關，中國黨及領袖陳獨秀不過是第三國際官僚領袖們的錯誤路綫之執行者罷了，陳獨秀本身並不是毫無錯誤，但他不過充分的引伸第三國際領導機關的錯誤罷了。

總的政治路線之錯誤處，就是共產黨取消自己的獨立領導權而與資產階級的某黨混合組織；以後雖經過歷次的事變，都未能及時退出某黨，組織蘇維埃以挽救既成的錯誤與失敗，一直斷送革命到底！

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說：一個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者，應該永遠記下這一鐵則：即『無論任何時候和無論任何條件之下。無產階級的黨，決不能加入別階級的政黨，或與別階級混合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主義政策之基本的和先決的條件。』總的路綫錯誤之原因，是由於『階段論』的錯誤和對資產階級革命性及某黨的階級性認識之根本錯誤。

中國某黨無論在其行動的歷史上，在其某某主義的政綱上，在其建設中國實業計劃上，在其上層領導成份上，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且自始即帶有不少的反動性（如希求帝國主義的帮助及不主張沒收土地及大貧小貧論等）；至於其中的下層羣衆含有不少的「工農份子」，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不乏比例，決不能因此改變其黨的階級性，無論其口頭上如何主張「世界革命」「擁護工農利益」，和「聯合蘇俄」，凡在一個革命運動高潮中，羽毛還未豐滿的資產階級往往採用一部分迎合無產階級的口號，甚至於拿出社會主義的幌子，以獵取無產階級的同情與擁護，這是資產階級的常態，是在歐洲革命運動史中的定例。無產階級在沒有獨立的政黨時，常常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常常是簡單的替資產階級服務，無條

件的替資產階級去推翻封建的統治。而馬上即被資產階級踐踏。中國的無產階級不幸也在共產國際及中共錯誤的幻想的政策領導之下，不自覺的做了中國資產階級某黨簡單的工具，以苦力的資格替他們推翻了代表官僚買辦資本的北洋派的統治，以與帝國主義妥協。資產階級的某黨剛一抬頭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殘他們昨日的擁護者——無產階級。我們加入某黨和長期留在某黨的結果：是在無產階級羣衆面前掩飾了某黨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鬆懈了工農羣衆對某黨的戒備：提高了某黨的政治地位，組織和強固了資產階級反對工農的統治，終致某黨對工農不斷的大批屠殺和他們的政權之獲得。

我們在某黨的政策，因爲希望留在某黨內，保持長期的階級聯盟：所以不惜不斷的讓步：一九二四年某黨的中央全會，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許某黨的組織國際聯絡委員會，監督中共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凡國際所給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命令須先交該委員會看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某某政變圍繳省港罷工委員會及蘇俄顧問和蘇俄視察團的衛隊槍械，逮捕大批共產黨員後，復以某黨黨務整理議決案的形式，令共產黨及青年團將加入某黨的黨員名單繳存某黨，禁止我們批評某人的某某主義，令我們同志退出軍事學校或退出共產黨；這些

事實已經是資產階級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他的領導與指揮，而不是史大林頭腦所幻想的，「聯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際的政策不但不因資產階級進攻使無產階級自己更加獨立起來，反而採用了最可恥的投降政策，嚴厲的阻止中共退出某黨，連準備退出都不許，繼續極力武裝，國際代表還極力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帮助並擁護某人的軍事獨裁，從此無產階級更進一步完全投降了資產階級，不管自己正式宣告爲資產階級的附屬物，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某人開始大屠殺，國際對某黨的政策，仍然是繼續擁馮擁汪，說馮玉祥是工人出身，說汪精衛是土地革命的領袖，反對中共退出某黨，反對組織蘇維埃。並且在某人叛變以前，曾命令中共以「勞資仲裁」代替罷工鬥爭，命令我們避免與某人的軍隊衝突；在某人叛變以後，曾命令中共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軍官們的土地，命令中共以黨部的力量制止工農的「過。」行動，最後全部某黨已公然反革命，還命令中共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某黨，直到南昌暴動，還是在左派某黨旗幟之下舉行的。這樣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毀了自己的旗幟，服從某黨的領導，變成了某黨的束縛工農的工具；這樣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終從頭到尾一貫的空前未有的最可恥的機會主義，分明是出賣階級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九〇五年布爾什維

克堅決的反對與資產階級妥協，獨立的領導農民，准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實現工農民主專政的政策，關於階級聯盟問題，列寧常常引用巴爾夫斯的說話：『我們無論何時都不應忘記的條件是：共同奮鬥，分別走路，不混合組織，看同盟者猶如看敵人一樣。』國際既強制中共混合在某黨組織之內，復大喊：『推倒某黨的領導是超越「階級」的危險』。事後却責備中共不應損失其組織上及政治上的獨立；其實中共加入某黨，根本已毀壞其獨立，使不能執行其獨立政策。中共要執行國際這些機會主義的政策，則步步投降資產階級，毀滅中共組織上政策上的獨立，乃必然的邏輯，難道除了那些實際問題外，還有懸在空中的獨立嗎！

共產國際對某黨這樣破產的政策，是根據他們對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關係之根本錯誤的認識。他們以爲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因受帝國主義之壓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國主義對中國愈壓迫，則中國國內進步的各階級，愈會團結一致形成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這種聯合戰線的方式是「某黨」！史大林稱某黨爲『各階級聯盟』或『四個階級的聯盟』，而不是資產階級政黨！這分明是組織上之階級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時期某一運動中兩個獨立政黨行動上的暫

時的局部的聯盟，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對中國商品與資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非依賴帝國主義不能生存，這種依賴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必須靠更殘酷的剝削工農，才能免強抵制住和資本技術更高的帝國主義國家工商業競爭，才能够維持自己的生存發展，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農的衝突更爲不可調和，更易於爆發階級戰爭。資產階級最初參加民族革命，乃是圖利用能够在他們控制條件（過去國際的政策正是對資產階級擔保這種條件）下的工農羣衆的聲勢，向帝國主義做買賣，好取得於他們自己階級的那一點點利益；他們看到工農羣衆根據其本身利益，侵犯資產階級的利益領導革命時，資產階級便馬上感覺到工農革命比帝國主義對他更是根本的危險，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很快的反對革命，乃是其階級性之必然。由此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愈壓迫，革命運動愈高漲，則國內的二個階級的鬥爭愈加急緊而決不能因此促成階級聯合和緩階級鬥爭！某黨是一種資產階級欺騙利用民衆的工具，用抽象的「國民革命」的口號（在我們不進行對資產階級鬥爭的狀況之下）麻醉住工農羣衆意識，不組織自己的獨立的武裝，而只是無條件的爲資產階級奪取江山，資產階級獨享勝利之果，而且馬上回過頭來屠殺工農羣衆，這是一件自

目繹天的事實，誰都不能否認的。

我們加入及留在某黨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經過某黨去爭取小資產階級的羣衆而與牠聯盟，這也是機會主義的模範的表現。無產階級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層小資產階級羣衆，即城市及鄉村的貧民。固然無產階級隨着革命發展之現實的環境，要團聚一切革命勢力，但無論如何我們的着眼是在下層勞苦羣衆，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上層所領導的民主政黨。我們要團結廣大的勞苦羣衆在自己方面來，首要的就是無產階級自己要有獨立的政治地位與鮮明的旗幟。有時可以甚且必須在某一事務上，某一明確的具體的暫時的行動綱領上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建立聯盟；但這個所謂「聯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已獨立的政治地位，去揭破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之妥協與欺騙，以奪取廣大勞苦羣衆在自己的政治影響方面來，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遂遷就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更不在組織上與他混合起來，把自己的頭顱，套在資產階級的圈套裏，而認爲是『集中革命勢力』！從前第二國際即主張俄國的布爾塞維克黨應與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合併，他們常說：不僅得在落後的俄國爲甚麼多數派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分而爲三。列寧則堅持只能與社會革命黨有政治行動上的「聯盟」，

而不能在組織上和他混和，和他聯盟。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尙保持與勞動者同盟對封建黨及大資產階級的黨作革命的反抗；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以中央委員會名義致共產主義同盟的信，嚴厲的指出這一同盟者的危險性，他說：『即爲對付共同敵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組織，對敵人直接鬥爭時，兩黨利害一時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時的結合。』過去共產國際對某黨的政策，完全拋棄了馬克思列寧的遺教，而是採取了從前第二國際於意見，特意把某黨裝成一個獅子燈，我們都鑽在裡面去旋舞。像這樣混合組織的聯盟，則遇事掣肘，並混亂了我們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經過他們組織去爭取其下層羣衆，並且更要喪失我們自己階級的羣衆，因爲在他們眼裏，我們是和某黨一個組織的東西！

在革命高潮中，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層羣衆即城市鄉村的貧民聯合最好的形式，便是蘇維埃，即是由工農貧民兵士的廣大羣衆選舉代表組織的蘇維埃，牠的任務是武裝羣衆及指揮羣衆的政治鬬爭奪取政權的機關。共產國際的領導，在革命高潮中爲要跟着大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上層跑，作那種無希望的同盟夢，於是根本拋棄代表城市鄉村的貧民的利益

，在鬪爭上服從某黨的政綱，越此便說是『過火』！在組織上把農民協會及店員小商人的組織工作通統交給某黨，不許組織蘇維埃；他們竟至說：『中國的某黨對現時中國的革命的作用與一九〇五年的蘇維埃對俄國革命的作用是一樣的』，『武漢某黨爲革命運動的中心』，『武漢政府是革命政府』，『若現在卽刻建立蘇維埃，拒絕擁護武漢政府，提出二重政權的口號，推翻武漢政府，便是對某人等予以直接的援助』（史大林）。『在將來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還可以利用某黨作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組織形式』（布哈林）。他們的錯誤完全由於迷信少數派的『階段論』遮掩了眼睛，妄想由汪精衛的某黨專政「和平」的轉變到「工農民主專政」，再由工農民主專政「和平」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階段這樣分得整整齊齊的，他們以爲這一階段做完了，那一個階段自然就會跟着來，用不着蘇維埃！他們完全離開無產階級革命觀點，他們不知道政權由這一階級轉變到另一階級，只有經過暴力之奪取，才有可能，決不能有甚麼『和平轉變』，蘇維埃就是無產階級爲奪取政權而應準備的最好的武器；『政權的性質只能有兩種，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權，便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列寧），決無所謂中間階段，卽工農民主專政！他們完全不認識不但南京的某黨已公然的反革命，卽武漢的某黨和某

政府也已日漸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馬日」事變後，他們和某大軍閥已經沒有區別，此時各派某黨資產階級（凡是剝削勞動的大小資產階級都包函在內）參加民主革命的歷史已經告終；同時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到中國某黨一致承認『過火』的工農運動，已經打破了各階級聯盟，超過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開始由民主階段，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反革命性實已經開始轉變了。無產階級的政黨，至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即應退出某黨而獨立，在北伐開始時就應該在隨北伐所到的地方組織蘇維埃，至少在四月十二日事變後即應建立蘇維埃與某黨政府相抗由二重政權走到推翻反革命的某政府，由無產階級專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一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是這樣，而是始終拘泥於民主革命的階段，始終迷信某黨，始終想利用大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權代替工人與鄉村貧民羣衆的蘇維埃。中共中央此時未能力爭退出某黨，建立蘇維埃，打倒某黨的領導，反而在國際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農民部通告中，都承認農民有『過火』行動；並且自行取消漢口總工會糾察隊的武裝，以避免和某黨軍隊衝突，這都是莫大的錯誤。一直到某黨公然全部反革命，革命運動已經一敗塗地，此時反而突然想起利用蘇維埃的口號，作奪取政權的冒險

嘗試。

以上便是在「國共聯盟」那一總的政治路線之下所演的過程與結果，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中國的國貨，而都是史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國際領導機關之所賜。沒有相當時期經過馬克思主義及階級鬭爭鍛鍊的中國共產黨，自己本沒有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能力，過去及現在錯誤的根本政策與理論，自然都來自國際。

獨秀同志並非沒有錯誤，他的錯誤，在史大林派看來，說他不聽(?)國際的指示，故錯誤的責任完全在他，那無異說他執行國際的機會主義政策在技術上太不高明了！

在我們看來，錯誤的根源在國際，獨秀同志的錯誤只是執行國際的錯誤路線太忠實了；他及中共中央過去對機會主義沒有一點認識與抗議，忠實的可恥的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政策，國際喊一聲農民運動「過火」，他就留聲機似的在嚮導週報上也大罵「過火」！這是應該負責的！他是黨的領袖，可以比別的中央委員負責更多些！

他對共產黨加入某黨這一政策，在開始時雖然曾表示反對，但他並未能堅持他自己的正確意見，最後還是被國際批評為「幼稚」而取消了！這也是表現他那時在理論的認識上還不充

分。

獨秀同志這種錯誤，只能說是一種缺點；因爲他爲歷史條件所限制，他沒有經過長期的理論鍛鍊與鬥爭試驗。他當然不能有豐富的革命智識，他對列寧的門徒如史大林等也絕夢想不到那樣的卑鄙齷齪！他的缺點並非不可救藥！馬克思列寧托洛斯基這些領導也並非由天上掉下來的！

假若史大林派的批評完全是對的，錯誤完全在陳獨秀一人，獨秀的錯誤是自造的機會主義，不聽國際的正確領導，然而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會議』獨秀沒有參加，六次大會的決議案上也說：『八七會議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定出武裝暴動的方針……走向革命的大道。』爲甚麼不幾天而史大林的忠實信徒瞿秋白又被打下去，並批評爲『盲動主義』？六次大會是在莫斯科舉行的，六大以後在李立三領導之下的中央也是國際認爲毫無『陳獨秀主義』的氣味的，爲甚麼不幾天李立三又被打下去，並批評爲冒險主義？假若說是由於中國的幹部不成功不可靠的話，然而負有指導世界革命責任的共產國際對這一點極微小的事情，也不能先事預防，沒有這一點遠見，那國際之所以爲國際，史大林之所以爲史大林，不亦太難爲情

乎?!

獨秀同志一九三〇年二月覆國際的信中說；『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領導」，然而自一九二七年以後直到現在，你們應該已經取消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而引導中國黨於正軌，兩年來事實的經過是怎樣呢？（五年以來事實的經過又是怎樣呢？——編者），中心的問題就在這裏，』

我們現在來研究一下這個『中心問題』，就是打擊獨秀同志的問題，其用意何在？

第一，因革命失敗了，史大林企圖以打擊『執行者』，打擊領袖，推責任於一人，欺騙工農羣衆，欺騙中國黨員羣衆，以遮掩共產國際之破產，抵制反對派之批評。這是史大林派官僚黨制之下的一個鐵則，不僅適用於獨秀同志，瞿秋白李立三都是同樣的犧牲者，在歐洲各國共產黨之領袖自一九二三年以來被犧牲於此者不知凡幾！

這種官僚黨制，不僅是以個人問題埋沒了全部政治問題，消滅了由工農的血泊中得來的教訓，因而斷送革命之前途，在客觀上完全是出賣階級的企圖，使國際的威信更加掃地；而且是在主觀上有意破壞兄弟黨——中國共產黨之機體。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其相互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羣衆沒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之領導，革命只有失敗；無產階級沒有牠的政黨之領導與革命羣衆特別是城市與鄉村的貧民之擁護，也是沒有出路的；黨若沒有領袖之領導及無產階級之基礎，也是不能走到勝利之路的！歸結起來說，領袖在革命中的作用是特別重要的。

一個共產黨的領袖是不易培植成熟的；必要經過長期工作，困難經驗，與正確的理論鍛鍊，才會產生。培植領袖，保護領袖，是黨在革命中極重大的任務。領袖不能毫無錯誤，能承認錯誤才是好領袖。隨意摧殘一個歷史的領袖，損毀他的地位與聲望，這對革命的利益說來簡直是罪惡。

史大林派若能很細心的很慎重的盡國際的責任，指導中國革命，培植中國黨的領袖，愛惜兄弟黨的機體，則中國革命決不至那樣慘敗，即革命失敗而獨秀同志也決不應受那樣的摧殘，因爲他在中國黨已成歷史的領袖，他的聲望與才能，在中國說來，無有再出其右者，在國際的培植之下，將來必能更見發展成爲偉大的領袖，這無疑的是中國革命的利益，史大林並不管這個！

第二，史大林打擊陳獨秀爲的是將中國黨完全壓伏在他的馬下。史大林爲實行其一派把持共產國際，把持各國革命，爲實行其官僚黨制，爲打擊左派反對派，自一九二三年以來，無時不在處心積慮要將各國兄弟黨一一壓伏於他的馬下。

德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史大林所最提懼的，若這兩兄弟黨不能拿在他的掌握中，則他在國際有孤立的危險。因爲德國黨在歐洲是最有力量的，中國黨在五卅運動以後也發展很的很快；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內和東方殖民地國家的這兩大黨對官僚主義是一種很大的威脅。史大林對機會絕不錯過，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失敗後，德國那些領袖們被打擊得乾乾淨淨，毫無才能太爾曼經過召往莫斯科一個時期官僚主義的訓練以後，再送回德國任黨的領袖，德國黨的問題是解決了。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時期中，獨秀同志在國際在中國以及在黨內有很大的權威，曾引起史大林最大的不安，所以一九二七年革命一失敗，史大林便派其心腹米夫等到中國來，以國際的名義，包辦『八七會議』，由久仰國際鼻息時思奪政治領袖的翟秋白以書記，把陳獨秀打擊下去。由翟秋白以來的領袖們不能說完全成了史大林的『應聲蟲』，史大林打他們，

他們一聲也不能響，中國黨完全放在史大林的踐踏之下，國際永遠是對的，中國黨黨員，永遠是幼稚！

八七會議對他的總書記資格雖被取消了，只要對革命沒有損失，他也決不因此而有所不快，他所反對者只是史大林派違反組織原則的辦法。

八七會議應說是黨轉變政策的一個關鍵，因過去的工作關係與未來的策略之決定，八七會議無論如何應該要他參加；即取消他的領袖地位，也應該在會議中加以正式決定；然而瞿秋白及國際代表則承史大林之訓令，拒絕他出席會議，而會議中又決定他任中央常務委員，這還不是十足的官僚把戲嗎！陳反對毫無結果，乃告假赴滬，拒絕參加常委，並拒絕前往蘇聯。

所謂八七會議的精神，最重要者，就是打擊了陳獨秀個人。在政策方面，對機會主義未作根本的系統的改正，仍然說留在某黨有四大理由，仍舊主張站在某黨左派某種旗幟之下；所表現者只是企圖以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動挽回其機會主義政策之絕望而已！

由南昌暴動，廣州暴動，兩湖秋收暴動，以至六次大會前，獨秀同志曾向中共中央提出

種種政治意見，反對盲動主義，但中央不予發表，反獨斷章取義的誣蔑。以後湖北，順直，江蘇幾個重要省委繼續發生反對中央錯誤政策之鬬爭，中央認爲這些風潮都有受他煽動的嫌疑，至一九二九年初便開除了他的黨籍！獨秀同志就是這樣毫無理由的被開除而離開他所手造的中國共產黨！

國際曾一再召獨秀同志到蘇聯去，他都拒絕了，他知道史大林的陰謀，這一去不是被蛻化，便永無回國之望，他當然不願離開實際工作去受官僚主義的侮辱！直到一九三〇年二月間，獨秀同志早已接受了左派反對派的正確意見，國際政治書記部還來電要他前往，『參加本政治書記部審察中國共產黨中央開除你的黨籍的決定的會議。』不想用這種騙小孩子的方法騙他前往，以減煞左派反對派之勢力。獨秀同志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對國際的回信說。」

——『中國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等早已緊急的宣佈我爲「托洛斯基主義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賊」…………企圖這樣一次決定我的前途。同時你們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給他們的訓令也就教導他們：『在一切鬬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及托落斯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爲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

隊伍裏隱藏的陳獨秀派托落斯基派。』然而現在你們突又來電給我，要我到莫斯科參加你們的會議，專門討論我的開除黨籍的問題；你們這種種意見，我很不容易瞭解。

『中國無產階級必須的到國際之列寧主義的領導，才可順利的達到他的解放之前途，這是必然的。因爲你們的蒙蔽與封鎖，直到半年前，我們才得到托落斯基同志關於中國問題及一些蘇聯問題之文件。從此以後我才澈底的系統的瞭解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之眞正的根源所在。當你們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而托落斯基同志却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眞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也並且預言這種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必須達到的結果。現在這種預言已經處處由事實證明出來了。可是你們却把托落斯基驅逐到蘇聯以外，把他交在階級的敵人之手中，即土耳其中國某要人之手中，其他和你們政治意見不同的大批同志却被監禁或流放，現在又要從中國調我到莫斯科，說是專門解決我的問題，我實不知你們又打算幹甚麽！

『我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問題，而是關於整個的政治問題。我從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中，已完全證實五六年來國際的領導是站在官僚機會主義的路綫上，尤其重要的就是你

們濫用國際的威信及憑藉官僚機關的權力，繼續維持這種路綫，不惜破壞一切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原則，不惜惡劣修改馬克主義的基石十月革命的根本方法，列寧主義的戰術主要教訓，關於中國問題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將來第三次革命的政權是工農民主獨裁，還是無產階級的獨裁？（二）目前的任務是直接準備武裝暴動，還是提出過渡時期的政治口號（如國民會議）作民主的鬥爭？你們因未得到機會主義失敗的教訓來認清革命發展中階級關係的轉變，因而你們在未來革命政權上所收到的結論是工農民主獨裁；因爲未收到盲動主義失敗的教訓，不承認上一次革命早已完結，因而你們在目前直接任務上所得到的結論是準備武裝暴動和鄉村游擊戰爭。這樣你們在總的政治路線上是把革命拉向後退，在目前鬥爭的策略上是破壞羣衆革命運動的發展。關於這些根本問題，我和你們實有不可調和的不同意見，我及我們意見相同的同志所發表的政治意見書，不久你們當可以看見。這裏根本問題不能解決，便沒有別的問題可以解決。但這些根本問題決不是調我個人到莫斯科便可解決的，而且這是官僚的辦法。

「政治問題，尤其是涉及到世界革命運動的問題，應該從黨內公開的討論來解決。托落

斯基同志關於中國以及整個國際問題的許多文件，你們不肯正式公佈於各國支部加以討論；駐中國的國際代表會以開除黨籍嚐而威嚇我禁止我發表政治意見；中國黨中央仰承你們的意旨不允許把我屢次所提出的政治意見交付黨內討論，只憑他們片面造謠：；同志中有提出疑問的，立即被指爲『隱藏的陳獨秀派』開除出黨——這樣便算解決問題嗎？你們如果有誠意解決問題，你們備有一切權力與方法，否則一切問題都只有憑世界無產階級的命運一道去解決。』

六・組織中共左派反對派時代

獨秀同志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他雖然知道這種失敗是過去整個路線之必然結果，不承認錯誤的責在應由他負，然而他却不能徹底的認清機會主義的病源所在：他雖然知道八七以後的路線還是錯的，他也反對盲動主義然而他却不能及時的找出新的出路。這固然由於他的經驗不够，然而主要的還是由于受了史大林派的蒙蔽，國際左派反對派的文件完全被封鎖了，使他完全得不到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啓示！

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有些中國反對派的同志由蘇聯先後返國，在上海成立反對派小組織

謀發行反對派的機關報——我們的話，托落斯基同志的中國革命問題與托同志所草的中國反對派綱領，也漸漸傳佈到中國來了。

獨秀同志此時始看見反對派的文件，因爲他在中國革命中的實際經驗比任何中國同志都要豐富些，加以他自革命失敗後一年以來之深思熟慮，對於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他最易瞭解，一切的一切他都由此恍然大悟了，爲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間，他完全接受了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便和他同意見的八十餘人發表了一種『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內容完全是根據中國左派反對派綱領而寫成的。同時他們也組織了一個左派反對派的小組織，其機關報名爲無產者。

中國左派反對派除我們的話與無產者以外，還有兩個小組織：即十月社與戰鬥社。

中國整個的左派反對派運動之生產，一方而是由於受中國革命在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領導之下迭遭悲慘的失敗及黨內官僚制度直接的反響；另一方而是由於得國際左派反對派及其領袖托落茨基同志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對於共產國際史大林派領導的批評之帮助。這就是中國各派的小組織之共同的來源。

但在整個的共產國際是分崩離析的狀況之下，左派反對派在各國都不能一開始就達到統

的組織，在中國更遇到特別困難的環境。中共在國際的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黨的理論基礎非常薄弱，幾次失敗之嚴厲的打擊又使黨的基礎瓦解，並處於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大林派官僚制度先期對於反對派之極端無理的壓迫——在這種種條件之下，中國近派反對派在開始的時候就很難從一個成熟的政治派別中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以前未統一的各小組織都是在分散的狀況中各自成立起來的，因為有各自分立的小組織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組織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訐，眞正政治問題之討論都難免別生枝節。

當時其他各派對獨秀同志及其一派之參加反對派，取了一種很慎重的態度，這由於獨秀同志是過去機會主義的執行者，他是否在主要的問題上能接受反對派的意見？對這一點當然不能取妥協的態度。不過在問題之爭論中，其他各派對獨秀也難免有些成見，這是小組織並立的狀況之下一種不可免的現象。

後經反對派國際委員會與托洛茨基同志來信批評，各派意見始漸接近。托同志的信中關於獨秀同志的問題說：

「……不久以前我們接得譯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同志公開的信，在這個信中獨秀同志對于所有根本問題之立場完全與我們一般的立場相同。因此我未看出爲什麼幾個中國的同志繼續的稱獨秀同志的一派爲『右派』的理由。

「直到今天，我才得讀陳獨秀同志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的信（即陳獨秀同志的告同志書），我認這封信是一篇絕好的文件，這封信以完全明顯和確定的態度答覆了一切重要問題，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獨秀同志在這封信中，完全站在正確的立場上。……

『如果像陳獨秀那樣一個傑出的革命者，與黨正式決裂，即任黨開除，而宣佈自己與國際反對派的立場「百分之百」一致，那我們能對他掉頭不顧嗎？難道你們當中有好多共產黨員能像陳獨秀那樣老練嗎？他過去有過很大的錯誤，但他已能自覺這些錯誤，自覺錯誤的經驗，對於革命者，對於領袖，乃是『金不換』的經驗，我們反對派青年當中有許多人能夠而應該從獨秀同志學習呵！』

國際委員會來信說：

「我們讀到陳獨秀給共產黨員公開的信，都很愉快，我們相信這個宣言表示對國際反對

派的充分的同情，不但可能並且絕對需要和其他各派合並起來。」

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反對派的四派在國際委員會及托同志的指示之下統一了。統一以後的領袖是獨秀同志。

不幸，統一大會剛完結，剛要開步走，進行工作，便因叛徒馬玉夫的告密遭受了一次大逮捕，組織上受了嚴重的打擊，經獨秀同志等一致努力的結果，至『九一八』事變以前，組織已漸漸的恢復元氣。

在『九一八』運動中，因爲我們的策略正確，一開始就抓住了這個事變的中心，一年以來我們在上海的工人運動中有很大的發展；因爲史大林派之路線錯誤，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已完全落在我們左派反對派的肩上了，我們在工人中的發展當然是中國革命前途的運輿。然而喪心病狂的史大林派則看着我們的發展而發抖，竟不惜常常造謠說反對派告密，竟不惜以法西斯蒂的手段雇用流氓破壞我們的工人運動(如上海電話罷工等)，這還不算是階級的罪人嗎!?

十月十五日，獨秀同志與彭述之同志等又在滬被捕，不消說這不僅是中國左派反對派的

損失，同時也是中國革命的損失！

他們——陳彭兩同志同志無論如何是決心爲革命犧牲了，他們決不會因統治階級之毒害改變其革命的立場；中國左派反對派經過這次損失後，其本身在國際反對派指導之下必然要更加努力，牠有牠的政治的任務作眞實基礎，牠決不會因損失一個領袖而潰散！一般勞苦羣衆們應趕快團結在左派反對派的旗幟之下，打倒某黨爭取革命之勝利，才可以挽救陳獨秀彭述之等同志的損失！

史大林派也應站在階級的利益上，與反對派共起作打倒某黨，奪回獨秀同志，幸災樂禍適足以證明你們毫無革命氣味，不過是中國某要人的嘍囉而已！

七、結論

歸結起來說：獨秀同志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者，是現在中國共產黨左派左反對派的領導者！

他十餘年來，渡着流離刻苦的生活，一切都供獻於革命！

他永遠站在階級鬥爭的最前線上，前後入獄四次，每次都使他對革命的決心增加，這次

他也決不會被統治階級軟化！

世間只有上帝沒有錯誤！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之過人處，不在於說他絕對沒有錯誤，而在他能承認錯誤，並能在錯誤中找出教訓。獨秀同志從來不掩飾錯誤！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應歸咎於史大林派的國際領導機關，獨秀同志不願因個人而埋沒了全部政治問題的教訓，所以堅決反對史大林派之卸責，這是對的；但獨秀同志並非毫無錯誤，他的錯誤就在他忠實的可恥的領導者中共中央作了史大林派機會主義路線之執行者！沒有反抗或沒有堅決的反抗，以致斷送了中國革命，這種錯誤雖有可原，但也是十分嚴重的，這個責任他不能不負，他對這一點已公開的接受了！

他因政治鬥爭而被史大派開除黨籍，是光榮的！他決不像那些現在黨內的幹部，爲保持或增高自己的地位，竟不惜向史大林乞憐，犧牲自己的政治道德，至犧牲革命！

他在失敗和錯誤的教訓中找到革命的眞理，他毫無保留的毫不遲疑的接受左派反對派的正確路線，毫不鬆懈的爲這一路線而鬥爭！

他自從走到反對派的正確道路以來，也並不是毫無錯誤，但他不久就完全改正。譬如他

根據恩格斯及列寧托落茨基的意見，對於南方農民運動認爲這不能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軍，這不是真正的紅軍，這在原則完全沒有錯誤；他把南方農民運動中的流氓無產階級的成分估計得過大，這是過分的，不正確的估計！因爲，固然牠不能是真正的紅軍，但牠的主要基礎還是在黨領導之下的革命農民的武裝，而決不盡是流氓無產階級。但這一錯誤，獨秀同志以後已坦白地毅然地改正了。

史大林派常常拿這一點來攻擊他，這又有甚麼意義？史大林派的錯誤斷送了中國革命，現在還在繼續的斷送中，而且拒絕批評！獨秀同志這一點錯誤與史大林派比起來那簡直是『滄海之一粟』。

而陳獨秀能够勇敢的作自我批評，史大林則永不承認自己的錯誤，永不改正自己的錯誤，所以陳獨秀始終是偉大的布爾塞維克！陳獨秀始終是向前進的！在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歷史中，他始終是成爲重要的領導者之一個！

末了，讓我們沉痛的勇敢的高呼：

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奪回陳獨秀同志！

改造共產黨內的官僚黨制！實行黨內「民主集中制」！

召請托同志回國挽救國際與蘇聯危機！

擁護世界各國左派反對派，及其革命路線！

一九三一・十・二八・

陳獨秀被捕

髡 謾

新社會半月刊第三卷第九號

從前出過大風頭，做過共產黨領袖，赫赫有名的陳獨秀，冷落許久，報章上同他久違了。忽然「冷灰裏爆出一個熱栗子，」各報大書特書「陳獨秀被捕」。

陳獨秀本來叫陳仲甫，是一個吟風弄月，惹草拈花的舊文學家，與詩僧蘇曼殊，狠有深交。他個性是浪漫的，疏懶的，理想無實的，狠像溫李一流人物。假使他生在閉關時代，祇配做花月痴上韋癡珠，還彀不上做韓荷生，與科學化的共產黨，慘酷激烈的革命工作，本來「牛頭不對馬嘴」。然而時會逼人，白面書生，竟做了共產的急先鋒，革命的大偉人；居然有人稱他為中國列甯，這眞可以說時勢造英雄了。

可是書生究竟是書生。當民國十五年，革命進佔上海時候，有人告訴我，說：「他住在一個安徽同鄉上海大地主某君的法租界花園內，終日吞雲吐霧，在烟塌上，用烟槍指揮革命工作。」我以前未聽到他吸鴉片烟，告者未必是眞。而有人造他這話，未必不是他浪漫疏懶

的脾氣引出來的。他對於共產，除了文字倡導之外，不見有何工作；終究被他的共產後輩排擠掉。最後組織取消派，已是途窮日暮之思了。

陳本人雖無實地革命工作，他兩個兒子，延年喬年倒是共黨的健將，進行工作甚猛，都爲主義犧牲了。陳孑然一身，極人世淒涼寂寞之致。共產黨是反面無情的，不管他從前做過開創功臣，不管他兩個兒子全犧牲在主義上，竟開除他中央委員，連每月八十元的津貼，也取消了。在他們說是黨紀黨律，然由我們中國人報德酬功的舊眼光看來，亦可以說共黨刻薄寡恩。

聽說共黨裏面，亦是派別多歧，若顯著的就是幹部派與取消派。幹部派是親附蘇俄現在握權的斯太林；取消派是奉戴出亡在外的托爾斯基，是共產的過時人物。陳獨秀現在雖做取消派首領，已經倒霉極了。不知政府何以雪上加霜，忽而拘捕他，聽他在外邊，促成共黨分裂之勢，倒反不好麼？

我個人主張思想應該自由，不論何種主義學說，都可以公開討論，是是非非，一聽國人公判。共黨的擾亂社會行動，可以禁止：（就現狀而言）至其主義學說，絕無禁止之必要。

禁了反使牠更易引動人。一本尋常書藉，列爲禁書，便覺得神奇玄妙，富於好奇心理的人，便要千方百計，貿取購讀。共產學說，容易麻醉青年，恐怕效用有大半在這禁字上。共與非共的學說，列在一起，一禁一不禁，人們的興趣及注意力，必先理會禁的，然後顧到不禁的；這是人類好奇的天性，所以禁止共產學說，實在不啻誇奬共產學說。陳獨秀現在既沒有破壞工作，祇從事於文字宣傳，又何必不寬容他呢？

論陳獨秀的所謂「功」「罪」

楊鏡芙

——載十日評論第二卷第一期——

關於陳獨秀等被捕事件，記者於上期本報已略論其梗概；茲者國內輿論界，對此案極爲注意。平，津，滬，漢各重要報紙雜誌，諸者著論評述；總其結論不外：一，在此清匪剿共時期，陳氏居然被捕，實爲一大痛快事；認爲非處以極刑，實不足以昭懲戒。二，認爲政府處置此案，應分別陳氏之功罪，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的判決；不可徒然用一個「反動」的公式率然處置。

現在陳氏已經解京，新聞界，法律界，和學術界對此事都異常注意；其注意討論之點，不外乎陳氏之「功」「罪」二字。上海律師章太炎，願作陳氏之義務辯護人。平，津，京，滬之學者，如：蔡元培，楊杏佛，胡適，傅斯年等以爲陳氏過去對於中國文化有重大貢獻？後雖爲共黨，亦應以功折罪，從輕發落。同時中央政府要員中，亦有爲陳氏緩頰者。此時關於陳氏之功罪問題，記者認爲有申述的必要。

近讀胡適之氏主編之北平獨立評論第二十四號，傅斯年氏著陳獨秀案，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處置此事完全有考慮陳氏一生行跡，及近二十年中國革命歷史之必要……關於陳氏行跡可分三段去看：

第一段是攷慮國民黨清共以前十年中陳氏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這裏所謂革命者，不只政治革命，應該概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本來近代的革命不單是一種政治改變，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會的，文藝的，相互改革，否則革命是等於中國史上之換朝代，試問有何近代意義呢？且就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看來，其中含有無限的社會改造，何嘗是「你去我來」的公式呢？所以我這一段中把革命做廣義的，必爲讀者所同意罷！

淸末陳氏在日本時，加入革命團體，而與當時長江革命人士一派較親密，與粵浙各部分較疎，又以他在學問上著文的興趣，與國粹學報民報諸人同聲之來往最多，然而因爲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人，他永遠是他自己。東南革命時，他先在南京，復到

安徽都督府中做柏文蔚先生之秘書長。民國二年，反袁舉義，失敗逃亡，在日本度他那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蝨子的生活。袁世凱死了，他回來，在上海開始辦「新青年」。要知道陳獨秀對於革命的貢獻，新青年便是最重要的證據。

新青年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看：一是自民國四年九月創刊時至民國六年夏，這時候是他獨立編著的，二是自民國六年夏至九年年初，這是他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幾個同志；特別是在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共辦的，不過他在這個刊物中的貢獻比其他人都多，其他除了短時期以外，永是這個刊物的編輯。三是自民國十年年初算起。這個刊物變成了共產主義的正式宣傳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適之先生等便和這個刊物脫離了要係。現在從新青年中看陳君之貢獻與變遷是很明瞭的。

獨秀是在反袁的立場上最努力的人，文字的和實際政治的皆然。袁氏代表什麼呢？若把袁氏看做代表帝制，眞正大把事情看淺了。蔡孑民先生的見解最澈底，他說：

袁氏之爲人，蓋棺論定，似可無事苛求。雖然，袁氏之罪惡非特個人之罪惡也。彼實代表吾國三種之舊社會：曰官僚，曰學究，曰方士。畏強抑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

奢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壇祀帝，小學讀經，復冕旒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表學究之頑舊也。武廟宣誓，教會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旅歐雜誌第三號)

袁氏之死，雖不曾將這三個社會帶了去，而反應之下卻給反對這三種社會的分子一個陽春。新青年便應運而生于民國四年之秋。那時候的志士雖也知道中國的問題並不簡單，然而總看見希望在前面，希望的寄託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賦給之體力智力為基礎，西洋近代文明之貢獻為工具，以剝洗這幾千年的瑕穢之青年身上。獨秀把這個意思透闢的扼要的，寫在他的新青年的發刊詞中，他說：

欲救此弊，此大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麻，決不作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

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發軔於這個立點上，則後來之倫理革命論，文學革命論，民治論，以及附會主義，都是自然的趨勢，必然的產物。

而陳氏之發揮這個立點，大有一個基本精神，即是他的猛烈的透闢的自由主義。我們可於他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新青年一卷一號）中看出他自己造成之來源，他的精神到底是法蘭西革命的產品，並不是一個「普羅」的產品這或者是他終久受不了第三國際的部勒，而做他的「異端」之緣故吧？

他在這個立點上發軔，自然要着眼到教育問題，他於教育問題上標出四個綱領，(一)現實主義，(二)惟民主義，(三)職業主義，(四)獸性主義（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這樣的一個教育綱領現在還不是過時的，而獸性主義尤其需要。他於「獸性主義」一節下說：

> 人間道德之活動，乃無道德的衝動的繼續。良以人類為他種動物之進化，其本能與他種動物無異致，所不同者，吾人獨有自動的發展力耳。強大之族，人性獸性同時發展，其他或僅保獸性，或獨專人性，而獸性全失，是皆墮落衰弱之民也。

獸性之特長謂何？曰意志頑，狠善鬥不屈也；曰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賴本能，不依他爲生活也；曰順性率眞，不飭僞自文也。

其抵抗力一篇（同書一卷三號），痛論我國人「今日卑劣無恥退葸苟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正和他的獸性主義相發明，在今天舉國不振作之情況下看來，尤覺親切。他的思想中這個「尼采層」是使他最不能對中國固有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協的，也正是他的文學革命倫理改造兩運動中之原動力。

文學改良之論創於胡適之先生，他在這篇文章中標舉入手法八件：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夢痕按：這就是胡先生的所謂文學改良的八不主義。）照這個方案做下去，只有做白話之一路。他在這篇文字的末段中也露出這個意思，而未曾作絕對的主張。獨秀接着在次一號中（二卷六號）發表了一篇響應的文章，叫做文學革命論，他說：

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其原因之……大部分，則爲盤踞吾人精神界，

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汚深積，並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於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等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舖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個講台不僅注意在新文學之寄託物，白話，且高標新文學應有之風氣，而說出新文學應有之風氣是和中國政治與社會之改革不可分離的，這眞是一個最積極的新文學主義，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及革命史上一個不磨的文件！以後文學改革的趨勢多集中在白話問題，誠然，這是初步中最基本的問題，然而，白話終不過是個寄託物。用白話來做寫實主義的文學，固然方便，用他來做古典主義也未嘗不可，用他來寫人道主義固然方便，用他來寫朦朧生活也一般方便。當時有個學衡雜誌，專攻擊白話文，我有一次對朋友說：他們眞把這事看得淺

了，他們接受了古文主義，還可以因了他的古典主義呢？當時對於外國文學又每每沒有別擇，我有一次對一個談王爾德的朋友說，你要打倒李義山，這是很有道理的了，然而要引進王爾德這是多麼矛盾呢？我這裏說上這些不相干，無非要形容當時文學改革的運動若干混亂的現象。獨秀開頭便看得透闢，以為文學革命的憑借第一是用白話代古文，第二是借歐洲新文藝之真實，以代中國傳說文學之虛偽，所以當年文學改革運動，不僅是個形式主義，而且是一個質料問題。

獨秀當年最受人攻擊者是他的倫理改革論，在南在北，都受了無數的攻擊，誹謗，及評譏。我覺得獨秀對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正在這裏，因為新的政治決不能建設在舊的理論之上，支持封建時代社會組織之道德，決不適用於民權時代，愛宗親過於愛國者決不是現代的國民，而復辟與拜孔，家族主義與專制政治相為因果，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獨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頭蛇尾的，所以才有這樣探本的主張。

獨秀在新青年八卷以前對社會主義的傾向全沒有具體化，但新青年自六卷起漸注重社會問題，到第七卷的下半便顯然看出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了。自國民黨清共以來的立場論。共產

黨是罪犯了。然清共以前，十三年改組以後，國民黨自身對於民衆運動之注意，特別在勞工運動上，不在共產黨之下，則獨秀當年之創此路徑，只可看做前驅，不得視爲反動」。

誠然以上的便是陳獨秀的過去對於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化之所謂勛功偉業了？除了上面傅斯年氏替他把生平的所謂功勛？搬出來以外，我們再找不出其他的陳氏的所謂「功」了。但是我們把這功狀讀完以後，心目中有些什麼感覺呢？我知道讀者一定會和作者表同情的，一定是會起反感。北平思想界爲了要爲陳氏緩頰，所以才把這張所謂功狀宣佈出來，以鼓動全國思想界爲陳氏聲援的先聲。我想除了他們北京大學的陳氏的早年的朋友以外，絕對沒有人附和的；我們試看現在爲陳氏奔走呼號的所謂要人，學者，律師們，無一不是早前北京大學的教職。如章太炎，蔡元培，楊杏佛，胡適，傅斯年等都是。他們爲了私人感情替陳氏聲援，在人情上雖然是稍許說得過去。但是反過來說，陳氏是一個罪犯，是一個危害民國的大罪犯。試觀如今湘，鄂，贛，閩，皖，浙等省的同胞，被共匪蹂躪的慘狀，目擊心傷。雖然說陳氏沒有參加暴動？但是他自民國四年以來，一直到現在，所作的都是始終如一的共產黨的工作，這種巨魁，一旦被捕，是只有處以極刑，絕對沒有輕辦和赦免的餘地。同時我們認爲北

平思想界，替他公布的所謂功狀，反過來說也就是一張罪狀，這張罪狀較之任何文件，都要來得明顯透闢。

我不懂中國的思想界，和少數的黨國要人，爲什麼不自檢點？不努力於自己的職務？對於學術不加以特殊的研究？以期有所貢獻於物質落後的中國；對於黨國大計，尤其是在此非常國難時期，不思救國方策，而終日忙着來作這不需要作的勾當，如今我才知道中國的思想家之所以爲思想家了；少數要人之所以爲要人了。

陳獨秀三個字之入國人的耳目，便是他在主編新青年時候，同時他的共黨工作，也就是從這時開其端；中國青年因爲意志薄弱，缺乏判斷力，以致受了他的共產文學的麻醉，和共產主義的薰陶，而誤於歧途，慘遭犧牲的實不下千萬人。爲了陳氏的宣揚共產，而犧牲了這如許的有作有爲的未來的中國主人翁（青年學生犧牲以十四，五，六三年爲最多）。爲了陳氏的主張共產，以致弄成如今半壁國土的赤化，接着因爲共匪的披猖，而有九一八東省事件的發生，以致於半壁山河的淪亡；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並且我們又可以證實，最近陳獨秀的被捕，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事實。目下國軍剿匪異常勝利，朱，毛，彭，孔。黃諸匪，都

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了。陳獨秀等在第三國際已經被開除黨籍，在蘇俄是此路不通了。想亡命海外嗎？既然被棄於蘇俄，金盧布的來源，也就隨之宣告斷絕了。想鑽到匪區去苟延殘喘嗎？朱，毛，彭，賀諸匪也都不信任你了，這裏又是會享以閉門羹的。同時朱，毛等大勢已去；自己也在逃生之不暇了。陳氏處在此種情形之下，進退兩難，於是便只有潛居上海，以度殘年了。但是又爲當局所探悉而就逮了，天網恢恢，陳氏的罪惡也貫盈了，雖死也可無恨呢。

綜上以觀，陳氏的生平事業，無一不是罪惡，所謂功勛他是根本談不到的。僅只作了一篇附和胡適的所謂文學改良的八不主義的文學革命論等就說是了不起的功勛嗎？就是對於中國文化的大貢獻嗎？這眞是笑話呢！我們希望政府嚴厲制裁，拿出對鄧演達的手段來對付陳獨秀；鄧演達可殺。試問陳獨秀可不可以殺呢？請政府注意到這一點；同時也請爲陳氏奔走呼號者枕目以思之。

陳獨秀與文學革命及國民黨共產黨

陳　華

提起文學革命運動來，我們總會聯想到陳獨秀和胡適兩個人。雖然胡適認爲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已經種下了文學革命的種子，陳獨秀也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不虞之譽。中國近年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二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烟消火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我們也承認文學革命運動是基於多方面的原因而發生的，不過，這兩位先驅者的倡導之功究竟不能埋沒。如同社會主義革命一樣，資本主義的崩潰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縱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不過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社會主義革命思潮之所以能迅速成長瀰漫於全世界，一半不能不歸功馬克思對於這方面理論的建設與倡導，試問那一個社會主義者能忘掉馬克思的大名？自然，陳獨秀和胡適不比馬克思那樣偉大，但在中國文學革命運動史上，他們二人確居於創始者領導者的地位，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

『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砲，爲之前驅。』（文學革命論——陳獨秀）抱有這樣決心，和根深蒂固的舊文學勢力作正面衝突者，除陳獨秀外，當時能有幾人？有人說，陳獨秀對於新的純文學其實並沒有甚麼供獻，這是事實。但陳獨秀在中國文學革命運動史上的地位。並不因之降低絲毫。因爲新的純文學是要建立在革命文學的原則之上的，舊文學勢力一日不推翻，革命文學一日不能建立起來，新的純文學便也無由產生發展。文學革命運動的意義，就在破壞舊文學的典型，建設新文學的原理原則。新的純文學的作品，在文學革命運動史上，不能不是屬於後期的事，這是無可懷疑的。

中國舊文學相沿了幾千年之久，一直到今日，還有一部分人崇拜秦漢以上的文章，在那裏拚命摹倣，惟恐不肖，舊文學的勢力。可謂根深蒂國，積重難返。在這種情形之下，揭起反對之旗，提倡文學革命，和舊勢力宣戰，若沒有『拖二十四生的大砲』的戰士，結果恐怕要棄甲曳兵，得不到勝利。雖然新文學是『應產業發達人口集中』而發生，文學革命運動終於要成功，但也要晚幾年，說不定到今天新舊文學的是非，還成問題。

陳獨秀所發表關於文學革命的文字，在量一方面，確不及胡適。但他的態度却比胡適更爲積極，更加激烈。民國六年胡適在美國有信給陳獨秀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平心靜氣與吾人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爲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可見當時胡適只承認文學革命尚在討論時期，所謂平心靜氣研究討論，雖然是學者的態度。但不是革命家的態度。認定眞理，勇往直前，不徘徊，不返顧，那纔是革命家應有的態度。若照胡適那樣平心靜氣的商量下去，豈但『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恐怕在二十年內新舊文學還不出聚訟時期。我們再看陳獨秀的態度如何，他在答復胡適的信裏說：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爲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文學，當以白話文爲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爲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他以爲旣認淸新舊文學的是非，當然不容反對者加以匡正。有這種精神，然後纔可以和頑強的舊文學勢力相抵抗，亦即文學革命家所應有的態度。

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的態度旣是這樣，我們再來看一看他的文學革命理論如何。在這一方面，量上確不及胡適那樣多，前面已竟說過。但是，在質一方面，已足以樹立文學革命的基礎而有餘，他在文學革命論中說：

『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以上寥寥幾句話，把舊文學的缺陷，曝露無餘。並且指示出新文學的方針，破壞與建設，同時顧到，確是一篇具體的文學革命理論。末後，更進一步把社會文學提示出來，尤其值得我們大書特書。

當時，鼓吹文學革命唯一的刊物，便是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這新青年雜誌社也就是文學革命運動的大本營，執筆人除陳獨秀外，有胡適沈尹默劉復周作人周樹人(卽魯迅)錢玄同

李守常等新作家。民國七年，陳獨秀和李守常又辦了一個每週評論。接着傅斯年羅家倫等所辦的新潮月刊也出現了，同時，又有國民公報晨報副刊等起而響應，盡量刊載宣傳文學革命的文字。

於是文學革命運動的聲勢，一天比一天的大起來，浩浩蕩蕩，向舊文學勢力猛攻。再經過五四運動的激盪，舊文學遂一蹶不能復振，文學革命運動，至此可以說達到了成功的境地。推源溯本，使我們不能忘掉文學革命運動大本營的新青年，尤其是首創新青年的陳獨秀。

以後的中國新進作家，無論直接間接，都和這一班先驅者不無多少關係，至少，也受了他們的影響。現在有一部分自命爲最進步的作家，對於陳獨秀胡適這班人，時常出以藐視的態度，甚至否認他們在文學革命運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固然，文學革命運動的成功，是有牠的社會背景和客觀條件的，決非單憑少數幾個人所能造成。不過，有陳獨秀等人出來，不顧一切勇往直前的和舊文學勢力奮鬬，至少總能使文學革命的成功時間縮短幾年。否則現在自命爲最進步的作家們，恐怕仍然忙於討論新舊文學的是非問題，換言之，還在做十數年

前陳獨秀胡適等人所做的工作。這自然並非說是後來的人不如他們，不過，我們觀察一件事對于過去的事實和革命的階段，是不應該忽略的。

陳獨秀自民國四年創辦新青年起，至民八五四止，這個時間，是他努力文學革命運動時期。此後似乎認爲文學革命運動已得到最後的勝利，沒有再談的必要了，便一步踏進社會革命，從事社會運動。他的文學革命生涯，便也從此結束。新青年自五四以後，漸漸露出社會革命的色彩，民十已完全變成社會主義的宣傳刊物了。

陳獨秀這種轉變，是必然的趨勢，因爲他是富有革命性的人，不單對於文學，對於一切，都抱着革命的態度。他在新青年發刊詞中說：

『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他這六義決非僅指文學，而是汎指一切學術思想道德政治經濟藝術而言。由這個基點出發，他對於所有認爲非的，都抱着反抗的態度。就是當時一班頭腦較新的人們，心所欲言而

不敢言的倫理革命，他也毫無顧忌的公然鼓吹提倡。這種大胆和勇氣，委實値得我們佩服。但在另一方面，也招出了許多毒惡的評蔑與謾罵，甚至有人散布流言，毁謗他的家庭。曾記得當時某報批評說這是社會輿論對於陳獨秀的制裁，藉曰這能算是所謂輿論的制裁，但是對於革命家可能制裁他絲毫？

陳獨秀爲鼓吹文學革命和倫理革命，被一班保守者視爲禮教的叛徒，後來宣傳社會主義，又一變而爲政治上的危險分子了。

陳獨秀在五四以後開始致力於社會主義革命，不但用文字宣傳唯物史觀和馬克斯主義，並且接受第三國際的命令，參加中國共產黨，正式工作。不久被推爲中國共產黨總部秘書長，居於領袖地位。當年和他共同努力文學革命運動的主要人物，除李守常外，如胡適劉復錢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都漸漸與他隔絕了。

不過，陳獨秀雖然信仰馬克思主義，負了第三國際的使命，領導中國共產黨，但是起初他的革命方略，和馬克思列寧所主張的階級鬬爭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十分相同。他認爲無論那一國，必然要有兩次階級鬥爭，第一次是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鬥爭；第二次是無產階級

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他以爲就是最近步的國家，如德意志法蘭西等國，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鬥爭階段，還未完全終了。至於日本，不過是半封建半資產式的國家。中國現在正是半殖民地的狀態，外面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內裏有軍閥擾亂剝削，就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也還很萎弱，沒有強壯的表徵。在這種情形之下的中國，第一步應該先完成資產階級對於封建軍閥的民主主義鬥爭，第二步纔是新興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鬥爭。所以民國十一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出一個宣言，表示願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聯合起來，造成共產黨和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不過，國民黨和共產黨正式合作，是民國十三年的事，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陳獨秀的立場雖是共產黨，這第一步的革命主張，却恰合國民黨完全相同，這是後來國共所以有合作可能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陳獨秀和國民黨的關係，還不是這樣簡單，更非三言兩語所能包括。關於這一點，不但研究陳獨秀的生平所不能忽略，就是研究國民黨發展史，也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

國民黨自民國十三年改組後，力量纔充實起來，如沒有這次的改組，國民黨北伐決沒有

那樣的順利。爲什麽國民黨改組後力量便充實了呢？就是這一次改組吸收了很多新的成分，如同給衰弱的軀體注射興奮劑一樣，使十餘年暮氣沉沉，萎靡不振的政黨，又恢復了辛亥以前朝氣勃勃的精神。所謂新的成分，便是一班革命青年。他們受了新思潮的激盪，憤懣現狀，渴望革命成功，不惜犧牲一切，去參加革命工作。這種精神，决不是偶然的，是經過長時間的培養與鼓勵的。這種培養與鼓勵，就是由於文學革命運動和民主主義的倡導。

文學革命運動，驟看起來，似乎和國民黨無關。並且，總理中山先生也曾不以文學革命爲然而主張保存舊文體，其實，却是國民黨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分做有形的和無形的兩方而來說：

有形的　文體解放，最低限度給了國民黨一個最有力的宣傳工具。

無形的　文學革命運動的本身就是革命，受了這種運動的影響的青年，有意識無意識之間，養成了對於一切舊的陳腐的現象，都抱着反抗的態度，換句說話，就是革命情緒。

文學革命成功，也就是革命情緒的普遍化。至少，在新興智識階級青年是這樣。五四運

動，無疑的是經過革命情緒培養了的革命表現。五四以後，文學革命運動告一段落，接着便入於社會革命時期。不過，當時所謂社會革命，實際上只是在宣傳民主主義，因爲科學的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無論在客觀的條件上相差尚遠，就是關于這方面的理論，也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了解。共產黨在中國雖已成立，但是，他們的主要對象，不是資本家，而是國外的帝國主義與國內的軍閥政客。他們那時所宣傳的，本質上不是眞正的共產主義，而是和國民黨內容相同的三民主義。共產黨所持的主義，雖不能和國民黨始終完全相同，但是事實上，在這個階級，是和國民黨走一條路的。民國十一年中國共產黨聯合民主主義的宣言，便是證據。

文學革命運動之啓發與成功和民主主義思潮之推進，給國民黨積蓄了無限大的力量，至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便把這種力量充分的吸收運用起來，一直到北伐成功。此後，似乎不大需要這種力量了！

對於文學革命運動和民主主義的倡導——國民黨力量的積蓄，盡了最大力量的人是陳獨秀。

當時代表上述文學革命等兩種運動最著名的刊物，爲新青年新潮月刊每週評論努力週刊嚮導月刊，其中除新青年每週評論嚮導月刊爲陳獨秀所主持外，其餘也都和他有相當關係。結果，成功的既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所以陳獨秀的努力，實際上只是給國民黨效勞盡義務，雖然他的立場始終是共產黨。

不過上述的關係，後來終於斷絕了。其斷絕期間，不在十六年國民黨淸共以後，而在十三年實行容共之始。何以言之？在未容共之前，受了陳獨秀鼓吹新思潮的影響的青年，無論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事實上都立在一條戰線上努力。自國民黨容共以後，表面上看來，國共是正式合作了，骨子裏却開始互相猜忌互相仇視起來。尤其是共產黨主要份子，和國民黨絕對沒有水乳交溶的可能。自容共以後，兩方面不但不能收協作之效，反背道而馳。民國十六年淸共之舉，已肇端於容共之始，關於這點，我們可以舉一段最初的事實來證明：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會，實行聯共。一連開了十天，主席團人選，係由國民黨總理中山先生親自指定，爲胡漢民汪兆銘林森謝持李守常（李爲共產黨）五人。在第十日會議席上，國民黨的同志提議「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

共產黨李守常當時出而聲明：「第三國際共產黨員加入本黨——國民黨，係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成共產黨。其加入本黨，係以個人資格，並非以黨團資格。」國民黨方面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提議，所謂他黨，明明指共產黨而言，用意就在對之加以限制。所以共產黨方面也就出而聲明，兩下是如何的互相猜，可想而知了。

民國十六年四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開全體委員會。經吳稚暉提出檢舉共產黨謀叛証據案，議決將共黨首要份子，令各地方當局拘捕監視。其實，國共由猜忌而仇視，分家乃是必然之勢。如同乾柴和煤油已經在那裏堆積好了，吳稚暉之檢舉，不過是擦火柴的工作而已。

國共自合作也就是互思猜忌的時候起，共產黨方面的宣傳，已漸漸不利於國民黨，到後來甚至有推翻國民黨的意思。陳獨秀是共黨的領袖，在國民黨方面看來，確是最主要的反動份子了。雖然在清共的時候，國民黨的領袖汪精衛和共產黨的領袖陳獨秀在上海聯合發表告兩黨同志書，開頭一句就是「國民黨共產黨的同志們」一says的那般親熱，其實是口是心非，別

有作用。吳稚暉竟愚以爲這是汪精衛主張和共產黨共治中國的証據，豈其然哉？

陳獨秀和國民黨既居於反對地位，思想也起了變化。他原來主張中國革命要經過二個階段，第一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是社會主義革命。第一個階段完成後纔能達到第二個階段。但是後來他把這種主張放棄了，而直接努力社會主義革命，隸屬於杜洛斯基派。不但在中國是危險分子，在蘇俄當局看來，他也變成反動了。這一派的首領杜洛斯基，既不見容於幹部派首領史達林，而被放逐，陳獨秀的共產黨籍於是也被開除。我們明瞭陳獨秀這時的主張，不能不把共產黨幹部派和杜洛斯基派的主張不同之點考察一下：

幹部派的首領史達林氏，認爲在最近的將來，外國的資本主義還不易推翻。一方面蘇俄的富農階級依然占有很重要的經濟地位，政府對之不得不取緩和態度。並且欲消滅國內小資產階級，只有吸收外資之一途。這從反對派的杜洛斯基等人看來，這都是反革命的理論。他們批評斯達林這種主張，無異使蘇俄漸次恢復資本主義，他們反對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再度擴張，並且決不放棄引起世界革命的希望。尤其對於史達林派寬容富農階級的態度，表示堅決反對。至於杜洛斯基對於中國的觀察，認爲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進據了統制的

地位，同時，無產階級也養成了龐大的勢力，所以主張在中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開始不斷革命。

陳獨秀師承了杜氏的理論與主張，從事所謂以無產階級專政開始的不斷革命，與幹部派的中國共產黨朱德毛澤東等相對立。不過陳獨秀所領導的這一派黨員，爲數不多，勢力也很薄弱。年來只潛藏在都市地方，暗中宣傳，而沒有朱毛等公開武裝活動的力量。

事實上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何嘗達到統制的地位？以資本主義爲對象的無產階級，何嘗已經養成了龐大的勢力？中國的現狀，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內受封建軍閥的剝削，農村破產，農民無以爲生。革命的力量，是以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爲對象的廣大農民，而不是以資本主義爲對象的少數無產階級勞工。陳獨秀信仰杜洛斯基的理論，實行他的主張，如果是由於良心上的驅使，承認中國已達到資本主義的階段，那不能不是錯誤。如果狃於黨派成見，必欲以客觀事實遷就主觀的理論，明知錯誤，還要倔強到底，我們眞爲他以前光榮的革命歷史，抱無限婉惜，因這樣已經不佩稱爲革命家了！

總之，我們清算陳獨秀的功過，應該分爲前後兩個時期觀察：在前期，陳獨秀對於文學

革命運動及民主主義思潮之推進，盡了極大的力量，在中國革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直接間接受他的影響而參加革命的青年不知有多少，這些人加入共產黨的恐怕要居少數，大多數都在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前後參加國民革命。但是，後期的陳獨秀，理論上的根據既嫌薄弱，同時，行動的目的，似乎也錯亂了。無論由於觀察的錯誤或狃於黨派成見，總之已經失掉革命領袖的資格。不過，我們不能因此便抹煞他以前偉大的功績，在現代中國，他畢竟是最出色的人物。

現在陳獨秀是被捕了，他聘請三個律師為他辯護，他在十一月十日給上海李時蕊律師的信裡說：「弟已延聘三律師，一是章士釗，一是郭蔚然，一是彭望鄴。」這頗出我們意料之外。本來，打官司請律師原是一件極尋常的事，但在以推翻現代政治為職志的革命領袖，似乎應該另當別論。因為律師無論如何辯護，不能不根據現政府的法律。換言之，請律師辯護，無異承認現政府的法治，然則以往革命的意義，就很難解了。這和李守常當年在北京遇害時的態度，就大不相同，不過，陳獨秀或者不能算是「怙惡不悛」吧？

陳獨秀被捕以後，有幾處甚麼部電請中央嚴辦，甚至主張處以極刑。關於這點，我們不

便加以批評。至於法院對於本案應當如何處理，我們更無權過問。不過，以陳獨秀的才能聲望，打算顯貴，是很容易的事。而他偏委身於革命事業，弄得長子延年次子延喬都先後被人槍斃，妻也擯棄了他，結果自己又變成階下之囚，生死不測，這種情景是如何的淒慘？固然，一個爲主義犧牲的革命家，就上斷頭臺也不願受人憐惜，不過和以革命爲手段以陞官發財爲目的的人們比起來，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附錄

陳獨秀等危害民國案起訴書

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等，上年十月間被上海公安局捕獲，解送南京軍政部軍法司。嗣移由司法行政部交江蘇高等法院審理，經檢察官偵察結果，提起公訴，茲照錄起訴書原文如左：

起訴書被告陳獨秀彭述之(即張次南)王武(即宋逢春)濮一凡。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羣。郭競豪，(即彭道之)梁有光。王鑑堂，以上十名均在押。右開被告•民國念一年刑事第三八號危害民國一案，業經偵查終結，認爲應行提起公訴，茲將該被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開列於後：

被捕經過　緣本年十月間，上海市公安局據人密報，公共租界東有恒路春陽里第二百十號，設有共黨僞中央機關。當即密派督察員唐豹，張清泰，持函向特區第一法院簽發搜查逮捕證，會同捕房西探長戈而特，西探目克老司老艾，於同月十五日下午二點鐘，按址前往。適謝

少珊及被告濮一凡。彭述之(卽張文南)。王武(卽宋逢春)。王兆羣等五名，正在開每星期常會，遂一併逮捕。當場抄出大批反動文件，幷有小條通訊處數紙。探捕等卽根據此項地點，於同日下午七時，至岳州路永興里十一號樓上，將被告陳獨秀拘獲，幷獲大批反動文件。九時許，至聖母院路高福里三百二十三號樓上，濮一凡家內搜查，抄出反動文件多種，並拘獲王曉春一名。當晚十二時許，(十六日另時)又至大浦路斯文里一〇四四號，因深夜打門，屋內人聞聲驚恐，有二人由窗口跳下，一人逃去，僅將被告梁有光拘獲，並搜出反動文件多件。七時半，到塘山路業廣里三三五號樓下，被告王子平，何阿芳，正在印刷共黨刊物「火花」及「校內生活」，遂連同證物一併抓獲。十一時又到福履里路念二號，獲住被告王鑑堂，又搜獲反動書籍十種。先是探捕等在塘山路業廣里二三五號屋內，捕去王子平等，復卽派人暗中守住。迨至十七日，被告郭競豪(卽彭道之)，不知事已敗露，前往該屋，以被守屋探警，一併捕獲。遂解送江蘇高等第二分院，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派員提回。先將陳獨秀彭述之兩名，轉送軍政部陸軍署軍法司訊明，與鄂贛等處共匪無關。且陳獨秀等既非現役軍人，而犯罪地點，又與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七條前段規定不合，認爲無權管轄，轉由司法行政部發

交本處入依法辦理。本處調集卷證，一再偵訊陳獨秀彭述之等，對於加入共黨，創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團體，及被舉爲中央執行委員等，均各自認不諱。正進行間，查悉公共租界捕房，又在陳獨秀家內，續獲反動文件四十餘種，復派員向中央黨部一併調齊。并經上海市公安局，將共犯王武，（即宋逢春）濮一凡，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羣。郭競豪，梁有光，王鑑堂，王曉春等九名續解來處，併案訊辦。偵查結果，除王曉春一名，查無確據，另予不起訴處分外。陳獨秀等十名，其犯罪行爲，應分別論及如左：

陳獨秀部份　被告陳獨秀，係安徽懷寧人。初在日本東京大學讀書。於前清宣統元二年（一九零九年一九一零年）間，曾一度回國從事著作。光復後，又往日本繼續求學。至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回國到上海，任青年報當主筆。一以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爲目的。民國五年（一九一六）至北京大學當文科教務長，直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復回上海辦青年報，是年即加入共產黨。旋往廣東任教育廳長，約一年，因病回滬。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赴莫斯科住約二月　回國後，被派爲共黨總秘書，直接受莫斯科命令，指揮各地共黨活動。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因國民黨清共，共黨失敗，第三國際以被告執行職務不力，將其總秘

書職務開除。彼時共黨內部分裂爲二：㈠爲斯丹林派，又名幹部派。㈡爲托洛斯基派。被告側重於托洛斯基一派，自與幹部派意見不合。至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下半年，復經開除黨籍。於是被告糾集一般開除黨籍者，若彭述之王子平宋逢春等，在上海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團體，舉被告與彭述之張九爲中央執行常務委員，宋逢春濮一凡二人爲候補常務委員。復在北京天津廣州香港等處，組織支部，分頭活動。因限於經費，僅參加工會及學生運動。而農會方面，黨員較少，無法擴張。黨內刊物有「校內生活」及「火花」兩種，均由被告負責編輯。以上事實，均經被告在捕房高二分院及本處自白，核與共犯彭述之等供詞。尙稱符合。

查被告爲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執行常務委員首席（以下簡稱中央反對派），是爲一黨之主腦。其個人行動，及發表之反動文件，應負責任，固無論矣，即以中央反對派名義刊行之反動傳單宣言書，及其指揮之行動，亦應由其完全負責。詳閱中共反對派名義發表之「政治決議案目前的局勢與我們的任務」（證據第二四號），「五三十七週紀念告民衆書」（證據第五號），「對時局宣言」（證據第六號），「組委通告」（證據第七號），爲日本主義進攻上海告民衆書，（證據第十一號），「爲日本佔領淞滬告全國民衆」，（證據第十五號），「滬東區委

員爲日本在上海進行大屠殺告民衆」(證據第十六號),「爲日本佔領::滬告全國民衆」,(證據第二六號),「北京特委最近工作計劃」,(証據第三三號),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傳共產主義;一面則對於國民黨政府,冷譏熱諷,肆意攻擊。綜其要旨,則謂國民黨政府威信墮地,不能領導羣衆,應由其領導農工及無產階級等,以武裝暴動,組織農工軍,設立蘇維埃政權,推翻國民政府,由無產階級專政。並欲打倒資本家,沒收土地,分配貧農。其言詞背謬,顯欲破壞中國經濟組織,政治組織,而其個人名義所發表之「中國將往何處去」(證據第二六號),「此是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路」(證據第二六號),「國聯第二次決議後之局勢」,證據第二六號),「爲紀念五一告工友」,(證據第二六號)竟目三民主義爲反動主義,並主張第三次革命,堅決掃蕩國民黨政府,以革命民衆政權,代替國民黨政權。其意在危害民國,已昭然若揭。惟查共黨進行之程序,原有組織團體,宣傳主義,武裝暴動,設立蘇維埃政權等各階段。察核被告所爲,僅祇共產主義之宣傳,尚未達於暴動程序。然以危害民國爲目的,集會組織團體,並以文字爲叛國宣傳,則證憑確實,自應令其負責。

彭述之部份被告彭述之,又名張次南,湘南寶慶人,寶慶中學畢業。民國十年(一九二

）在長沙加入共產黨，是年卽赴莫斯科讀書，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歸國，在上海大學充算學教習，並担任編輯新青年月刊，嚮導週報。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國民黨清共，共黨內部分裂。被告傾向托洛斯基派，以策略之不同，致被幹部被開除黨籍。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下半年，與陳獨秀合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被舉爲中央執行常務委員。本年十月十五日，化名張次南，在謝少珊家與濮一凡王武王兆羣等，正在開每星期常會，卽被當場捕獲。查被告爲中共反對派中央執行常務委員（以下簡稱中共常委），亦爲黨中主腦之一。對於黨之名義，刊佈反動宣傳文件，及指揮活動，自應完全負責。其理由因與陳獨秀相同。而其個人刊佈之反動文件，如「日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與統治階級的國民黨，」（證據第二六號）國內團結「致對外之意義」，（證據第二六號），「史大林主義者對滿州事件的估計與反日動的危機」（證據第二六號），「爲上海事變的教訓及其前途」（證據第二六號），「滿州事變一年的教訓及民衆應有的覺悟」（證據第二六號），閱其內容，均屬宣傳共黨主義，甚至詆毀國民黨爲帝國主義之走狗。查其宗旨與策略，固以危害民國爲目的，然尚未達於暴動程序。其以文字爲叛國之宣傳，及集會組織團體等行爲，自應與陳獨秀同等責任。

王武部分　被告王武，原名宋逢春，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經左軍之介紹，加入共黨，担任宣傳工作。後與幹部派意見相左，致被開除黨籍。隨進托洛斯基派，去年五月間化名劉夢庚，與鄭超麟組織共黨機關，被淞滬警備司令部偵悉，會同捕房將被告抓獲。由上海市臨時軍法會審判决有期徒刑六年，送交江蘇第二監獄執行。嗣被告在獄染病，於本年十月五日核准保外就醫，乃不知悛改，仍進行共黨工作，且被舉爲候補中央共常委。於十月十五日與彭述之等列席共黨會議，探捕到來，一併被捕。查被告加入共黨，担承宣傳工作，業經明白供認。至因病保釋後被推爲候補中共常委，及列席共黨會議。被告雖不承認，第共犯謝少珊在捕房及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後簡稱爲高二分院）供稱，常委有五人，即陳獨秀，彭述之，濮一凡，羅世凡，及宋逢春。後一人剛由漕河涇獄中釋出，此次參加開會，是第一次。我被捕之日，正開每星期常會云云。（高二分院卷二一頁四六頁），而訊諸彭述之陳獨秀，亦稱被告是候補常委，（本處卷第二宗五一，五二頁，）核與謝少珊之供詞相符。是被告參加會議，被選中共候補常委，已屬證據確鑿，自不容其狡賴。且在犯罪執行中，又犯同樣罪名，情節較爲重大，應請從嚴懲處。

濮一凡部分　查被告濮一凡，對於加入共黨被舉候補常委，雖堅決否認，但被捕時係在謝少珊家列席每星期常會。且在其聖母院路高福里第三百二十二號樓上寓所，搜出反動書籍。據共犯謝少珊供稱，常委包括有委員五人，陳獨秀，彭述之，宋逢春，濮一凡，即卜得子等。(高二分院卷二一頁)，迨至高二分院推事問其彭述之是什麼職務呢？答是常委。又問濮一凡王武呢？答亦是常委。(高二分院卷四六頁)，又陳獨秀在本處供，常委是三人，除我與彭述之張九外，濮一凡宋逢春二人均是候補常委。(本處卷第二宗五一頁)，又共犯彭述之，本處詢其據謝少珊說，常委有五人，怎麼祇有三人？答稱二個是候補常委。問其候補常委何人？則稱宋逢春濮一凡。(本處卷第二宗五二頁)，總合參觀，被告為中共反對派候補常委，殊可徵信。況被告係列席會議時當場被捕，如果並非常委之一，何能參與其間？是被告加入以危害民國為目的之團體集會，尤屬毫無問題。

王子平部分　被告王子平，又名曾猛，浙江溫州人。民國十二三年間赴廣東投考黃埔軍校未遂，由友人介紹在該校充當錄事，隨轉入廣州總工會，任司書職，旋因薪薄辭職，流寓廣州幾三年。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經友人秦丁郁之介紹，入上海江灣路崇文堂印刷所

當校對，並因崇文堂副經理豪千之勸，即加入共黨。同年十月間被遣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學讀書，至民國十七年，因病回國，與左派反對派發生關係，即被幹部派開除黨籍，乃改入托洛斯基派，擔任黨中抄寫印刷宣傳文件工作。當捕獲時，被告正在印刷「校內生活」及「火花」二種，據稱係黨中囑印「校內生活」一百份，「火花」二百五十份云云。核其所爲。自係加入共黨團體，帮助宣傳共產主義，旣據供認不諱，自應負刑事罪責。

何阿芳部分　被告何阿芳，一名何芳，又名何止錚，浙江瑞安人，於民國十五年到上海，十六年二月經友人金嘉韓即金石生介紹，加入共黨團體，充當送信員，月支洋二十五元。民國十六年九月被派至莫斯科東方大學及中山大學研究共產主義，先後約三年。出校後在紅色工廠裏做銅匠，約半年被逐出境。至民國二十年四月回上海，即在卓羣機器等廠做銅匠，旋即加入托洛斯基派。於本年九月二十三日遷住塘山路業廣里第三百三十五號樓下，與王子平共同印刷中央反對派反動刊物傳單等文件。以上事實，均經被告在捕房高二分院公安局及本處詳細陳述，並拘捕時適在進行印刷工作，當場搜出大批「火花」，「校內生活」等反動文件，核與供詞皆相脗合。査被告加入共產團體，及爲宣傳共產主義之帮助，供證旣屬兩確，應

即依法訴究。

王兆羣部分　被告王兆羣，據其述稱，係安徽南宿州人。本年十月間因友人李思昌之介紹，囑其到上海尋謝少珊謀事，寓居謝少珊家中，遂於十月十五日與彭述之等一併被捕，堅不承認有加入共黨情事。查謝少珊家係屬共黨中央機關，常作集議開會之所，業經謝少珊一再供述明白。矧共黨係秘密團體，其集議處所何等嚴密？自不容黨外人廁身其間，況被捕時正在開會，被告如果並無若何資格，何致容其列席與議？既經當塲被捕，其為共產黨人加入團體集會，自無疑義。

郭競豪部分　查郭競豪為彭述之之弟，原名彭道之，有共產黨學校登記表可證。（本處卷第二宗六六頁），據登記表載明，被告現年二十三歲，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九月間，在湖南長沙加入共黨，嗣後無形脫離關係。復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十二月間，在上海加入反對派。從前曾做學生運動，改入反對派後，從事於滬東區區委及學生運動，現在擔承組委工作及學生運動云云。據此記載，被告殊有加入共黨團體之重大嫌疑。

梁有光部分　當本年十月十五日，破獲東有恒路春陽里共黨中央機關後，即搜獲小條通

信處數處，探捕等根據是項地點，即至大通路斯文里一零四四號搜捕。因夜深打門，被告等作僞心虛，除另一人越窗逃去外，被告梁有光由窗口跳下，繞跑十餘步，即被探捕追獲，（高二分院卷四四頁）并在屋內起出反動書籍多種。訊之被告對於反動書籍，雖堅稱非其所有，但被告既非共產黨人，自應安坐室中，靜待搜查，何必驚惶若此？茲經上海市公安局查明，被告係中共反對派之各省視察員，甫由廣西到滬者，有上海市公安局公函可證。（本處卷第二宗六四頁）是被告係屬共產黨員，已有相當之證明。所稱尋找我弟梁有明云云，顯屬掩飾之詞，自難予以置信。

王鑑堂部分　被告王鑑堂對於參與共黨工作，一再究詰，均絕端否認。查閱高二分院卷宗，探捕往拘時，保根據謝少珊家內搜出之通信處小條。且又在被告家搜出反動書籍十種，詰訊被告諉稱書籍係前樓住戶王伯平的。惟王伯平既無從查傳，而被告姓名又與共黨中央機關搜獲通保之姓名却相符合，有捕房西探戈而特報告書，堪資引證。（高二分院卷四五頁），是被告爲共產黨員之一，亦屬顯明。

總上論結，陳獨秀，彭述之，（張次南），濮一凡，王武（宋逢春），王子平，何阿芳，王兆

羣，鄭競豪（彭道之），梁有光，王鑑堂等，組織以危害民國爲目的之團體或集會，均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又陳獨秀，彭述之以文字爲叛國之宣傳，及王子平，何阿芳爲叛國宣傳之幫助，並有觸犯同法第二條第二款之重大嫌疑。起獲共產書籍文件，係供犯罪所用及犯罪預備之物，請按同法第十條刑法第六十條一二款一併沒收。合依刑訴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提起公訴。